

目 录

博加特 / 1
叫不出名堂的事 / 8
乔治与他的粉红色房子 / 16
择业 / 24
曼门 / 32
布莱克·沃兹沃斯 / 39
儒夫 / 48
焰火师 / 59
注册会计师泰特斯·霍伊特 / 71
母亲的天性 / 83
蓝色卡车 / 92
爱,爱,爱,孤独 / 102
机械天才 / 116
慎重 / 131
直到大兵来临 / 143
海特 / 159
告别米格尔街 / 171
后记 / 178

博加特

每天早上，海特起床后，便骑在他家阳台的栏杆上，朝对面喊道：“有什么新鲜事吗，博加特？”

博加特在床上翻个身，用别人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轻声咕哝着：“有什么新鲜事吗，海特？”

人们叫他“博加特”是有什么原因的，可我总觉得这是海特送给他的雅号。记得电影《卡萨布兰卡》上映的那一年，博加特的名字风靡了整个西班牙港，硬汉子博加特的形象，成为成千上万年轻人崇拜的偶像。

在他被称作“博加特”之前，人们叫他“扑克算命先生”，因为他一天到晚总是在玩这种把戏，尽管他一点也不喜欢玩扑克。

无论什么时间你到“博加特”那间小屋子里去，总会看到他坐在床上，面前的小桌子上排列着七行扑克牌。

“有什么新鲜事吗，伙计？”他只轻轻地问这么一句，便一声不吭地呆上十几分钟。使你感到几乎无法和“博加特”搭上话。他看上去是那么愚昧和傲慢；一双睡意蒙眬的眼睛，脸庞臃肿，头发漆黑，肌肉丰满的胳膊，但他倒也算不上古怪滑稽。不管干什么事，他老是像睡不醒似的，无精打采，就连舔拇指分发扑克牌时也是那么一副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样子。

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是最乏味的。

他装出一副靠做裁缝维持生计的样子，甚至还出钱让我给他写了一副招牌。

缝纫，裁剪

制作成衣

技术高超，款式新颖，价钱公道

他买了一台缝纫机和一些蓝的、白的、褐色的粉饼。我简直想像不出他到底能干些什么，我也从不曾记得他做成过一件衣服。在这一点上，他倒有点像隔壁的波普，那个从没做出过一件家具，却整天在画呀、凿呀、鼓捣那被他称作棒眼的木匠。每当我问他，“波普先生，你在干什么呀？”他总是回答道：“嘿，孩子，问得好，我在干一件叫不出名堂来的事。”就连这类事情，博加特也从没干过。

那时我还是个毛孩子，从没想过“博加特”是怎么搞来的钱，我觉得凡是大人总会有钱的。波普有个干杂活的老婆，后来又成了许多男人的朋友。我简直想不出“博加特”会有母亲或是父亲，也从没见一个女人到他小房子里去。那间被他称为是下人住的厢房，却没有一个侍候正房里主人的下人住过，说是下人住的厢房，也只不过从建筑的角度这么叫而已。

“博加特”为人交往的方式对我来说至今是个谜。他一度是这条街上最有名气的人物，有许多朋友。我常常看到他蹲在路旁和街上的大人们呆在一起，当海特、爱德华或埃多斯高谈阔论时，“博加特”总是低着头闷声不响地，用手指在地上画着图。他从不笑出声来，也从没讲过什么故事，可凡是遇到什么喜庆日或其他重大时刻，大伙总要说，可不能少了“博加特”，那家伙精明得像魔

鬼。我猜，他一定是用某种方式，使他们感到满意和快慰。

正如我说的那样，每天早上，海特大声喊叫道：“有什么新鲜事吗，博加特？”

随后，他便等着听“博加特”咕哝出那句含糊不清的答话，“有什么新鲜事吗，海特？”

然而一天早上，海特喊罢却没有听到惯常的答话。

“博加特”突然不见了，连一句话也没给我们留下。

街上的男人们整整沉闷了两天，他们聚集到“博加特”那间小屋里，海特拾起博加特桌上的扑克牌，有两三张牌从他手里滑落下来。

海特说：“你们说他会不会去了委内瑞拉？”

然而，没人能知道这事儿，博加特平时很少对他们吐露什么。

第二天早上，海特起来点燃一支烟，往后阳台栏杆上一靠，刚要张嘴喊，忽而想了起来。这天早上他给奶牛挤奶的时间比以往都早，母牛对此举持不合作态度。

一个月过去了，又是一个月，“博加特”还是没有回来。

海特和他的朋友们开始把“博加特”的房间改作俱乐部了。他们在那儿打牌，唱歌，喝酒，抽烟，有时还领个把女人到这房子里来。那时海特因为参与赌博和组织斗鸡而受到警察的纠缠，后来他花了不少钱行贿才得以脱身。

一切都像“博加特”从没到过米格尔街似的，尽管“博加特”在这条街上住了差不多四年左右的样子。他来的那天手里拎一只手提箱，对蹲在门外叼着烟卷读晚报上板球赛消息的海特说，他想找一间房子。那时他也没多说些什么，海特说他只问了一句话，“你知道哪儿有空房间吗？”海特领他来到隔壁院子里，那里有间每月房租是八块钱带家具的厢房，他二话没说就住了下来，随即

便摸出一副纸牌，开始玩扑克算命的把戏。

这事给海特留下极深的印象。

后来他就一直独来独往地这么生活着，从而赢得了“扑克算命先生”的雅号。

当海特和其他人把博加特忘掉，或者说是快要忘掉的时候，他回来了。一天早上大约七点钟的时候，他回来了，并发现埃多斯和一个女人睡在他的床上。那女人尖叫着跳起，埃多斯并不太惊慌，十分尴尬地跟着起来。

博加特说：“出去，我累了，要睡觉。”

他一直睡到下午五点，当他醒来的时候，看见过去的老伙计们把小房间挤得满满的。埃多斯为了掩盖自己的狼狈相，大声说笑着，海特带来了一瓶酒。

海特说：“有什么新鲜事吗？博加特？”

他怔了一下，猛然明白了这一提示，喜形于色地应道：“有什么新鲜事吗，海特？”

海特打开朗姆酒，大声吆喝博伊去买瓶苏打水来。

博加特问：“奶牛怎么样，海特？”

“它们还好。”

“博伊呢？”

“他也挺好，刚才你没听我喊他了吗。”

“埃罗尔呢？”

“他也没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博加特？你还好吗？”

博加特点点头，不一会儿，他们就把那瓶酒喝了个底朝天。

“别担心，”博加特说，“我再去买一瓶。”

人们从没见过博加特喝这么多酒，也从没听他讲过这么多话，大伙都很吃惊，没人敢问博加特去过什么地方。

博加特说：“你们这帮小子可一直没让我这间房空闲过啊。”

“不过没有你在，可就大不一样喽。”海特说。

大伙仍感到有些不安，博加特是难得开口说话的，现在他讲话时嘴有点歪扭，还略带点美国腔。

“当然，当然，”博加特拿腔拿调地说，活像一个在做戏的戏子。

海特吃不准博加特是不是喝多了。

要知道从外表看上去，海特很像电影明星雷克斯·哈里森，而且他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极力去模仿。他把头发向外梳，眯紧眼睛，看上去是挺像哈里森的。

“好啦，博加特，”海特说话的神态，简直就是活脱脱的雷克斯·哈里森，“赶快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博加特露出牙齿，歪扭着嘴唇玩世不恭地笑起来。

“当然，听我说，”他说着站起来，两个拇指插在裤兜里，“当然，我会告诉你们这一切的。”

他点起一支烟，向后一靠，烟徐徐飘进眼睛，他眯缝起眼，谈起他的事。

他在一条船上找了个活，漂泊到英属圭亚那，被人抛弃在那儿，所以只好到内地去。后来他在鲁普努尼草原放牧，还运些走私物品（他没走走私什么东西）到巴西去，然后再从巴西搞些女孩子弄到乔治城去。正当他经营着城里最大的一家妓院时，拿了他贿赂的黑心警察却把他抓了起来。

“那可真是个好地方，”他说，“没有叫花子。都是些法官、医生和市政要员。”

“然后呢？”埃多斯问，“进了监狱？”

“你吃错药了吗？”海特说，“监狱！咱们这种人怎么会进监狱

的！你怎么蠢得像头驴。干吗不让他把话讲完？”

然而博加特却已受到了伤害，他再也不说了。

从那时起，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博加特变成了电影的“博加特”，海特也成了哈里森。清早惯常的对答换上这些话：

“博加特！”

“闭嘴，海特！”

博加特如今成了街上最令人胆颤的人，甚至连大脚都承认害怕他。博加特拼命地酗酒，骂街，赌博，用肮脏粗野的语言咒骂街上路过的姑娘。他买了顶帽子，紧扣在眼皮上。平时没事，他就靠着院子外高高的水泥栏杆，站在那儿，双手插在裤兜里，一只脚蹬在墙上，嘴上总是叼着一支烟卷。

不久他又失踪了。那天，他和那一伙儿在他房里打扑克时，站起来说：“我去趟茅房。”

从此，他们又有四个月没见到他。

当他再回来时，比以前显得黑胖了些，也更加蛮横粗野，讲着一口地道的美国腔英语。兴许为了使自己的模仿更加逼真，他开始向孩子们中间扩张。他把街上的孩子都喊来，给他们一点钱去买口香糖和巧克力，他非常喜欢抚摸孩子们的头，给他们一些善意的忠告。

第三次他离开又回来后，在自己的房子里为所有的孩子（他称小家伙）举行了一次大聚会。他买来整箱整箱的矿泉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还有许多饼干。

后来，住在米格尔街四十五号的警官查尔斯，把博加特抓走了。

“不许乱动，博加特！”查尔斯警官说。

博加特不知怎么回事，愣住了。

“怎么回事，伙计？我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啊。”

查尔斯警官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

这事曾在媒体引起了不太大的轰动，报道只说起诉的罪名是重婚罪。最终还是海特披露出其中的内幕，而报纸上却只字未提。

“是这么回事，”一天晚上，海特站在路旁的人行道上，说：“他把他的第一个老婆丢在图南蒲纳来到西班牙港，他们没有孩子。他呆在这儿感到沮丧，便走了，在卡罗尼找到一个姑娘，给她留下一个孩子。他们在卡罗尼可不是逢场作戏，是动真格的，博加特和那姑娘结婚了。”

“可他为什么又抛弃了她？”埃多斯问。

“为了做个汉子，和咱哥们儿在一起。”

叫不出名堂的事

自命为木匠的波普仅完成过一项工程，就是在他家后院芒果树下搭起一个小工棚，其实就连这件事也没完全干完，他懒得用钉子把作顶棚的马口铁皮钉牢，只用一些大石块压在上面。每当刮大风，棚顶就会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呼声，仿佛随时都有被风刮跑的可能。

尽管如此，波普也没闲着。他整天忙忙碌碌地敲打着，锯呀，画呀。我乐意看他干活，喜欢那从柏木、雪松刨花里发出的气味，愿意看到波普那沾满锯末刨花的鬃曲的头发。

“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我问。

波普便会说：“嘿，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干一件叫不出名堂的事。”

我喜欢波普的这种回答，使我感到他像一个诗人。

一天，我对波普说：“让我也做点什么吧。”

“你想做什么呢？”他问。

一下子我还真想不出要做什么。

“瞧，”波普说，“你也在想一件叫不出名堂的东西了吧。”

最后，我终于决定做一个盛鸡蛋的托盘。

“你做这玩艺给谁？”波普问。

“我妈。”

他笑起来，“你想她会用吗？”

我妈挺喜欢那鸡蛋托盘，用了约摸有一个星期的光景，后来她像是完全把它忘了，又像以前一样开始把鸡蛋盛在碗里，或是干脆放到菜板上。

我给博加特写了那块裁缝的招牌之后，波普也让我给他弄一块。

他从耳后取下那截红铅笔，寻思着该写什么词合适。起初，他打算自称是个建筑师，可他又吃不准字母拼写是不是正确，我劝他另换个词，后来写出来这样一块招牌：

建筑承包商

木匠

家具木工

我作为题字人在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波普喜欢站在这块招牌前面，但一些不知底细的人前来订活儿时，他却显得惊慌失措。

“什么木匠？”波普会说，“他早搬走啦。”

我觉得波普比博加特随和多了。博加特很少和我说话，而波普很健谈，他会谈一些挺严肃的事，诸如人生、死亡和工作之类的事，我觉得他也挺愿意和我说话。

然而，波普在街上没什么名气，人们并不认为他神经有毛病或是傻，海特常说：“波普太狂啦，知道吗。”

其实这种说法并没什么道理。波普有个习惯，每天早晨他端着一杯朗姆酒在路旁站着，却一口也不喝，当他看到任何一个熟人露面时，便用中指在酒杯里沾一下，舔舔手指，而后再向那人打

招呼。

“咱们也买得起朗姆酒，”海特常说，“可不会像波普那么显摆。”

我自己却从来没这么想过，一天我去问波普这事。

波普说：“孩子，早上太阳升起来，天却仍然挺冷，你很快就会长大了，那时你就会知道，你出门后站在阳光下喝着朗姆酒是件多么美的事了。”

波普从来没挣过一分钱，他的老婆倒是在外面做工，他们没有孩子，所以这也不算什么难事。波普说：“只有娘们儿才愿意去干活，男人根本不必干活。”

海特常说：“波普那个娘娘腔，根本算不上个男人。”

波普的老婆在我学校附近的一个大户人家当厨娘。过去她每天下午总在等着我，把我领进大厨房里，给我许多好的东西。我吃东西时，她老爱坐在对面看着我吃，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事，瞧她那副样子，好像我是专门吃给她看似的。她让我叫她姨妈。

她把我介绍给那个大户人家的花匠，他褐色的皮肤，长得挺好看，很爱那些花。我喜欢他照料的那个花园，花床总是那么乌黑湿润，绿油油的青草被剪得十分整齐。有时，他让我给花床浇水，他常常把修剪下来的青草装在一个小包里，让我带回家交给妈妈，对母鸡来说青草可是好东西。

一天，我没碰见波普的老婆，她没来等我。

第二天早晨，我也没看见往常站在路旁用手指沾酒喝的波普。

那天晚上，我还是没有见到波普的老婆。

我在波普的工棚里找到了他，他坐在一块木板上，绞动着沾满木屑的手指。

波普说：“你姨妈走了，孩子。”

“去哪儿啦，波普先生？”

“嘿，孩子，这的确是个问题。”说着他站了起来。

波普忽而发现自己一下成了街上的知名人士，消息很快在街上传开了。

一天，埃多斯说：“我真想知道波普会成什么样子，但愿他再也不会朗姆酒喝了。”海特呼地跳起来，恨不得打他一个耳光。后来，人们开始汇聚到波普的工棚里，他们谈论起板球赛、足球赛或是电影什么的，就是不提有关女人的事，极力想使波普开心些。

波普的工棚里再也没有敲打的声音了，锯末也不再发出诱人的清香，几乎要变成一堆黑乎乎的垃圾了。波普开始拼命喝酒，我不喜欢他喝醉的样子，他身上散发出浓烈的朗姆酒气味，经常大声哭叫后又暴跳如雷，还动手打人，这些行为使他成为街上那帮人中的一员。

海特说：“咱们以前错怪了波普，他是条汉子，和咱们完全一样。”

波普也很满意这些新的伙伴，他本来就是十分健谈的人，对街上的那伙人总是那么和颜悦色，常常为自己以前那么不喜欢他们而感到不理解。好像直到如今他才找到自己所喜爱的生活方式。其实，波普并不真正觉得幸福，这种友好的交往来得太迟了，他发现自己并不像想像的那样喜欢这种生活。海特竭力想使波普对别的女人产生兴趣，可波普却毫无胃口。

波普并不认为我还未到可以对我无话不谈的年龄。

“孩子，等你长到像我这么大，”他多次对我说，“你会发现一旦得到原本你认为自己会喜欢的东西之后，你就不再会珍惜它们。”

只有他才能说这种像谜一样没头没脑的话来。

后来有一天，波普离开了我们。

海特说：“不用问我就知道他去哪儿了，他找他老婆去啦。”

埃德伍德说：“你想他老婆会跟他回来吗？”

海特说：“咱们等着瞧吧。”

没让我们等多久，就从报纸上得知有关他的消息。海特说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波普在阿里马找到那个把他老婆拐走的男人，把他狠揍了一顿，那人就是那个曾给我青草的花匠。

波普倒没遇上太大的麻烦，他交上罚款后就被放了出来，地方法官告诉他最好别再去骚扰他的老婆。

那年年底时，人们给波普编了一首克利普索小调，狂欢节时在街上唱起来，后来“克利普索风”艺术协会的女会员们为美国一家唱片公司灌制了这首歌的唱片。

有那么一个木匠来到阿里马，
要找一个名叫埃米勒达的娘们儿。

这可是米格尔街上的一件大事。

在学校里，我常说：“那个木匠可是个好人，是我的好朋友。”

海特也常这样，看板球赛或赛跑时，他常说：“认识他么？我常和他白天黑夜在一起唱，伙计，他可真能唱。”

波普回来时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当我和他打招呼时，他朝我大声咆哮起来。海特和其他人带着朗姆酒到他的工棚找他，他粗暴地把他们轰了出来。

海特说：“知道吗？是女人把这小子弄疯了。”

然而，波普的工棚里重新传出那以往的声音，我很想知道波普是正经八百地开始干活了，还是仍在鼓捣那些叫不出名堂的事，但我不敢去问他。

他在工棚里安上一个电灯，开始在夜里干活。经常有卡车拉来一些要寄存的东西，或运出一些东西。后来，波普把他的房子粉刷了一遍，将房子刷成淡绿色，屋顶则刷成粉红色。海特说：“这家伙真的疯啦。”

而后又补充道：“他好像又要结婚似的。”

海特倒完全没说错，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波普回来时带回来一个女人，他的老婆，我的姨妈。

“瞧瞧这种女人，”海特评论道，“她喜欢的是这类玩艺儿，根本不是男人，是冲这新粉刷的房子和里面全新的家具回来的。我敢说要是在阿里马的那小子也有这么一间干净的房子和新家具，她肯定不会跟波普回来的。”

我对这并不在意，挺高兴的，又能看见波普早晨端着朗姆酒站在路旁，用手指沾酒喝向熟人打招呼的样子了，又能问他，“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回答还是那句老话，“嘿，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件叫不出名堂来的事。”

波普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方式，仍旧把时间花费在那件叫不出名堂来的事上。他不再干活了，他老婆又回我学校旁的那户人家去干活。

当波普的老婆又回到街上后，街上的人都对波普很不满意。他们觉得自己的同情受到了愚弄和嘲讽。海特又恢复了以前的论调，“知道吗？那该死的波普实在太狂啦。”

如今，波普对此全不放在心上。

他常对我说：“孩子，今晚回家向上帝祈祷吧，那样你也会像

我一样幸福的。”

后来发生的事是那么突然，以致我们一点迹象都没察觉，连海特也是从报纸上看到才知道的。海特一直留心读报纸，常常从早上十点一直看到晚上六点。

海特惊呼道：“猜猜我看到了什么？”他给我们看纸上的标题：克利普索小调唱的木匠被监禁！

这可是一大奇闻，波普所有的一切都是偷来的。海特所说的全套新家具也是偷来的，根本不是波普做的。他只是把偷来的东西简单改装一下。偷来的东西太多了，于是他就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卖出去，就这样被人发现了。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经常有卡车停在波普家外。就连他粉刷房子的涂料和刷子也是偷来的。

“这家伙，是个傻帽儿！为什么要自己去销赃？告诉哥们儿一声，不就齐啦。”海特告诉我们这话时才披露这一切。

我们都认为他干了件蠢事，可心里深深地感到波普的确是我们这伙人中的一条好汉，比我们都强多了。

至于我姨妈……

海特说：“他得在局子里蹲多久？一年？就算表现好减刑三个月，一共也有九个月。我想她也只能尽三个月的妇道，以后吗，咱这米格尔街上就再也看不见这个埃米勒达喽，知道吗？”

但是，埃米勒达没有离开米格尔街，她仍在当厨娘，并开始干一些洗衣服和熨衣服的活。街上没有一个人因为波普蒙受蹲监狱的耻辱而难过，因为这事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可能遇到，人们只是为埃米勒达这么长时间要一人过日子而感到难过。

他像个英雄似的回来了，他成了这帮哥们中的一员，一个比海特和博加特更冲的硬汉子。

可是对我来说,他已经变了,这变化使我感到伤心。

波普开始干活了。

他开始为人们做莫里斯安乐椅、桌子和立柜。

当我问他:“波普先生,你怎么开始做那叫不出名堂的东西呀?”他的回答是一串咆哮。

“你这个捣蛋鬼,”他说,“快滚开,当心我揍扁你!”

乔治与他的粉红色房子

比起街上最高大最强壮的大脚来，我更惧怕乔治。他个头不高却很胖，留着一撮灰胡子，挺着大肚子。尽管他经常嘟嘟哝哝地骂大街，可看上去并不使人害怕，而我从来都不愿去接近他。

他就像他家院子里拴着的那头毛驴，又灰、又老，除了偶尔歇斯底里地吼叫一番外，还算是比较安分。乔治对身边发生的事从不关心。说来也怪，竟没人说乔治是疯子，可人人都说曼门疯癫癫的，我倒挺喜欢他。

乔治家的房子也令我有些不安。那是一栋破旧的木房子，外面涂成粉红色，锈迹斑驳的窗户和铁皮屋顶呈灰褐色，右面的那个门总是敞开着，屋里的墙壁从没刷过，已变成灰色。墙角有一张脏兮兮的床，对面是一张桌子和一只木凳，这就是屋内的全部陈设。没有窗帘，墙上也没有画，就连博加特房里还贴着一张劳伦巴考的画呢。

最不可思议是，乔治居然有老婆，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像波普一样，乔治乐意把屋里屋外的活留给老婆去干。他家养着奶牛，这也是我讨厌他的一个原因，因为从他家牛栏里排出的水使水沟里发出恶臭，我们在路旁打板球时常常把球掉进水沟，博伊和埃罗尔为了进球，也常常有意把球浸在水沟里弄湿。

乔治的老婆病病歪歪的，在我的记忆中她一直都是这个样

子。我觉得乔治的老婆似乎总呆在牛栏里。

乔治经常坐在水泥台阶上，背后的大门敞开着。他老婆却忙碌个不停。

乔治从未和米格尔街的哥们儿混在一起过，对此他也毫不在意。他有自己的老婆、儿子和女儿。他经常揍他们，他儿子伊莱亚斯长大以后，他就更加起劲地揍他的女儿和老婆。看来拳头对那个母亲毫无益处，她越来越瘦弱，不过女儿多利，倒是越打越壮实，她一年比一年胖，也越发能咯咯地傻笑，儿子伊莱亚斯，却越来越沉默寡言，从不说他父亲一句坏话。

海特说：“伊莱亚斯这孩子长了副菩萨心肠。”

一天，博加特对大伙说：“嘿，我真想把这老乔治暴打一顿！”

偶尔几次，伊莱亚斯来到大伙中间，海特说：“小子，我真为你感到难过，你干吗不好好教训那老家伙一顿，让他老实点儿？”

伊莱亚斯便说：“那是上帝做的事。”

那时，伊莱亚斯只有十四岁的样子，却变得如此成熟且有远大的抱负。

我十分害怕乔治，特别是他弄来了那两条阿尔萨斯大狗之后。他把它们拴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下的木桩上，真令人心惊胆战。

每天早上和下午我经过他家门时，他就对狗喊道：“去，咬他！”

于是，两条大狗扑来，跳跃着狂吠，我眼巴巴地盯着它们脖子上扯得紧紧的绳索，看上去就像马上要被挣断似的。可是，当海特抱来一只阿尔萨斯狗时，他却让它对我很友好，海特后来对我说：“别害怕狗，放心大胆地走你的路，可不要跑。”

于是，我就硬着头皮慢慢地走过乔治的家门口。

不知道是乔治讨厌我这个人，还是他不喜欢所有的人，我从

没和街上的孩子们谈论这事，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害怕那些狂吠的恶狗。

如今，我已经渐渐习惯了那两只狗的狂吠，当我走过那栋房子时，乔治发出的笑声也不再使我那么惶恐不安了。

一天，乔治站在路旁，我在他身旁走过时，听到他低声骂人，下午见到他时他还是嘟哝着那句话，第二天依旧如此，他在说：“马脸！”

有时，他咕哝说：“这里住的人好像长了张马脸。”

时而，他说：“小屁股！”

或说：“世上的人干吗都没长屁股？”

起初我装作没听见，一个星期之后，自然而然对他这些话就不那么在意了。

一天晚间，我们在路旁的板球赛打不下去了，因为博伊把球打到希尔顿太太的院里去了，那晚的球赛以六比〇告终。我问伊莱亚斯：“你爸干吗总对我那样？干吗老骂我？”

海特笑了起来，伊莱亚斯神色有些忧郁。

海特问：“骂你什么？”

我说：“那老胖子骂我‘马脸’。”我没能说出骂我的其他名堂。

海特大笑起来。

伊莱亚斯说：“伙计，我父亲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你一定要原谅他，他年纪大说话没数。他不像咱们一样受过教育，生活也很艰难，他和咱们这些人一样是有良心的。”

他是那么严肃地说出这些话，海特止住笑声。事后每逢我走过乔治家门前，总是暗暗地对自己说：“必须原谅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事。”

后来，伊莱亚斯的母亲死了，她的葬礼是米格尔街上有史以

来最寒酸、最凄惨、最令人心碎的。

前面的房子空了，使我感到格外凄凉和恐惧。

这意外事件使我有点可怜乔治。米格尔街上的哥们儿凑到海特房前谈论起来，海特说：“他把她揍得太厉害了。”

博加特点点头用右手食指在地上画着圈。

爱德华说：“我看呐，是他杀了她。博伊告诉我说，她死的前一天晚上，他听到乔治把她揍得嗷嗷乱叫。”

海特说：“你认为这地方的法官和医生是干什么的？白吃饭的吗？”

“可是，我告诉你，”爱德华说，“这可是真的，博伊不会在这种事上撒谎。那女人是叫拳头给打垮的，伦敦吃得消狂轰滥炸，乔治的老婆可吃不住。”

没有一个人替乔治说话。

博伊说出了我不愿听到的话，他说：“最让我担心的是多利，也许他还要揍她。”

海特诡秘地说：“那让咱们等着瞧吧！”

伊莱亚斯离开了我们这帮人。

葬礼之后的几天，乔治异常悲痛，他拼命喝朗姆酒，跑到街上哭喊，拍打着自己的胸膛，乞求大家宽恕他，怜悯他这个可怜螺夫。

以后的几个星期，他仍在酗酒，仍旧在街上跑来跑去，他向人们请求宽恕时，总是没头没脑地念叨着，“我的儿子伊莱亚斯，我的儿子伊莱亚斯饶恕了我，他可是个受过教育的孩子。”

当他找到海特时，海特说：“你的奶牛怎么办呀？你会给它们挤奶么？你能喂它们吗？难道你想把它们宰了吗？”

乔治把他的奶牛全部卖给了海特。

“上帝会说这是趁火打劫，”海特笑道，“我认为这是一桩买卖。”

爱德华说：“这对乔治来说有好处，他是在赎罪。”

“嗯，我也这么看，”海特说，“我给他的钱是够他喝两个月的酒啦。”

乔治离开米格尔街有一周的光景，在这期间，我们可以更多地看见多利，她把前面的房子打扫干净，从邻居那里要来一些鲜花摆在房里。她比以前更能格格地傻笑了。

不知街上的哪个人（不是我）把那两条阿尔萨斯狗毒死了。

我们都希望乔治永远别回来了。

可他还是回来了，仍旧酗酒，却不再哭喊和那么绝望了，他带来一个女人，一个典型的印度女人，半老徐娘，可看上去挺结实的，足以应付乔治的折腾。

“她也像个酒鬼。”海特说。

那女人掌管起这个家，多利只好回到后面的牛棚里去了。

我们常听到他家打人的事，大伙都说，他对多利和那新来的女人很粗暴。

我很同情那女人和多利，我真不明白，这世界上竟有愿同乔治一起生活的人。大约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波普告诉我：“乔治的新老婆跑啦，你听说了吗？”我一点也不惊奇。

海特说：“他花完了我给他的钱之后，真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我们很快便看到了结果。

那栋粉红色的房子里几乎彻夜喧嚣，许多衣着不整的女人在

房里大声喊叫，每当我走过那粉红色房子时，那些女人使用脏话戏弄我，还有些女人嘴里嚼着东西朝我喊：“来找你妈妈玩！”除了那些女人外，还有许多坐着吉普车来的美国大兵，于是，狂笑和尖叫声充斥着整条米格尔街。

海特说：“要知道，乔治这家伙败坏了咱们这条街的名声。”

米格尔街几乎成了这些新来者们的天下，海特和其他人坐在路旁聊天，与世隔绝的小天地被打破了。

可是，博加特倒对这些新来的人挺友好，每周有两三个夜晚和她们搅在一起。他装出一副对这一切很厌恶的样子，可我根本不相信，他总是口是心非。

“多利怎么样呀？”一天海特问他。

“她还成。”博加特应了一句，意思是说她挺好。

“噢，她还成，”海特说，“说说看，她倒是怎么个成法？”

“嗯，她打扫房间，做饭。”

“侍候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从博加特的话语得知，伊莱亚斯有自己的房间，一回家便呆在里面不出来。他在外面吃饭，他正在学习，准备参加一次重要的考试，对家里发生的一切毫不感兴趣。

乔治照样拼命喝酒，生意却十分兴旺，他穿起西装，还扎上了领带。

海特说：“如果他能好好地贿赂警察和那些人的话，肯定能挣大钱。”

我简直弄不明白，那些新来的女人为什么那么听他的话，似乎挺喜欢也挺敬重他，乔治却仍是老样子，一点也不像善待她们的样子。

一天，他对大伙说：“多利现在没有妈妈，我是又当爹又当娘，我看她已经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他挑选了一个叫雷泽（原意为剃刀）的男人当女婿，再也没有比这个名字更合适他的了。他又矮又瘦，棱角分明，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一撮修得整整齐齐尖尖的小胡子，他的裤缝总是熨得笔挺，身板挺得溜直，就像腰里别着一把刀似的。

而多利照旧不停地格格傻笑。

雷泽和多利从教堂结完婚，回到粉红色的房子里举行招待会，那些女人也都穿戴打扮起来，还来了不少美国大兵和水兵，喝酒、狂欢，向乔治祝贺。那些女人和美国佬逼着多利和雷泽不停地亲嘴，他们哄闹着，多利格格地傻笑着。

海特说：“知道吗？她那不是笑而在哭呢。”

那天，伊莱亚斯没在家。

女人和美国佬们唱起《甜蜜的十六岁》和《光阴流逝》，然后又起哄让多利和雷泽亲嘴，忽而有人喊道：“让他们讲话！”大伙哄笑着喊起来，“讲话！讲话呀！”

雷泽一言不发，只剩多利一人在傻笑。

“讲话，讲话啊！”客人们齐声喊叫着。

多利越发格格地傻笑。

最后，乔治开腔了：“多利，不错，你是结婚了，可别认为你就可以骑在我头上，翘尾巴了。”这些诙谐的话引起客人们一阵哄堂大笑。

多利停止傻笑，呆呆地望着大伙。

一阵极为短暂的沉默，死一般地沉静，忽然，一个美国水兵挥起手，醉醺醺地喊道：“你可以让这姑娘干点好活儿吗，乔治。”众人大笑起来。

多利从院里抓起一把沙土，举手正要朝水兵扬过去，却忽然停住，大哭起来。

顿时，爆发出一阵狂呼，欢笑。

我不知多利后来怎么样了。一天，爱德华说她住在桑哥格瑞德，海特说看见她在乔治大街市场上卖东西。总之，她离开了米格尔街再也没有回来过。

过了几个月，来的女人越来越少，停在乔治家门前的吉普车也少多了。

“你们看见了吧？”海特说。

博加特点点头。

海特补充说：“如今在西班牙港，他们有许多好地方可去。乔治的毛病在于他太蠢，根本不配当一个大老板。”

海特不愧是个预言家，过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那栋粉红色房子里就剩乔治孤零零一个人了。我常看见他一人坐在门前水泥台阶上，他再也不注意我了。他萎靡不振，神色凄惨，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不久，他死了。海特和那些哥儿们凑了点钱把他埋葬在拉如斯墓地，伊莱亚斯回来参加了葬礼。

择 业

每天午夜之后，街上能听到两次喧嚣，大约两点左右，可以听到清洁工打扫马路的声音，天亮之前，垃圾车来了，街上又传来人们往车上装垃圾的声音。

街上的孩子没有一个愿意将来成为扫马路的，如果问起任何一个孩子，他都会说：“我长大要当个卡车司机。”

能驾驶那些蓝色卡车的确是一种诱惑力，那些开车的简直可以算作贵族，他们只在清晨干点活，白天什么事也没有。尽管如此，他们动不动就罢工。其实他们罢工的要求并不高，为了一天加几分钱的工钱，或是因为某个伙伴被解雇了而罢工。战争开始时他们罢过工，战争结束了他们也罢过工；印度独立时罢工，甘地死了还罢工。

司机埃多斯特招哥儿们眼红。他说他爹当年曾是个最出色的司机，他讲了许多有关那老人技艺高超的故事。埃多斯出身于一个印度下等种族，他说的许多事都是真的，他的技术是祖传的，直接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

一天，我在打扫家门前的人行道，埃多斯过来要拿我手里的笤帚，我愿意自己扫，不愿把笤帚给他。

“小子，你知道怎么扫地吗？”埃多斯笑着说。

我说：“什么？这还有这么多道道？”

埃多斯说：“这是我干的活儿，小子，我有经验，等你长到我这么大，再干吧！”

我把符帚给了他。

事后，我觉得不是味，好像我永远永远也长不到埃多斯这么大，永远也不会得到那个所谓的什么经验似的。我比以前更加羡慕埃多斯，更加希望能够当上司机了。

然而，伊莱亚斯却不属于这种孩子。

我们这帮米格尔街上的哥们儿凑到一起蹲在人行道上聚会时，海特、博加特和大伙们一块谈论起人生、板球赛、足球赛之类的话题时，我问伊莱亚斯：“怎么，你不愿当汽车司机？那你想干什么？当扫大街的？”

伊莱亚斯朝水沟里吐了一口唾沫，低下头，一本正经地说：“我将来想当一名医生，知道吗？”

要是博伊或埃罗尔这么说，我们准会笑，但是伊莱亚斯却不同，因为他是个有头脑的人。

大伙都很同情伊莱亚斯，这孩子饱尝了他父亲乔治的拳头，却不哭喊，也从没说过他父亲的一句坏话。

一天，我要到秦记杂货铺去买三分钱的黄油，我去找伊莱亚斯陪我一起去，我感到庆幸，没有碰到乔治。

可刚出门走过两栋房子就碰见乔治，伊莱亚斯惊慌失措，乔治走过来喝道：“你要去哪儿？”说着抬手狠狠地打了伊莱亚斯一个耳光。

乔治常揍伊莱亚斯，常常用绳子把伊莱亚斯捆起来，用在牛栏的臭水沟里浸湿了的绳子抽打他。尽管这样，伊莱亚斯仍是一声不吭。可过后不久，又会看到乔治谈笑风生地和伊莱亚斯在一起，这时乔治会对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知道我们俩为

什么这么快就和好了。”

这使我更加厌恶乔治,更加喜欢伊莱亚斯。

我一直相信伊莱亚斯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医生。

埃罗尔说:“我敢打赌,一旦他当上了医生或什么,他肯定会把咱们这伙人全忘掉。对吧,伊莱亚斯?”

伊莱亚斯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哪里的话,我可不是那种人,我会给你们好多钱,还给博伊和其他的哥们儿。”伊莱亚斯挥动着小手说。我们仿佛看见有一天他成了一名医生,并拥有凯迪拉克牌汽车、黑色的手提包和电视机一类东西。

伊莱亚斯到米格尔街另一端的一个学校里去读书,那里在我看来和住家没什么两样,根本不像一所学校,只不过在外面挂了一副招牌而已,招牌上写着:

泰特斯·霍伊特
保证获取
剑桥学院文凭

还有件怪事就是乔治从此很少打伊莱亚斯了,他为自己的儿子受到教育而感到骄傲,“知道吗,这小子可学了不少鬼东西,他能读西班牙文、法文和拉丁文的书,还能写西班牙文、法文和拉丁文。”

伊莱亚斯的母亲死的前一年,他准备参加获取剑桥高中文凭的考试。泰特斯·霍伊特来到街上找到我们。

“那孩子准能以高分通过考试,”泰特斯·霍伊特说,“高分!”

我们看到伊莱亚斯穿一条熨得十分平展的卡其布裤子和白衬衣步入考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油然而生。

埃罗尔说：“伊莱亚斯答完的考卷不会留在这里，知道吗，而要送到英国去。”

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太玄乎。

“也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埃罗尔说，“伊莱亚斯可是有头脑的人。”

伊莱亚斯的母亲是一月份死的，考试结果是三月公布的。

伊莱亚斯没有通过考试。

海特一遍又一遍地看《卫报》上的名单，一边找着伊莱亚斯的名字，一边说：“要知道，人们是会经常出差错的，特别排列这么多名字时更容易出错。”

报纸上没有伊莱亚斯的名字。

博伊说：“你还指望什么？谁管这报纸呢？不是英国人吗？你指望他们让伊莱亚斯及格？”

伊莱亚斯见到我们，神色沮丧，一句话也没说。

海特说：“的确是件令人尴尬的事，要是他们长眼，看到这孩子是多么拼命，就该早早地让他通过。”

泰特斯·霍伊特说：“别着急，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今年！今年肯定会好得多，咱们也让那些英国人看看。”伊莱亚斯离开我们，搬去与泰特斯·霍伊特住在一起，我们几乎见不到他了，他没日没夜地用功。

第二年三月的一天，泰特斯·霍伊特骑车来找我们，说：“你们听说了吗？”

“什么事？”海特问。

“那孩子真是个大才。”泰特斯·霍伊特说。

“哪个孩子？”埃罗尔问。

“伊莱亚斯。”

“伊莱亚斯怎么啦？”

“那孩子通过了剑桥高中的考试。”

海特吹了一声口哨，“拿到剑桥高中的文凭啦？”

泰特斯·霍伊特微微一笑，“正是，他取得了三等的文凭，明天的报纸上就会有他的名字了，我早就说过，现在还是那么说，伊莱亚斯是个有头脑的孩子。”

过后，海特说：“真可惜伊莱亚斯的父亲死了，他是个笨蛋，可总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

晚上，伊莱亚斯回来了，街上的大人小孩把他给围了起来。人们海阔天空地摆起龙门阵来，可没人提到明天就要见报的名单，伊莱亚斯也和大伙谈论起电影、女人和板球赛的一些事，可他神色仍旧十分严肃。

一阵短暂的沉寂之后，海特说：“现在你打算干什么呢，伊莱亚斯？去找个活儿干吗？”

伊莱亚斯吐了一口唾沫说：“嗯，我准备再考一次。”

我说：“为什么？”

“我想考一个二等的文凭。”

我们明白了，他想当一个医生。

伊莱亚斯在人行道上坐下来，说，“嗯，伙计，我想再考一次，今年我一定要考好，非让那些剑桥先生们看到我的答卷后拍案叫绝不可。”

我们静静等着下文。

“是英语和温学（文学）把我的分数拉下来了。”

温学（文学）这个词从伊莱亚斯嘴里说出来，使我感到格外动

听,听起来倒更像是说一种美味的东西,像巧克力一样醇厚、香甜。

海特说:“这么说你还得学像湿歌(诗歌)之类的玩艺儿。”

伊莱亚斯点点头,我们却感到不平,竟让伊莱亚斯这样的孩子去学什么温学和湿歌。

伊莱亚斯搬回那栋粉红色的房子来往,自打他父亲死后那房一直空着。他边学习边工作。他回到泰特斯·霍伊特的学校,这次可不再是学生而是一名教员,泰特斯·霍伊特称每月付给他四十块钱的薪水。

泰特斯·霍伊特说:“他受之无愧,他在西班牙港也算是个数得着的聪明孩子。”

如今,我们越发注意重新回到我们中间的伊莱亚斯,他是我们街上最整洁的男孩,他每天洗两次澡,刷两次牙,他站在院里的水管前完成这些盥洗程序。每天去学校前,他总是先把屋里打扫干净再走。他和他父亲完全相反,他父亲又粗又矮,而且十分邋遢,他却又高又瘦且十分整洁;他父亲酗酒成性,满口粗话,他却从不喝酒,也从没听他讲过一句粗话。

我母亲常对我说:“你就不能学着点伊莱亚斯?真不知上帝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儿子,你这坏小子。”

每当海特或爱德华·博伊和埃罗尔时,他俩便会叫道:“为什么打我们?知道吗,我们可比不上伊莱亚斯。”

海特常说:“伊莱亚斯不光有头脑,而且人也不错。”

所以当听说伊莱亚斯第三次考试失败时,我还有些幸灾乐祸。

海特说:“你们想,咱们哪能去和人家英国人比,咱们这里没

有一个人说这孩子通不过考试，可那些人会让他取得更高等级的文凭吗？”

所有的人都说：“确实是件令人尴尬的事。”

海特问起伊莱亚斯：“你现在准备干什么，伙计？”

伊莱亚斯答道：“我吗，我想去找个活干，打算当个卫生检疫员。”

我们谈论起，他如何穿着卡其布的裤子和卡其布的卫生检疫制服，带着一个笔记本走门串户。

“是的，”伊莱亚斯说，“卫生检疫员，这正是我所要干的工作。”

海特说：“我想这活儿能挣不少钱，听说你父亲乔治过去一个月给卫生检疫员五块钱行贿，现在有八到十个这样的人，这就是，……让我算算看……十个五块就五十，八个五块就是四十，嗯，就是五十或四十块，除了工资之外，你可以得这么多。”

伊莱亚斯说：“我倒不太在乎钱，我确实喜欢这工作。”

这不难理解。

伊莱亚斯说：“不过还需要通过考试才行。”

海特说：“这次他们就不用把答卷送到英国去了吧？”

伊莱亚斯说：“唉，还要送。你知道，我真害怕考试之类的事，对付这种事我一向运气不好。”

博伊说：“可我还以为你仍想学医呢？”

海特说：“博伊，你再多嘴多舌的，小心我割掉你的舌头。”

其实，博伊并无恶意。

伊莱亚斯说：“我改主意了，觉得还是当个卫生检疫员好，我的确喜欢这份工作。”

连续三年，伊莱亚斯参加了卫生检疫员的考试，可每次都落选了。

伊莱亚斯说：“特立尼达竟成了这么个鬼地方，你想剪掉自己的脚指甲也得去行贿才成。”

海特说：“那天我见到一个船上的人，他告诉我说英属圭亚那录取卫生检疫员的考试很容易通过，你该去英属圭亚那参加考试，然后再回来工作。”

伊莱亚斯乘飞机前往英属圭亚那，参加了考试，没能通过，便飞回来。

海特说：“我见到一个从巴巴多斯来的人，他对我说在巴巴多斯非常容易通过考试。”

伊莱亚斯飞往巴巴多斯，考试再次失败，又飞了回来。

海特说：“那天，我见到一个从格林纳达溜来的人……”

伊莱亚斯说：“闭上你的臭嘴！都住在一条街，别让咱俩成冤家。”

几年以后，我参加了剑桥学院的考试，我得到一张二等文凭，没费多少事就在海关找了个工作，还领到一套带铜纽扣的卡其布制服和一顶帽子，挺像卫生检疫员的制服。

我第一天穿上那套制服时，伊莱亚斯要揍我。

“你妈妈给你穿了一套什么东西？”他吼叫着，我也冲了过去，埃多斯把我们给拉住了。

埃多斯说：“他只是太伤心和妒忌，没有其他意思。”

伊莱亚斯从此便开起一辆垃圾车，当上了街头贵族。

“这活用不着理论，”伊莱亚斯常说，“很实际，我的确喜欢这份工作。”

曼 门

米格尔街上人人都说曼门疯了，全不理睬他。我倒看不出他有什么不正常，反而觉得不少人比曼门更像个疯子。

看上去他一点毛病也没有。他中等身材，单薄，样子也不难看。他从没像疯子那样死盯着人看，你和他说话，他也会很得体地答话。

不过，他有的习惯是有些稀奇古怪的。

他每一次参加选举，不论是市政议员竞选，还是国会竞选，都会在本区里到处张贴标语，那些标语印刷十分精美，上面写着“投票”，下面是曼门的照片。

每次竞选他都能得到三票，这使我挺纳闷。曼门会投自己一票，可谁投那两票呢？我去问海特。

海特说：“小子，我也说不准，的确是件怪事，也许有那么两个爱开玩笑的人吧，如果他们每次都鼓捣这种名堂，可就太奇怪了，八成儿他们也和他一样神经有毛病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老是在想着那两个投曼门票的人。每当看到某人做事有些古怪，就马上联想到他也许就是投曼门票的人吧。

在这城市茫茫的人海之中有那么两个神秘的人。

曼门从不去做工，可也从没闲着。他对书法很着迷，尤其愿意

写字，他能整整一天只写同一个词。

一天，我在米格尔街头碰到曼门。

“孩子，你去哪里？”曼门问道。

“去学校。”我说。

曼门神情庄重地看着我，模仿着我的语调说：“这么说你是上学去喽，嗯？”

我机械地应道：“是的，我是去上学。”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模仿曼门那规范的英国腔。

曼门的口音也令人琢磨不透，他说话时，如果你闭上眼，就好像在跟一个不太注意语法的英国绅士谈话。

曼门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原来这个小家伙是去上学。”

随后，便撇开我，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支长长的粉笔，在人行道上写起来，先写了一个大大的空心“S”外框，而后将空白涂满，随后依次写其他字母空心外框，写完“C”又写个“H”，而后再是“O”，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写起“O”来，一个比一个小，越写越潦草。

中午我回家吃饭时，他已经来到法兰西大街，仍在写着“O”，手里还攥着一块破布用来擦写错的地方。

下午时，他已经在周围的街道上转了一圈，又回到米格尔街。我回家换下校服，穿上家里的衣服，来到街上。

他现在已来到米格尔街的中间。

他说：“这么说，今天小家伙去上学啦？”

我说：“是的。”

他站起来，挺直身体。

随后，又蹲下来，在地上画出一个空心“L”的外框，聚精会神地慢慢地把轮廓里的空白用粉笔涂满。涂完后，他直起身来，说：“你干完了你的事，我也完成了我的事。”

他就是这样，如果你告诉他你要去看板球赛(CRICKET)，他便先写下“CRICK”然后再专心专意地写起“E”来，直到下次再看到你为止。

一天，曼门来到米格尔街最繁华地段上的一家大咖啡馆里，像条狗一样，朝坐在凳上的顾客咆哮。身材高大，长满汗毛的葡萄牙店主说：“曼门，快滚出去，别等我来收拾你。”

曼门只是狂笑。

结果他们把曼门架了出去。

第二天，店主发现夜晚有人进过咖啡馆，把里面所有的门窗统统打开了，不过店里什么也没丢。

那天夜里，又有人潜入店里，打开了所有门窗。

第三天夜里，再次有人进了咖啡馆，留下一摊粪便。

以后好几个星期，店主成了街上大家谈论的笑料。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重新开始光临那家咖啡馆。

海特说：“叫我说呀，伙计，可千万别和这种人沾边。这些人都是坏心肠，上帝让他们受到惩罚。”

这类事使人们远离曼门。他惟一的朋友是一只白色耳朵上有黑色斑点的杂种狗。那是一条像曼门一样古怪的狗，它从来不叫也从不正眼看人，你要是看它，它就把视线移开。它从不和其他狗在一起，要是有的狗接近或是攻击它时，它便轻蔑地看一眼，头也不回，从容不迫地走开了。

曼门爱他的狗，那狗也爱他，他俩真是天生的一对，曼门的生活也依仗着这条狗。

曼门一手操纵并发起了那场狗屎运动。

海特说：“这事真把我给震住了，真搞不明白这家伙是怎么想出来的。”

一天清早，好几个主妇起床后发现昨晚晾在外面漂白的衣服给人抹上了狗屎，谁也不想再要这些脏床单和衬衫了，曼门毫不困难地从那些人手里得到了这些东西。

曼门便把这些衣服卖掉了。

海特说：“这事叫我们怀疑他到底是真疯还是装疯。”

曼门的恶作剧在米格尔街很快有了效仿者，那些受过曼门的狗屎伤害的人们，更是希望看到别人遭受到同样的损失。

我们米格尔街上的哥儿们，对街上有这么一个人，颇有些得意。

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曼门改邪归正的，也许是他的狗死了的缘故吗？那条狗是让一辆汽车撞死的。海特说：“它只是嗷地叫了一声就断气了。”

有好多天，曼门神志恍惚，茫然不知所措。

他再也不在人行道上写字了，也不同我以及街上其他人搭话了。他开始自言自语说话，双手紧握在一起，像发疟疾似的不停地颤抖。

后来有一天，他洗完澡后宣称见到了上帝。

好多人对这事一点也不吃惊，在西班牙港这类事很多。真的，那时在特立尼达的确不少。来自富爱特丛林那个神秘的按摩师首先开的头，他说他看见了上帝，还写了一本叫《上帝对我说》的书。许多神秘主义者和不少按摩师争相宣称自己见到了上帝。我想既然上帝就在这一带，那曼门看到他也是很自然的。

曼门开始在米格尔街拐角处玛丽太太店铺前的遮阳篷下讲道。他留起胡须，穿上一件长长的白袍子，每星期天的晚上拿着

本《圣经》和其他布道用的东西，站在刺眼汽灯下讲道。他是一位能打动人心的传教士，他的说教方式十分古怪，他可以让女人们痛哭流涕，能叫海特那样的人心惊胆战。

通常，他右手拿着《圣经》，左手不停地拍打着它，用他那动听的英国腔说：“那些日子我和上帝谈过话，他对我说，你们这些人不听他的话，老是听那些政客们宣讲要实行本岛自力更生的言论。你们知道昨天晚上，上帝对我说什么？就在昨晚我刚刚吃完饭，上帝说，‘曼门，过来看，这些人。’他指给我看，一些丈夫们在吃妻子的肉，妻子们在吃丈夫的肉，父亲们在吃儿子，母亲在吃女儿，兄弟吃姐妹，姐妹吃兄弟，这就是那些政客宣传的本岛自力更生的景象，但是兄弟们，现在求助于上帝还为时不晚。”

听过星期天曼门的讲道，我常常做噩梦。奇怪的事，他越是令人感到恐怖，来听他布道的人越多，给他的捐款也就越多。

平日他身穿白袍，四处闲逛乞讨食物，他说他是受耶稣之命这么做的，已经把自己拥有的一切贡献出去了。面对他那一脸大黑胡子和那双明亮深邃的眼睛，人们无法拒绝他所提出的要求。他再也不注意我了，再也没有问我：“这么说你是去学校啦！”

米格尔街上的人，不明白是什么促成这一变化，只是为了安慰自己才说：“曼门真的疯了。”其实，我认为他们也吃不准曼门是不是真的疯了。

以后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人意料。

曼门宣称他就是新的救世主。

一天海特说：“你们听说了没有？”

我们问，“什么事？”

“关于曼门的事，他说最近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没人去招惹他。”爱德华说，“现在人人都害怕他。”

海特解释说：“不是那么回事，他要把自个儿钉死在十字架上。没准儿哪个星期五他就要到蓝色洼地去，把自己绑在十字架上，让人们用石头把他砸死。”

有个人笑起来，我想是埃罗尔，他发现就他一个人在笑，便沉默下来。

除了惊奇和担心外，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人们将会说曼门是住在米格尔街的。

一些手写的小告示出现在商场、咖啡馆和一些住宅大门上，宣称曼门不久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蓝色洼地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海特预言道，接着又颇有几分得意地说，“听说他们还派了一些警察去。”

那天一大早，商店还没有开门，阿瑞厄皮塔大街上的电车还没有开，米格尔街头上却聚集了一大群人。有许多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和更多穿白衣服的女人，他们唱着圣歌。周围还有十来个警察，他们没唱圣歌。

曼门出现了，瘦骨嶙峋，神态庄严，令人肃然起敬。女人们哭着朝他扑过去，争相摸他的长袍。警察站在周围随时准备应付意外的意外。

一辆大卡车运来一个巨大的十字架。

海特身穿毛哔叽西服，郁郁不快地看着，说：“他们说那是用制火柴杆的木料做的，一点不重，很轻很轻的。”

爱德华忿忿地说：“这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心和灵魂。”

海特说：“我也没说不是啊。”

一些人从卡车上抬下十字架要交给曼门，却被他拒绝了，他那浓重的英国口音在清晨里显得格外的深沉，“不是在这里，等到了蓝色洼地用吧。”

海特感到失望。

我们朝蓝色洼地走去，经过西班牙北方的瀑布，两个小时后我们来到目的地。曼门背起十字架离开大路，沿着石岩上的小路攀上去，再下到洼地中心。

一些人竖好十字架，把曼门挪到上面。

曼门说：“用石头砸我，兄弟们。”

女人们流着眼泪把沙子和碎石子扔到他的脚下。

曼门呻吟着说，“上帝啊，饶恕她们吧，她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随后他厉声唱道：“用石头砸我啊，兄弟们。”

一块鸡蛋大小的碎石砸在他的胸膛上。

曼门高声喊道：“用石头砸我啊！我会饶恕你们的。”

爱德华说：“这人真勇敢。”

人们开始扔大块的石头，砸到曼门的脸上和胸脯上。

曼门显出痛苦和吃惊的样子，他尖声叫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喂，快把我从这玩艺上解下来，快放我下来！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些往我身上扔石头的杂种！”

这声音传到爱德华、海特和我们其他人站的地方，变成了极端痛苦的哭喊。

一块更大的石头砸在曼门身上，女人们仍在朝曼门投沙子和碎石块。

我们听到曼门喊叫声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清楚，“别干这种蠢事了，我说快停下！我已经完成了这鬼差事，听见了吗？”说罢便扯开嗓门粗野地咒骂起来，人们吃惊地停下来。

警察带走了曼门。

当局把曼门监禁了起来，从此他就永远消失了。

布莱克·沃兹沃斯

每天都有三个乞丐准时来到米格尔街好客的住户门口乞讨。十点钟左右，一个穿着白衣、缠着腰布的印度人首先来到，我们把一小罐米饭倒进他背上的一只口袋里。十二点钟，那个叼着泥烟斗的老太婆来了，我们给她一分钱。下午两点，一个盲人由一个男孩引路，来讨他的那份钱。

有时，我们也布施流浪汉。有个男人一天来到这儿，说他饿坏了，我们就让他饱餐了一顿。尔后，他又要了支香烟，直到我们替他把香烟点燃后才肯离去，以后那个人再也没来过。

一天下午大约四点钟的时候，来了一个非常古怪的流浪汉。我已经放学回家，刚刚换好便服，听到他在叫我：“小弟弟，我可以进你家的院子吗？”他身材瘦小，穿戴整齐，戴着一顶帽子，穿着一件白衬衫和一条黑裤子。

我问道：“你想干啥？”

他说：“我想看看你们的蜜蜂。”

我家院里有四棵大王棕榈树的幼树，上面聚满了不清自来的蜜蜂。

我跑上台阶，喊道：“妈，有个人在院子这里，他说想看看蜜蜂。”

妈妈走出来，上下打量着他，极不友善地问：“你要干吗？”

那人说：“我想看看你们的蜜蜂。”

他英语讲得太好了，简直近乎做作。我看出妈妈有些不放心。

她对我说：“呆在这儿，他看蜜蜂时盯着他点儿。”

那人说：“谢谢您，太太。今天您做了件好事。”

他讲得极缓慢而清晰，仿佛说出的每个字都要花掉他的钱一样。

我们一块儿看着蜜蜂。他和我，蹲在棕榈树下，大约有一个小时的光景。

那人说：“我喜欢看蜜蜂，小弟弟，你喜欢看蜜蜂吗？”

我说：“我可没那工夫。”

他沮丧地摇着头，他说：“我就干这个，就是看。我能一连看上好几天。你看过蚂蚁吗？还有蝎子、蜈蚣和两栖鲛什么的，你都看过吗？”

我摇摇头。

我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先生？”

他站起身来说：“我是诗人。”

“是个好诗人吗？”我问道。

“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先生？”

“B·沃兹沃斯。”

“B 是比尔的意思吧？”

“是布莱克，布莱克·沃兹沃斯。怀特·沃兹沃斯是我哥哥，我们心心相通。就是看到一朵像牵牛花一样的小花，我都想哭出来。”

我问：“你为啥哭？”

“为啥，孩子？为啥？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啦。要知道，你也是

个诗人。你成了诗人以后,任何一件事都会使你哭出来的。”我笑不出来。

他问:“你喜欢妈妈吗?”

“她不打我的时候,喜欢。”

他从后裤兜里掏出一张印有铅字的纸片,说:“这上面是首描写母亲的最伟大的诗篇。我打算贱卖给你,只要四分钱。”

我跑进屋,说道:“妈,你想花四分钱买一首诗吗?”

妈妈说:“你听着,告诉那个该死的家伙,赶快给我夹起尾巴滚出去。”

我对B·沃兹沃斯说:“妈妈说她没有四分钱。”

B·沃兹沃斯说:“这就是诗人的遭遇。”

他把那张纸片放回裤兜,好像并不介意。

我说:“像你这样到处转游着卖诗倒挺有意思。只有那些唱克利普索小调^①的人才干这种事。有很多人买吗?”

他说:“从来没人买过。”

“那你为什么还要四处转游?”

他说:“这样我就可以看到许多东西,我还一直希望遇到别的诗人。”

我说:“你真认为我是个诗人吗?”

“你像我一样有才华。”他说。

后来,B·沃兹沃斯走了。我暗自祈祷,但愿还能再见到他。

大约一周以后的一天下午,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在米格尔街的拐弯处又见到了他。

①:一种起源于西印度群岛,临时编唱的小调,常以讥讽时事为主题。

他说：“我已经等你很久啦。”

我问：“卖掉诗了吗？”

他摇摇头。

他说：“我院里有棵挺好的芒果树，是西班牙港最好的一棵。现在芒果都熟透了，红彤彤的，果汁又多又甜。我就为这事在这儿等你，一来告诉你，二来请你去吃芒果。”

他住在阿尔贝托街上的一间小棚屋里，正好在街中段。院子里绿茵茵的，还有一棵高大的芒果树、一棵可可树和一棵李子树，这地方看上去很荒凉，好像根本不在城里。在那儿一点儿都看不到街上高大的混凝土建筑。

他说得不错，芒果汁又多又甜，我一连吃了六个。橘黄色的芒果汁顺着胳膊一直流到臂膀上，从嘴角流到下巴上，我的衬衫也染上了果汁。

回到家后，妈妈问我：“你窜到哪里去啦？你以为你已经长成大人了，可以到处疯去啦？去，给我拿根鞭子来！”

她打得可够狠的，我从家里逃出来，发誓再也不回去了。我来到B·沃兹沃斯家。我气极了，鼻子流着血。

B·沃兹沃斯说：“别哭啦，咱们一块去散散步吧！”

我停止了哭泣，却还在抽抽搭搭。我们散着步，走过圣克莱尔大街，来到“大草原”，沿着跑道漫步。

B·沃兹沃斯说：“喂，咱们到草坪上躺一会儿，看看天空，我想让你猜猜那些星星离我们这儿有多远。”

我按他说的做了，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忘记了一切，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骄傲和愉快。我的气愤一扫而光，我忘掉了眼泪，忘掉了刚刚饱尝过的那顿鞭挞。

当我告诉他我觉得好些的时候，他就开始告诉我星星的名

字。搞不清为什么我对猎户星和猎户星座记得尤其牢，直到今天我还能一下子指出它来，其他的却早已忘得精光。

忽然，一道光束照在我们脸上，一个警察出现在面前。我们赶紧从草地上站起来。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警察问道。

B·沃兹沃斯说：“已经四十年啦，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B·沃兹沃斯和我。他对我说：“关于我，还有芒果树、可可树和李子树的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一定要保守秘密。假如你告诉了别人，我会知道的，因为我是诗人。”

我起了誓，而且一直守信用。

我很喜欢他的小房间，里面的家具还没有乔治家临街的那间屋里的多，但看上去更干净，也更舒服，可也显得很冷清。一天我问他：“沃兹沃斯先生，你为什么在院里留这么多灌木丛？会不会使这儿太潮湿呀？”

他说：“听着，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个男孩遇见一位姑娘，他们很快相爱了，他们彼此深深地爱着，后来就结婚了。他俩都是诗人，少年喜欢优美的文学，姑娘酷爱花草树木。他们在一间小房子里生活得非常愉快。有一天，女诗人对那位少年诗人讲：‘咱们家里又要增加一个诗人啦！’但是，那个小诗人并没有出生，因为姑娘死了，他也随她去了，死在姑娘的肚子里。姑娘的丈夫非常难过，决定从此再也不去动姑娘花园里的一草一木。于是，花园留下来了，树木、花草没人管理，越长越高。”

我看着B·沃兹沃斯，当讲述这个动人的故事时，他显得更加苍老。我听懂了他的故事。

我们总是一起去做长距离的散步，我们去植物园和岩石花园。黄昏时，登上了“校长”小山，观看西班牙港渐渐被黑夜所笼

罩，城里和码头上的轮船渐渐灯光闪烁。

他做每一件事，都像参加盛典一样郑重其事，似乎是平生头一回做一样。

有时他会问我：“喂，去吃冰激凌怎么样？”

当我表示同意时，他变得非常严肃，说：“那么，咱们去光顾哪家冷食店呢？”好像这也是桩异常重要的事一样。他常常为这合计好半天，最后才说：“依我看，我该先去这家打听一下价钱。”

这世界真是个令人振奋的地方！

一天在他院里，他对我说：“我准备告诉你一个重要的秘密。”

我说：“真的是秘密吗？”

“这会儿还是秘密。”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说：“记着，只有你我知道。我正在写一首诗。”

“噢。”我失望了。

他说：“这可不是一首普通的诗，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

我噓了一声。

他说：“到现在，我已经写了五年啦。再有二十二年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如果我能保持现在这个速度的话。”

“那么，你现在每天都写很多吗？”

他说：“不像以前那样多了。每月只写一行，不过肯定是非常出色的一行。”

我问：“上个月写的那行是什么？”

他仰起头看着天空说：“往昔深邃而奇妙。”

我说：“是行很美的诗。”

B·沃兹沃斯说：“我希望能把一个月的体会感受全部倾注到

这行诗句中去。这样二十二年以后，我就会写出一首震撼全人类的诗篇。

我充满了惊叹之情。

我们像往常一样去散步，一天，我们沿着港口的防波堤走着，我说：“沃兹沃斯先生，假如我把这颗钉子扔到海里，你说它能浮起来吗？”

他说：“世上无奇不有，把钉子丢下去，咱们看看会怎样？”

钉子沉了下去。

我又问：“这个月的诗写好了吗？”

但是，他没有吟诗，只是说：“噢，就要好啦，你知道，就要好啦。”

有时我们坐在防波堤默默地望着进港的轮船。

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那首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

我觉得他一天天在衰老下去。

“你是怎么生活的，沃兹沃斯先生？”有一次我问他。

他说：“你是问我从哪里弄来钱吧？”

我点点头。他狡黠地笑了起来。

他说：“每年唱克利普索小调的季节时，去唱小调。”

“那够你一年生活的吗？”

“足够啦。”

“等写完了那首最伟大的诗，你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吧？”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一天，我到他的小房子里去看望他，发现他躺在小床上。他看上去是那么虚弱、苍老，我真想大哭一场。

他说：“诗写得不太顺利。”

他并没看我，而是透过窗户看着那棵可可树，就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似的，喃喃地诉说着：“二十岁的时候，我好像有使不完的劲。”这时，仿佛就发生在我眼前一样，他的脸骤然变得更加苍老、疲倦。“可那……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就在这时，我好像被妈妈打了一顿耳光。突然，我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我在他的脸上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谁都会看出的，死神已经爬上了那张布满皱纹的面孔。

他看着我，看见我眼含热泪，挣扎着坐起来。

他说：“过来。”我走过去坐到他的膝盖上。

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嗯，你也看到它了，我一直说你具有诗人的眼光。”

看上去他并不难过，这使我再也控制不住，大声哭了起来。

他把我搂到他那瘦削的胸前，说：“你想听我再给你讲个有趣的故事吗？”他冲我鼓励地微笑着。

可是我什么也说不出。

他说：“我给你讲完这个故事后，你要答应我马上回家，再也不要来看我了，好吗？”

我点点头。

他说：“很好，现在听我讲，以前我给你讲过一个关于少年诗人和女诗人的故事，你还记得吗？那不是真事，是我编出来的。还有那些什么作诗和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也是假的。你说这是不是你听过的最好笑的事情？”

他的声音中断了。

我离开了小房子，跑回家，大哭了起来。像诗人一样，看到什么都想哭。

一年后，我又来到阿尔贝托街，可是再也看不到那栋小房子了。倒不是它突然消失了，可是和消失差不多。它被人们扒掉了，一栋二层楼的建筑取代了它。芒果树、可可树还有李子树也被人们砍倒了，留下的只是一片水泥砖铺成的地面。

一切都好像表明B·沃兹沃斯从来没有到过这个世界。

懦夫

“大脚”的身材确实高大，他肤色黝黑，米格尔街上的所有人都害怕他，倒不是怕他魁伟的身躯和黑黝黝的皮肤，比他还高还黑的人也不少，人们是害怕他那副闷声不响、脸色阴森的模样。他的目光凶狠冷酷，就像那些从不狂吠而用眼角瞅人的恶犬。

海特常说：“知道吗，他只是装出那么一副吓人的样子，他闷声不响是因为他根本就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海特在赛马场和看板球赛时常对各种各样的人说：“‘大脚’和我呀，俺俩是铁哥们儿，从小一块长大的。”

在学校里，我自己也常说：“知道吧，‘大脚’住在我们街上，我和他可好啦，你们谁要敢欺负我，我就告诉‘大脚’。”

其实，那时我还从没和“大脚”说过一句话。

我们米格尔街上的哥们儿提到“大脚”无不感到脸上有光，因为他在西班牙港也算是个人物，颇有名气。“大脚”曾往特立尼达广播电台的大楼上扔石头，打破了窗户上的玻璃。当地法官问他为什么这么干时，他只说了一句，“把他们叫醒。”

一个好心肠的人替他交了罚款。

那时，他刚找到一个开柴油公共汽车的活儿。他把车开往卡瑞纳治，出城后大约五英里的时候，他叫乘客们统统下车站在太阳地里晒着，他站在一旁观看。

后来，他又找了一个送信的差使，他经常把信送错地方。人们常看见他坐在码头上，身旁放着半袋子信件，两只“大脚”丫子泡在巴里河海湾里。

他说：“这活儿真没劲，整天到处跑给人家送信，简直把人变成邮票啦。”

所有特立尼达的人都认为“大脚”是个爱搞恶作剧的滑稽的小丑，可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却不这么认为。

正是像“大脚”这样的人坏了我们这帮哥们儿的名声，“大脚”时刻准备和另一帮人斗殴。他看上去实在太魁梧、太凶狠，致使从没有人敢和他较量，他每次蹲班房的记录也从没超过三个月。

海特尤其害怕“大脚”，他常说：“我真不知道他们干吗不把他关在监狱里。”

也许你会认为，狂欢节中，“大脚”敲起盘子在街上跳舞时，脸上该有点笑模样了吧。其实不然，即便在这种场合，他照旧板起一副冷酷无情的面孔，瞧着他那敲盘子的架式和他那种极其严厉的神态，你会觉得他正在干一种非常严酷的事。

一天，我们这一大帮，海特、爱德华、博伊、埃罗尔和我一块去看电影。我们坐在一排看电影，兴高采烈地大声说笑着。

忽听背后有人轻轻地说了声：“闭嘴。”

我们转过身来，看到“大脚”。

他慢慢腾腾地从兜里掏出一把折刀，打开后插在我们座椅背后。

他眼睛看着电影屏幕，平和却又令人胆寒地说：“谈吧。”

直到电影结束，我们谁也没说过一句话。

过后，海特说：“只有警察的儿子才敢这么做，警察的儿子，还有神父的儿子。”

博伊问：“你是说‘大脚’是神父的儿子？”

海特说：“你真傻帽儿！神父怎么会有儿子？”

我们从海特那里听到不少有关“大脚”父亲的事，他似乎和“大脚”差不多，也是个凶狠冷酷的人物。当博伊、埃罗尔在一起谈论我们中谁挨揍最多时，博伊说：“咱们挨这么点揍算什么，‘大脚’挨他父亲的揍那才叫惨呢。他之所以长这么高大是被打出来的，知道吗。那天我在大草原见到一个从贝尔蒙特来的小伙子，他说挨揍能使人长高。”

埃罗尔说：“傻帽儿，小子，你怎么让那小子给蒙了？”

有一次，海特说：“‘大脚’的父亲，那个警察每天都要揍‘大脚’，就像吃药一样，一天三次，饭后准揍。”“大脚”挨揍后常说：“等我长大了有了孩子，我也揍他们，狠狠地揍。”

我从没说过这话，实在说不出口，可每次我妈揍我时，我也常这么想。

我问海特：“‘大脚’的妈妈呢？她也揍他吗？”

海特说：“喂，那还了得！非把他揍死不可。‘大脚’没有妈妈，算是老天有眼，他父亲没结过婚。”

那些日子，美国兵在西班牙港口到处可见，城里格外喧闹。没过多久，孩子们便发现他们是很容易接近的人，而且乐于助人。海特想出一个小小的生财之道，他让我们五个人在附近讨口香糖和巧克力。我们每交给他一包口香糖，他给我们一分钱，有的时候我一天可得一毛二分钱。别的孩子后来告诉我说，海特把口香糖拿去每包卖六分钱，可我一点都不信。

一天下午，我站在家门前的人行道上，看见一个美国兵从街头朝我走来。当时大约是下午两点左右，天气很热，街上没有行

人。

我跑过去说：“有口香糖吗，乔？”那美国佬吓了一大跳。

他嘟哝着什么小要饭之类的话，看他那样像是要揍我似的。虽说他个头不太高，可我想八成他已经喝醉了。

他咬紧牙关。

忽然传来一声粗哑的喊声：“喂，你听着，放开那个孩子。”

是“大脚”。

他不再说第二句，美国佬就一下软了下来，努力装出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走开了。

“大脚”瞧都没瞧我一眼。

从此，我再也没有说过“有口香糖吗，乔？”。

尽管发生了这事，我还是不喜欢“大脚”，我想我还是有点害怕他。

我把美国佬和“大脚”的事告诉了海特。

海特说：“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佬都这样，别为这一天白白丢掉一毛二分钱。”

可我拒绝再出去讨了。

我说：“要不是‘大脚’，那家伙非吃了我不行。”

海特说：“你知道，幸亏‘大脚’的父亲在他未成年前就死掉了。”

我问：“那么，‘大脚’的父亲怎么啦。”

海特说：“你没听说吗？那可是件大事。一九三七年，黑人在油田发生暴乱时，一大群黑人把他活活打死了，那时‘大脚’的父亲可真像个英雄，就像现在‘大脚’这么神气。”

我说：“海特，你为什么不喜欢‘大脚’呢？”

海特说：“我和他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我说：“那你为什么害怕他？”

海特说：“你不是也害怕他吗？”

我点点头，“可我总觉得你好像是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所以有些担心。”

海特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只不过是开玩笑，以前我们这帮哥们儿常捉弄他。知道吗，那时他又瘦又矮，我们常在一块玩捉迷藏，每次他都跑不掉。”

我为“大脚”感到难过。

我问：“那有什么意思？”

海特说：“你听着，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大脚’后来成了我们中间跑得最快的，在学校运动会上，他跑一百码只用了十点四秒。他们是这么说的，你知道特立尼达人不会计算时间，后来我们大伙都想和他好，可他根本就不想和我们在一起。”

我真不明白，“大脚”为什么不揍海特和其他那些小时候曾欺负过他的人。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喜欢“大脚”。

“大脚”曾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木匠，而且还做过两三个巨大立柜，做工粗糙，样式丑陋，居然他还能把它们卖了出去。后来他当上了泥瓦匠，特立尼达手工业者没什么可自豪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专家。

一天他来到我家院里干活。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我不跟他说话，他也不同我讲话，我看到他用他的脚当泥铲，他嘟囔着：“这活儿真要命，老是得弯着腰。”

他活儿干得蛮地道，他的“大脚”的确有两下子。

约摸四点多时候，他停下手来，开口跟我讲话了。

他说：“小子，咱们去散散步，我热得很，出去凉快凉快。”

我不愿去可又不能不去。

我们来到码头里的海堤上，望着大海，天渐渐暗下来，海港里的灯光闪烁，天地骤然扩大了很多，四周静悄悄的一片黑暗，我们默默地站起身来。

突然，一声尖厉的狂吠撕裂了黑夜的寂静。

这突如其来奇特的声音一下把我给吓呆了。

原来是一条狗，一条白黑相间、耷拉着两只大耳朵的狗，浑身水淋淋的，友善地摆着尾巴。

我说：“来呀，小东西。”那条狗抖了抖身上的水，水珠溅到我的脸上，然后颤巍巍地朝我跑来。

刚才我已经忘掉了“大脚”，等再回头找他时，看见他已逃到二十多码远的地方，还在拼命地奔跑。

我大声喊道：“没事，‘大脚’。”

没等我的喊声发生效力，他已经停了下来。

他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啊！天哪！疼死我喽！一个大瓶子扎进了我的脚。”

我带着那条狗朝他跑去。

当他看见那条狗朝他跑来时，他似乎已经忘记正在汨汨流着血的脚，紧紧地抱起那只湿漉漉的狗，轻轻地抚摸它，发出阵阵怪笑。

他脚的伤很重，第二天我见他用绷带包扎起来。他无法再到我们院子里来完成那件活儿。

我觉得我比米格尔街上的任何人都更了解“大脚”，总担心自

己是不是知道得太多。我觉得自己就像电影上的一个走卒，因为知情而遭杀身之祸。

后来，我意识到“大脚”已经明白了我的想法，而且特别怕我讲出去。

我一直替“大脚”保守秘密，我很想告诉“大脚”，别这样担心，可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方式。

他在街上那种装腔作势的样子使我很不舒服，我真想对海特说：“我都不怕他，你们干吗这么害怕他？”

有一次，埃罗尔、博伊和我在人行道谈论起战事。

埃罗尔说：“要是他们让安东尼·艾登勋爵当总理，我们准能狠狠揍那些德国人。”

博伊说：“艾登勋爵能干些什么呢？”

埃罗尔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

我说：“不错，我常想要是让艾登勋爵当总理，战争就能很快结束。”

博伊说：“你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德国人是什么样。要知道德国人长得像魔鬼一样强壮。有个小子告诉我说，德国人可以把铁钉嚼碎吞下去。”

埃罗尔说：“可是还有美国帮着我们。”

博伊说：“可是他们没有德国人那么高，所有的德国人都像‘大脚’那么高大和强壮，知道吗？他们比‘大脚’还勇敢。”

埃罗尔说：“嘘，喂，他来啦。”

“大脚”已经来到我们跟前，我觉得他肯定会听到我们的对话，他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我。

博伊说：“干吗不让我讲，我也没说什么坏话，我刚才就是说德

国人像‘大脚’一样强壮。”

猛然，我发现“大脚”的目光里充满了乞求，我避开他的视线。

“大脚”走后，埃罗尔说：“‘大脚’和你好像有什么事似的，小子。”

一天下午，海特正在读晨报，忽然朝我们喊道：“嘿，猜我读到
了什么？”

我们忙问：“发生了什么事？”

海特说：“是关于‘大脚’的事。”

博伊说：“怎么？他又进班房了么？”

海特说：“‘大脚’开始练拳击了。”

我心里非常明白是怎么回事，却什么也讲不出来。

海特说：“他真不知天高地厚，拳击可是件玩命的事，迟早他要后悔的。”

这消息刊登在报纸上醒目的位置，粗大的黑体字标题写着：
“喜剧中的小丑成为拳击家”。

再次见到“大脚”时，我发现自己敢于直视他的眼睛了。

现在我不再害怕他了，而是为他担心。

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所有的体育评论员都承认“大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击败了一个又一个拳击手后，米格尔街上的人更加害怕他，也更加为他而感到骄傲。

海特说：“他不过只是和那些愚蠢的无名小辈交手，他还从没和一个真正有水平的人较量过。”

“大脚”好像已经把我给忘了，每次见面时也不再注视我的眼睛，也不再停下来和我讲话。

他仍是街上最令人恐怖的人物，但我已不像以前那样惧怕他

了，我情愿保持现在这样。

他越来越愿意炫耀自己。

我们常看到他穿着样式难看的栗色短裤，紧绷着面孔，在米格尔街上跑来跑去，谁也不理睬。

海特感到不安。

他说：“人们真不该让这样的人去打拳。”

一天，有个英国人来到特立尼达，并接受了报界的采访，那人自称曾是皇家空军的拳击冠军。第二天他的照片便上了报纸。

两天后又刊登出他的另一张照片，这次他只穿着一条短裤，带着拳击手套面对照相机，摆出一副拳击的架势。

通栏标题写着：谁将与此人交战。

特立尼达人的回答是：“大脚”将应战此君。

当得知“大脚”已接受挑战，米格尔街上一片欢腾，就连海特也很兴奋。

海特说：“我知道这么说有点傻气，可我还是希望‘大脚’能赢他。”于是他在附近一带找那些愿意出钱的人打赌。

那天晚上，我们十分激动地聚集到体育馆里。

海特手里拿着一张二十块钱的票子跑前跑后地吆喝着：“二十块对五块，‘大脚’战胜他。”

我出六分钱和博伊打赌“大脚”会输。

“大脚”终于出场了，他站在绳圈里根本不看前来观看的人群，旁若无人地活动着身体。我们感到很兴奋。

海特喊道：“是条好汉！”

我简直没去看拳击，而是直盯人群中的一个女人。她是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白肤，金发碧眼，头发就像草一样，她嚼着花

生。每当看到打中一拳时，人群便爆发出一阵吼叫，那女人却猛吸一下嘴唇就像拳头落她身上一样，随后便更加起劲地嚼起花生来。我恨那个女人。

吼叫一阵接一阵，越来越响。

我能听出海特的喊声，“打呀，‘大脚’，把他打趴下，伙计，把他揍趴下。”跟着他声音有些颤抖地喊道：“记着你的父亲。”

海特的声音被淹没了。

以点数计算，“大脚”输了。

不到五分钟，海特就输掉一百美元。

他说：“我得把从乔治那里买来的黄奶牛和白奶牛卖掉。”

博伊对我说：“我明天再给你那六分钱吧。”

我叫道：“明天给那六分钱？亏你想得出来，当我是个百万富翁啊？喂，伙计，少废话，现在就拿钱来。”

他把钱给了我。

此刻，人群中正爆发出阵阵笑声。

我往绳圈里看去。

“大脚”泪流满面，就像个孩子，他越哭声音越大，越哭越伤心。

我替“大脚”保守的秘密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无遗。

海特说：“怎么，他哭啦？”海特大笑起来。

他好像已经把卖牛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嘿，嘿，快来瞧啊，嘿！”

我们米格尔街上的人全都在笑“大脚”。

我没有笑，虽说他是大人，我只是个孩子，可我知道他此刻的感受。我真希望我没有和博伊打过那六分钱的赌。

第二天晨报刊登出：拳师在拳台上啜泣。

特立尼达人都认为，“大脚”，这个喜剧中的小丑又做了件令人好笑的事。

可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的。

“大脚”离开了米格尔街。我最后一次得知他的消息，是说他在拉温塔尔的一个采石场做苦力。

大约六个月后，一个小小的丑闻传遍了整个特立尼达。

那位号称英国皇家空军的拳击冠军，压根儿没参加过皇家空军，只是个毫无名气的拳击手。

海特说：“唉，出这样的洋相还有什么指望呢？”

焰 火 师

要是陌生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时，只能说一句：“贫民窟！”因为他也只能看到这些。可是，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却把这条街看成是一个世界，这里所有的人都各有其独到之处，曼门疯，乔治傻，大脚是个暴徒，海特是个冒险家，波普是个哲学家，而墨尔根却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小丑。

这也说明我们是多么瞧不起他。事过多年后想起来，觉得他理应得到更多的尊敬，可这完全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当然，他只是那些未开化的乡巴佬中的一员，并不愿受到人们的耻笑。他总是在想新的蠢主意逗我们开心，他就是那么一种人：偶尔一次，他把火柴叼在嘴上试图点燃香烟，引起大伙的一阵哄笑，一旦获得成功，他便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把戏。

海特常说：“真他妈的叫人恶心，那人老是出洋相给大家逗乐，可咱们都知道他一点也不快活。”

我看得出，有时墨尔根看到他的那些把戏已无法再进行下去，便非常痛苦，使我们大伙都认为这情形实在太不仁慈，太蹉跎。

墨尔根是我生平见到的第一个手艺人。他几乎花费了他全部的时间，即便是在玩弄那些愚蠢的把戏时也忘不了去琢磨新名堂。他喜爱焰火，知道许多有关焰火的事，什么“宇宙翱游”、“生命

的旋律”等等，这些词把我们米格尔街上的人弄得晕头转向，当他发现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便越发起劲地说些更吓人的词来逗乐，就连本篇的题目也是我从墨尔根那里学来的。

但是，在特立尼达几乎很少有人用墨尔根制作的焰火。每逢狂欢节、发现美洲大陆纪念日、印度一百周年纪念日或赛马会等重大节日，岛上人们喝着朗姆酒，奏起音乐，和漂亮的女人在海边狂欢时，墨尔根却气得发疯。通常墨尔根总是去“大草原”，观看他的同行们施放的焰火，听着人们观赏到空中闪烁着的焰火而发出的阵阵欢呼声。过后，他便怒气冲天地回家，逮住他的孩子们狠揍一顿出气，刚好他有十个孩子，老婆却打不得，她身高马大，令墨尔根无从下手。

海特说：“咱们该去把消防队叫来。”

两三个小时之后，墨尔根会在他家后院里傻乎乎地溜圈子，胡乱放些焰火，于是我们便会听到他老婆的大嗓门：“墨尔根，别在那儿捣鼓那些玩艺儿！你有十个孩子和老婆，现在玩命还早点儿！”

墨尔根捶打着马口铁皮篱笆，像头牛似的咆哮起来。

他喊道：“所有人都欺侮我，所有的人！”

海特说：“听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墨尔根。”

失去理智的墨尔根成了一个极其讨厌的人。他在发狂中突然想起比哈库，那个机械专家，我的叔叔，他一直是墨尔根的冤家对头。此刻已是午夜十一点多了，这念头突然闯进了墨尔根的脑袋，使他不能自持。

他敲打着篱笆吼叫起来：“比哈库，你这大肚皮饭桶，狗娘养的，像个男人一样出来和我比个高低！”

比哈库却依旧趴在床上，用他那低沉的嗓音，抑扬顿挫地读

着(罗摩衍那)。

比哈库体态高大,而墨尔根却很瘦小,他的手和手腕是米格尔街上最小、最细的。

比哈库太太会说:“墨尔根,你为什么不闭上嘴去睡觉?”

墨尔根太太会应道:“呸!你这小脚女人!你少来缠我老公,听见了吗?还是看好你自己的男人吧!”

比哈库太太说:“注意点儿你的嘴巴,别等我过去抽你耳光。”

比哈库太太有四英尺高,三英尺宽,三英尺的厚度;墨尔根太太却足有六英尺高,像个举重运动员。

墨尔根太太说:“干吗不叫你那大肚皮男人去多修几辆汽车?别他妈的整天这么哭叽叽地读什么鬼玩艺儿。”

此时,墨尔根已经来到人行道上和我们呆在一起,挤眉弄眼地说笑着,“听啊,这些娘儿们!”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酒瓶,喝着朗姆酒说:“等着瞧吧,你们听过那首克利普索小调吗?”

人们越是希望我倒霉,

我在特立尼达就过得越好。

“我就是这样,知道吗?明年的这个时候,英国的国王和美国的国王会给我上百万块钱,让我给他们制造焰火,制造任何人都没见过的、最美丽的焰火。”

海特或是其他人便会问他:“你打算给他们做吗?”

墨尔根会说:“给他们?做个屁!明年这个时候,英国的国王和美国的国王会给我上百万块钱,让我给他们制造焰火,制造任何人都没见过的、最美丽的焰火。”与此同时,后院里比哈库太太还在叫着:“他有个大肚皮,可你男人有什么呢?还不知道明年你会

呆在哪里呢，听见了吧？”

第二天早上，墨尔根又恢复了往常那种规规矩矩的样子，一本正经地谈起他的实验。

这时的墨尔根活像一只小鸟，不光他的身体细小得像根火柴，就连他那细长的脖子摇头晃脑的样子也很像小鸟。他长着一双灵活而又明亮的眼睛，他说起话来点头努嘴，好像不是讲话而是在啄米。他走起路来步履轻盈快极了，还不时地回头看一下那根本不存在的尾随者。

海特说：“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告诉你们，是因为他的老婆。他让那个母老虎、西班牙婆娘给吓坏啦。”

博伊说：“也许这就是他愿意干焰火这类行当的原因吧？”

海特说：“人像鬼一样变幻莫测，很难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墨尔根甚至在每次露面时都要出点洋相给人逗乐。他只要知道有人在看他，便手舞足蹈起来。

墨尔根还常拿他的老婆和孩子取乐。“他们可真算得上是我的一大壮举，”他说，“像我这么个人竟有十个孩子，我真纳闷当初我是怎么干出来的。”

爱德华说：“你能保证他们全都是你的孩子吗？”

墨尔根笑笑，说：“我也怀疑。”

海特不喜欢墨尔根，他说：“很难说出为什么他身上总有些东西让我无法忍受，无论干什么，他总是表现得太过火。我一直认为他从不讲真话，我怀疑他也在欺骗自己。”

我觉得，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海特的意思。墨尔根变得越来越讨厌，我们再也不能像墨尔根所希望的那样，每次见面都给他一个笑脸。

他的焰火实验却依旧进行着。墨尔根的家里不时传出爆炸声，还能看到各种颜色的浓烟从屋里冒出来，这成为街上有趣的消遣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墨尔根发现已没有一个人愿买他的焰火了，便开始取笑自己的焰火。他家焰火爆炸引起街上人们的笑声，但这一点已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了。

海特说：“当一个人开始拿他从事的事业逗乐时，你很难知道他是在笑还是在哭。”海特断定墨尔根实在是个傻帽儿。

也许是因为海特的缘故，我们决定不再取笑墨尔根了。

海特说：“这样也许能使他不再出洋相了。”

其实不然。

墨尔根比以前更加疯癫，每周有两三次向比哈库挑衅，比以往更经常地打自己的孩子。

墨尔根使出了最后一招，以供我们取乐。

我是从墨尔根第四个儿子查尔斯那里听到这事的，当时我们正呆在米格尔街头的咖啡馆里。

查尔斯说：“知道吧，现在和你讲话就是犯罪行为。”

我说：“不用说我也知道，又是那老家伙捣鬼吧？”

查尔斯点点头，掏出一张纸来给我看，上面写着：犯罪与惩罚。

查尔斯颇有几分得意地说：“瞧瞧这个。”

这是一张长长的单子，列出一条条的条款：

- 因为打架：1)在家里，打五下
2)在街上，打七下
3)在学校，打八下

查尔斯望着我，急切地说：“有趣极了吧？这玩艺使挨揍变成了游戏。”我表示赞同，问道：“刚才你说和我讲话就是犯罪行为，是怎么回事？”

查尔斯又指给我看：

因为和街上的痞子讲话，打四下

因为和街上的痞子在一起玩，打八下

我说：“可你老子自己从不介意和我们讲话，你和我们讲话干吗不行啊？”

查尔斯说：“我说的这些根本算不上什么，星期天到我家来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啦。”

我可以看出查尔斯得意极了。

星期天，我们六个人一块儿去了。墨尔根在家里等着我们，把我们带进他家的起居室，然后他就不见了。那里排着许多椅子和板凳，像是要举行音乐会，墨尔根的大儿子站在墙角的一张小桌前。

突然，这孩子喊道：“起立！”

我们全都站立起来，墨尔根露面了，面带笑容地望着我们。

我问海特：“他干吗要笑？”

海特说：“地方法官出庭时总是这么笑的。”

墨尔根的大儿子叫道：“安德鲁·墨尔根！”

安德鲁·墨尔根走出来，站到他父亲面前

那个人孩子高声朗读起来：“安德鲁·墨尔根，你被指控用石头砸多萝西小姐家院里的罗望子树；你被指控把树上的果子摘下来换弹子；你被指控和多萝·墨尔根打架；你被指控偷吃了两个

油饼和三个糖饼。你服罪吗？”

安德鲁说：“服罪。”

墨尔根一面在纸上记着，一面抬起头来。

“你还有什么要讲吗？”

安德鲁说：“我很难过，先生。”

墨尔根说：“现在开始宣判：打十二下。”

一个接一个，墨尔根的孩子都受到了审判，就连大儿子也没逃脱惩罚。最后，墨尔根站起来说：“以上宣判将从今天下午开始执行。”

他含笑向四周看了一下，昂然走出房门。

这一闹剧完全失败了。

海特说：“呸！这家伙，竟拿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开心、出丑，还邀请全街上的人去看，真他妈不像话。”

我觉得这一闹剧恐怖和令人作呕。

晚上，当墨尔根脸上挂着微笑来到人行道上时，他没有得到一点他所期待的笑声。没有一个人走上前拍着他的背说：“墨尔根这家伙真是个疯子，知道他是怎么打孩子的……”没有一个人说这类的话，也没人和他讲话。

不难想像出他当时的惨样。

那天夜里，墨尔根喝得烂醉，他向所有的人挑衅，甚至连我也不放过。

墨尔根的老婆把前门关上了，墨尔根只好在他家院里跑来跑去，像一只发疯的公牛，把栅栏撞得咚咚直响。他反复喊叫着：“你们认为我不是个男子汉，啊？我父亲有八个孩子，我是他的儿子，我有十个孩子，你们这些人统统加在一起也赶不上我！”

海特说：“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大哭一场去睡觉啦。”

可是在上床前，我一直想着墨尔根，想了很长时间，我想像一定是有个红头发，龇牙咧嘴的小鬼在墨尔根身上作怪。我觉得以前错怪了墨尔根，这一切均应归罪于那个暗中作怪的红头发小鬼。

墨尔根老婆带着孩子们到乡下去了。

墨尔根再也没到人行道上来和我们扎堆，他一直忙于实验，有几次听到不太严重的爆炸声，一团团的浓烟从屋里冒出来。

除此之外，米格尔街头还算平静。

我很想知道墨尔根现在干些什么，如何看待眼前的孤独。

那个星期天下了一场大雨，街上积满的雨水在夜色中闪出片片光亮，人们只好早早地爬上了床。直到半夜十一点以前，街上除了可以听到雨水拍打波纹铁屋顶发出的声响外，没有其他任何声音。

突然，一声短促而尖厉的叫声震动了全街，把我们 from 梦中惊醒。

我听到人们打开窗户的声音，互相询问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墨尔根，是墨尔根，墨尔根出事啦！”

我一下就窜了出来，直奔墨尔根的家。我还没闹气到晚上要穿睡衣睡觉的地步，所以省去不少麻烦。

我在黑暗中看到墨尔根院子里有一个女人的身影，正在慌慌张张朝后门跑去，那儿有条积满污水的通道，从米格尔街通往沃芬街。

天上还在下着蒙蒙细雨，倒不太大，不多会儿，我旁边便聚集

起一大群人。

真令人感到摸不着头脑，那尖厉的叫声，还有这消失在黑暗中的女人。

我们听到墨尔根的老婆在喊叫：“特丽萨·布莱克！特丽萨·布莱克，你和我男人都干了些什么？”她在痛苦地呼喊。

比哈库的老婆站在我旁边，说：“我早知道这个特丽萨是个什么东西了，可我从没讲过。”

比哈库说：“行啦，没你不知道的事，像你妈一样。”

屋里亮起一盏灯，

忽而又关上了。

我们听墨尔根的老婆在叫：“你干吗这么害怕灯光？你不是个男子汉吗？把灯打开，让我们来瞧瞧这个大男子汉。”

灯亮了，接着又灭了。

我们听到墨尔根在嘟哝着什么，声音太低了，听不清在说什么。

墨尔根老婆说：“好你个英雄好汉。”电灯又亮了。

又传来墨尔根的嘟哝声。

墨尔根的老婆说：“不，是英雄好汉。”

灯灭了，接着又亮了。

墨尔根的老婆说：“就让它亮着吧，来！咱们让街上的人都瞧瞧这位了不起的英雄好汉，来呀！让他们看看真正的男子汉是什么样，你不但可以和我生出十个孩子来，还可以和其他人生出更多的来。”

我们听到墨尔根低声哀求着。

墨尔根的老婆说：“现在你有什么好怕的？你不是爱出洋相吗？不是爱当小丑吗？来，让大伙儿看看你到底是是个什么样的小丑

和大男子汉，让他们瞧瞧，真正的男子汉到底是个什么样？”

墨尔根呜咽地哀告着。

墨尔根的老婆说：“要是你敢再把灯关上，我就像拧火柴棒似的拧断你的脖子，听见了吗！”

大门敞开了，我们看到：

墨尔根的老婆夹着墨尔根的腰，把他拎出来，墨尔根全身赤条条的，看上去他是那么瘦小，就像一个长着老头面孔的孩子。他没有看我们，只是望着那婆娘的脸，在她胳膊下挣扎着想脱身，可是墨尔根的老婆实在是太壮啦。

墨尔根的老婆也没看我们，只是瞅着她胳膊下的男人。

她说：“这就是我的大男人吗？这就是和我结婚，还要我侍候一辈子的男人吗？”说罢便发出一阵嘶哑的狂笑。

她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说：“喂，笑啊，他不会介意的，他一直巴不得你们笑他。”

眼前的景象实在太奇特了，一个高头大马的女人拎着一个瘦小的男人。我们笑了起来，开始还是小声地笑，后来便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这是墨尔根自打来到米格尔街后，第一次真正博得人们的笑。

这事把墨尔根彻底摧垮了。

第二天一整天，我们都在人行道上等他，为博得了我们的笑而向他祝贺。然而，他却一直没露面。

海特说：“小时候，我妈常对我说，‘孩子，你整天价笑，我敢说，今晚你准会哭’。”

当大夜里，我再次被喊叫声和救火车的警笛惊醒。

我朝窗外望去，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墨尔根家里着火啦。

好一场大火！报界的摄影记者爬上附近的房顶抢拍镜头，人们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他们身上，而没人去留神看大火。第二天早上，报纸的右上角上刊登一张非常清晰的照片，上面的人群中还有我。

那场火可真来劲！这是一九三三年西班牙港的国库失火之后最壮丽的一场大火。关于那次火灾有一首克利普索小调：

多么壮丽动人的景象。

就是那场国库燃起的大火。

墨尔根的焰火使这场火更加壮观，这也是人们第一次领略到墨尔根的焰火竟是如此美丽，人们开始感到过去嘲笑墨尔根是有些过分了。后来尽管我到过许多国家，可我从没看到过像那天晚上墨尔根家爆发出的焰火那么壮丽辉煌。

可是墨尔根的焰火变成了一片灰烬。

海特说：“小时候，我妈常说，‘男人如果希望得到某件东西，就会拼命去争取，一旦他得到后就不再喜欢它了’。”

墨尔根的两大大奢望现在都得到了满足，一是人们笑话他，他得到了而且迄今人们还在笑；二是他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壮丽的焰火。但是，正如海特所说的，一旦得到他最最希望得到的东西之后，他就不再喜欢它了。

不出我们的预料，这事闹到了法院，墨尔根被指控犯下了纵

火罪 报界记者们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给墨尔根编了不少笑话。我记得标题写着:焰火制造者变成了纵火狂。

尽管墨尔根走了,我还是挺高兴。

人们说墨尔根到委内瑞拉去了,还有人说他疯了,也有人说他在哥伦比亚当骑师,反正说法挺多,要知道米格尔街上的人都是些爱信口开河的人。

注册会计师泰特斯·霍伊特

这个人如果生在农村，生来就该是乡村里领导集团中一位活跃且重要的成员，可是严酷的命运使他错投了胎，来到这城里。他是一个天生的指导者和哲学家，也是每个愿意停下来听他讲话的人的朋友。

泰特斯·霍伊特是我来到西班牙港认识的第一个人，那是战前一两年的事。

父亲去世后，母亲带我离开了查瓜纳斯，我们先坐火车，而后又换乘公共汽车去米格尔街，那是我第一次坐市内公共汽车。

我对母亲说：“妈，你看，他们这里人忘了摇车铃啦。”

妈妈说：“要是你敢去摇铃，看我不把你从车上赶下去，叫你一个人走回家去，听见了吗？”

过了不多会儿，我又喊叫起来：“妈，看哪，大海！”

汽车上的人都笑了。

这回妈妈可真的生气了。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说：“听着，给你四分钱，到米格尔街拐角处的那个店里，买两个一分钱的的面包，再买一分钱的黄油，快去快回。”

我找到了那个商店，买了面包和黄油，是那种红颜色、带咸味的黄油。

可是，我却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找到了差不多六条叫米格尔的街，可哪条街上都没有我家的房子，我来来回回走了很久，终于憋不住哭起来。我坐在人行道上，鞋子也被水沟里的水弄湿了。

一些白人小姑娘在我身后的院子里玩耍，我望着她们仍在哭泣着。一个穿着粉红色上衣的小姑娘走出来，问道：“你为什么哭呀？”

我说：“我迷路啦。”

她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说：“别哭。你知道你家在哪儿？”

我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给她看，这时一个男人走来，他穿着白色的短裤和白衬衣，看上去挺有意思的。

那人说：“他为什么哭呀？”声音有些沙哑，却挺好听。

小姑娘告诉了他。

那人说：“我来送他回家。”

我叫那小姑娘也来。

那人说：“那也好，你可以向他妈妈解释一下。”

那小姑娘说：“好吧，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这是我所发现的关于泰特斯·霍伊特第一件有趣的事，那小姑娘称他“泰特斯·霍伊特先生”而不是“泰特斯”或是“霍伊特”。后来我发现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么称呼他。

我们回到家以后，那小姑娘向我妈妈说明了刚才发生的事，妈妈为我感到丢脸。

后来，那小姑娘走了，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看着我说：“他看上去像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妈妈带着几分嘲笑的口气说：“像他的父亲。”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说：“来，小伙子，如果买一条半鲱鱼要一个半便士，那么买三条鲱鱼需要多少钱？”

就是在乡下，在查瓜纳斯，我们也知道怎么算。

我马上回答道：“三个便士。”

泰特斯·霍伊特露出惊异的神情向我祝贺。

他对妈妈说：“这孩子聪明极了，太太，你要带好他，把他送进一所好学校，再给他吃点儿好的，那样他准能学好。”

我妈什么话也没说。

泰特斯·霍伊特临走时，说了句，“再会！”

这是有关泰特斯·霍伊特第二件有趣的事。

我妈揍了我一顿，她说这是因为我的鞋子被沟里的水弄湿了，而不是因为我迷了路。

那天后来的时间里，我一直在院子里来回跑着，边跑边叨咕：“再会！再会！”体会着自己的声音。

那天晚上泰特斯·霍伊特又来到我家。

妈妈似乎并不在意。

泰特斯·霍伊特问我：“你识字吗？”

我说是的。

“会写字吗？”

我会。

“那好，”他说，“拿几张纸和铅笔来，照我说的写。”

我问：“纸和钢笔吗？”

他点点头。

我跑进厨房，说：“妈，你有纸和钢笔吗？”

妈妈说：“你当我是什么人啦？杂货铺老板吗？”

泰特斯·霍伊特喊着：“是我要的，太太。”

妈妈极不情愿地应了一声：“噢。”

她说：“那个橱子最下面的抽屉里有我的手提包，里面有支钢笔。”

她从厨房的架子上取了一本练习簿给我。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说：“好啦，小伙子，开始写，先把这里的地址写在右上角上，下面写上日期，”他接着问我，“你知道咱们要给谁写信吗，孩子？”

我摇摇头。

他说：“嘿，孩子！嘿！咱们给《卫报》写信，孩子。”

我问：“是《特立尼达卫报》吗？是报纸吧？干吗我要给《卫报》写信！只有很大很大的人才给《卫报》写信。”

泰特斯·霍伊特微笑着，“所以才让你写，要让他们感到意外。”

我问：“那我该给他们写些什么好呢？”

他说：“你就这样写，寄给《特立尼达卫报》的编辑。亲爱的先生，我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你几岁啦？噢，没有关系），昨天我母亲让我到城里买东西，编辑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在城里徒步旅行（是这么拼写：p e-r-e-g-r-i-n-a-t-i-o n），结果，我找不到妈妈告诉我回家的路……”

我说：“啊，天哪，泰特斯·霍伊特先生，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这么长的词？你能肯定这么拼写是对的吗？”

泰特斯·霍伊特微微一笑，“这封信我写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继续写下去，“……在失望中，米格尔街的泰特斯·霍伊特先生使我脱离了困境。编辑先生，这件事表明了这世界上人类善良的本性并没有被毁掉。”

《卫报》一直没有刊登出这封信。

后来,我见泰特斯·霍伊特时,他说:“算啦,别去想啦,总有一天,孩子,总有一天,我会叫他们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真听我讲出的每一个字,等着瞧吧。”

分手前他又问我:“你喝牛奶了吧?”

他曾说服我妈妈每天给我喝半磅奶,他说牛奶对大脑极有益处。

可是我的学业从没达到过泰特斯·霍伊特的要求,这也是一件令我终生遗憾的事。

迄今每当我想起他对我那么关心,心里就热乎乎的。有时他也常为我和我妈发生争执,就说那次有关蜘蛛网的事吧。

博伊,他和我认识不久就成了好朋友,他教我骑马,结果从上面掉下来,摔得可够惨的,腿上划了道大口子。

我妈用朗姆酒调上挂满灰尘的蜘蛛网糊在我的伤口上。

泰特斯·霍伊特惊恐万状地喊道:“你干了些什么呀!”

我妈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请你少管闲事,等你有了孩子我再向你讨教。”

泰特斯·霍伊特对这样嘲讽毫不在意,他说:“我说,快送孩子去医院。”

我并不十分担心地看着他们争吵。

最终我还是到医院去了一趟。

泰特斯·霍伊特再次出现,并担负起一个新的角色。

他对我妈说:“我最近两三个月一直在红十字会学习战地救护,我来给你这孩子换药吧!”

这事确实令我吃了不少苦头。

以后大约有个把月的时间,每天早上九点,米格尔街上的人们都会听到我的尖叫声。可泰特斯·霍伊特非常热心地完成这项

工作。

从这一切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本质。

下一步就很自然了。

泰特斯·霍伊特开始任教了。

像所有大企业一样，这事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他决定去考伦敦大学艺术专业的学位，于是开始学习拉丁文。他是自学，而且边学边教我们。

他把我们三四个人召到一起，在他家门前的走廊上上课，他家院子的厨房里不时地飘出难闻的气味。

这个拉丁语学习班持续时间不长，我们刚学到四种变格，博伊、埃罗尔和我便开始提一些令泰特斯·霍伊特头痛的问题。

博伊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你知道，我觉得这好像是你自个编出来，你是一边编一边教。”

泰特斯·霍伊特说：“可是我告诉你，不是我编的，不信你瞧，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埃罗尔说：“我觉得，泰特斯·霍伊特先生，这些就像是哪个人吃饱了撑的，瞎编一气叫大家来学。”

泰特斯·霍伊特问我：“bellrm 的单数宾格是什么？”

因为我已经背叛了他，所以说出的话也极为苛刻，我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假如你在我这个年纪时，有人向你提出这问题，你会有什么感觉？”

接着博伊问道：“泰特斯·霍伊特先生，什么叫宾格？”

拉丁文课就这么结束了。

尽管我们经常讥笑他，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泰特斯·霍伊特是个挺有学问的人。

海特常说：“那家伙，他可是个文化人儿。”

泰特斯·霍伊特的脑子里像个杂货铺，无所不有，而且时常还冒出些怪吓人的念头。

海特说：“知道吗，我认为泰特斯·霍伊特并不喜欢上帝。”

泰特斯·霍伊特说：“最要紧的是你是否心诚，瞧，就像我信仰从我裤兜里掏出来的这盏自行车灯一样，把它摆在某个地方，诚心实意地信仰它，向它祈祷，向它祈求我所需要的一切，这便是我的信仰。”

话虽这么说，可他每次同人见面或分手时，总还忘不了那句：“再会。”

他有个习惯，经常冷不丁地跑到我们面前说：“大家听我说，我刚刚在想，听我说我刚才想的什么。”

一天，他急匆匆地跑来说：“我想出结束这场战争的办法啦！要是整个欧洲沉到大海里五分钟，所有的德国人就都见鬼去了。”

埃多斯说：“那英国人也玩完啦。”

泰特斯·霍伊特猛醒过来，沮丧地说：“我真是昏了头，伙计们，真是昏了头。”

他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蹒跚离去。

一天，我们正在谈论着特立尼达和巴巴多斯的板球赛，特立尼达队处境不佳使我们很担心，只见泰特斯·霍伊特骑着自行车赶来。

泰特斯·霍伊特冲到我们面前，说道：“安静，我刚才在想，听着，孩子们，你们想过没有，这个世界根本是不存在的？你们想过没有，这世界原本是人们臆想出来的？就像我现在一样，想像出一个世界，想像出你们这些人，想像出这场战争和这些房子，还有港口里的船和人，你们想过这些没有？”

他想从事教学的念头仍未息止。

我们经常见到他夹着厚厚的书籍,那些有关教学的书籍。

泰特斯·霍伊特常说:“伙计,这可是科学。特立尼达的弊端就是缺乏科学的教学方法。”

或者说:“伙计,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注重培养你们这些青年人,想想吧,好好想想吧。”

很快我们就察觉到泰特斯·霍伊特开始致力于我们的洗脑教育。

他创办了米格尔街青年文化活动俱乐部,并使其成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青年协会的一个分部。

我们常到他家聚会,在那里可以得到好多好吃的东西和饮料。墙上挂满了名人名言,有些是打印出来的,或是从杂志上剪下来又贴到一些木板上。

我还留神注意到那被称为“作息时间表”的东西。

从那上面我知道泰特斯·霍伊特每天五点半起床,读上半小时古希腊哲学家写的作品,再花上十五分钟的时间用来盥洗和做早操,再读五分钟的晨报,十点钟吃早饭,这时间表的确令人望而生畏。

泰特斯·霍伊特说:“要是我能按这作息时间表去做,用不了三四年的工夫我可以成为一位学者。”

米格尔街俱乐部的寿命很短。

这事全怪泰特斯·霍伊特。

谁也没有想到,他竟让博伊当上了秘书,博伊大多数时间花在登记来参加活动的人员名单上。

我们这伙人不得不坐下来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

后来,米格尔街的文化俱乐部成了电影评论家的聚会场所。

泰特斯·霍伊特说：“这样可不行，我们可不是打算把你们这帮孩子召到这里来评论什么电影的，我要向你们这伙人进行宣传。”

博伊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们还需要什么宣传？德国人才干这种事呢。”

泰特斯·霍伊特微微一笑，“这不是这词的真正含义，孩子，我所做的才是这词的真正含义，是教育，孩子，所以我才能像现在一样知道许多事情。”

博伊作为我们的代表出席了青年协会的年会。

博伊回来后说：“这个青年会真他妈没劲，都是些老帮子，那里全是些老家伙。”

可口可乐、甜饼和冰激凌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了，我们中间有些人开始时常无故缺席，不来开会了。

为了把这个俱乐部继续维持下去，泰特斯·霍伊特使出了最后一招。

一天，他说：“下个星期天，俱乐部成员去参观乔治要塞。”

一阵反对的喊叫声。

泰特斯·霍伊特说：“瞧瞧你们这些人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国家。你们中间能有几个人听说过乔治要塞的？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地方。可这是历史，伙计，就是你们自己的历史，你们必须要了解这些事，你们今天这些男孩和女孩明天要成为男人和女人。古时候罗马人有这么一句话，‘思想健康才能身体健康’，我认为我们将要步行到乔治要塞。”

可还是没有一个人愿去。

泰特斯·霍伊特说：“乔治要塞顶上有一条小溪，溪水清凉干净，咱们可以在山上洗个冷水澡。”

这事对我们来说可太有吸引力了。

下一个礼拜天，我们这一伙人乘上电车直奔木库拉普。

售票员过来要我们买票时，泰特斯·霍伊特说：“等会再买吧。”直到我们快下车时，他才去买票。我们这些人该买两个先令的车票，可泰特斯·霍伊特却只塞给售票员一个先令说：“我们不要车票了，伙计。”售票员和泰特斯·霍伊特笑了起来。

通向山丘的路很远，烈日炎炎，尘土飞扬，闷热极了。

泰特斯·霍伊特告诉我们，“这要塞是以前法国人企图侵占特立尼达时建造的。”

我们气喘吁吁地顾不上搭话。

我们不相信会有人对我们如此重视。

泰特斯·霍伊特说：“那是一九〇三年，我们和拿破仑打仗的时候。”

我们看到路旁和山岗上丢着几门锈迹斑斑的大炮和一些锈蚀的炮弹。

我问道：“法国人侵占了特立尼达了吗？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泰特斯·霍伊特不无遗憾地晃着脑袋说：“不是，他们没有进攻，可我们已经作好了准备，伙计。防备他们。”

博伊说：“你敢肯定山上有你说过的那条小河吗？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泰特斯·霍伊特说：“瞧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说谎的人？”

博伊说：“我可什么也没说。”

我们挥汗如雨地继续赶路，博伊脱掉鞋。

埃罗尔说：“要是山上没有小溪，有人可要倒霉喽。”

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穿过一片墓地，那里还有为很久以前

战死的英国士兵而立的墓碑。我们拿起望远镜观望着展现在我们脚下的壮观的西班牙港，马路上走着的人们就像在眼前一样清晰。

然后，我们开始寻找那条小溪。

我们没有找到。

泰特斯·霍伊特说：“肯定是在什么地方，我小的时候常来洗澡。”

博伊说：“那现在是怎么回事？八成儿是干涸了。”

泰特斯·霍伊特说：“兴许是这么回事。”

博伊火冒三丈，这倒不怪他，爬上这山可不是件轻快事，我们全都又热又渴。

他把泰特斯·霍伊特骂了个狗血淋头。

泰特斯·霍伊特说：“别忘了，博伊，你还是米格尔街文化俱乐部的秘书，别忘了，你作为我们的代表刚刚去参加了青年代表大会，别忘了这些。”

博伊说：“见你的鬼去吧！霍伊特。”

我们全都惊呆了。

文化俱乐部就这么垮台了。

泰特斯·霍伊特获得学位后不久，便办起了一座学校。他在自家院子里挂起了一块大招牌。

泰特斯·霍伊特，注册会计
保证获取剑桥学校学位

有一年，《先锋报》想出一个十分高明的主意，他们建立起救

济基金，在圣诞节时救济那些有困难的人。后来好几年这个紧急救济基金会一直名声很大。每年十一月初，《先锋报》都宣布本年基金所要达到的数目，从那时起一直到圣诞节的前夕，这事便成为大家日常所关心的一件事，人们都在注视着这笔基金的增长情况。报纸头版经常将捐赠资金的人名刊登在显要位置上。

那一年的十二月中旬，正当这事热得烫手时，米格尔街上的事居然也上了报纸。

海特找来报纸，我们读到：

向这位少年卫队队员学习

我们呼吁给那些不幸的人们送去圣诞的欢乐时，得到一件微小但最感人的反应是来自西班牙港米格尔街的小学校长，注册会计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提供的一封信。这是霍伊特先生的一名要求匿名的学生写给他的信。我们得到霍伊特先生的许可，在此将信函全文发表如下：

亲爱的霍伊特先生，我只有八岁，正如您所希望的那样是名少年卫队队员。您，亲爱的霍伊特先生，一贯颂扬仁慈的美德，您多次谈到紧急救济基金旨在给那些不幸的人们送去圣诞的欢乐。事实上，我只能捐献出很少的钱——六分钱，但请收下，霍伊特先生，请把它捐给紧急救济基金，让它帮助那些贫穷不幸的人们获得圣诞的欢乐！我知道，这的确不多，但我已竭尽全力，尽到自己微薄力量。亲爱的霍伊特先生，我永远是我的学生。

母亲的天性

我敢说劳拉算是保持了世界纪录。

劳拉有八个孩子。

这倒没啥稀罕。

不过，这八个孩子却有七个父亲。

真要命！

这就是劳拉的身体给我上的第一堂生物课。她住在我家隔壁，所以，我不知不觉地一直在注意观察她。

我会数月注意到她那越来越大的肚子。随后，又会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见不到她。

等到下次再看到她时，她又会显得十分单薄。然后，发酵的过程又会在几个月之后周而复始。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我所生存的世界上的奇迹，所以对她格外留意。她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事情颇为乐观，常常指着肚皮说：“这事又来了，不过要是经历过三四回，也就习惯啦。当然是件令人头痛的事。”

她常抱怨上帝，数落男人们的邪恶。

她前面六个孩子出自六个男人。

海特说：“有些人是很难侍候的。”

我倒不想给人们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劳拉把时间全都花费在

生儿育女和勾引男人上，人人都为她感到难过。如果说博加特是米格尔街上最无聊的人，那么劳拉便是最快乐的、她老是那么活泼快乐，而且她也挺喜欢我。

每逢她搞到一些李子或芒果，总要给我一些：只要她做甜点心，我也能吃上一点儿。

就连特别讨厌嘲笑人，尤其不喜欢我嘲笑人的我妈妈，也经常嘲笑劳拉。

她常常对我说：“真不明白，劳拉为什么会喜欢你，好像她的儿女还不够多似的。”

我想我妈说得挺对，对于劳拉这样的女人，孩子再多也不会嫌多。劳拉热爱她的每一个孩子，当然，如果你听到过她是如何跟孩子们讲话时，你就无论如何不会相信喽。她的喊叫和谩骂是我前所未闻的，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海特曾经说：“伙计，在用词方面，和莎士比亚比，恐怕她也毫不逊色。”

劳拉常常喊叫着：“奥文，你这个大嘴巴畜生，滚回来！”

有时咆哮道：“盖温，你要不赶快回来，我就让你屁滚尿流，听见了吗？”

有时吼道：“劳娜，你这个罗圈腿黑母狗，就不能睁着眼睛好好干活？”

劳拉有八个孩子，华裔玛丽太太也是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她俩却有着天壤之别。玛丽照料孩子真是细心之极，而且从不训斥他们。不过有一点须提请注意，玛丽的丈夫有家小商店，当她的孩子们肚子里塞满了像炒杂碎、炒饭之类的东西后，自然会对孩子们和颜悦色喽。可是劳拉找谁去要钱来养活那一大帮孩子呢？

晚上，一些男人骑着自行车来到劳拉门前，向劳拉吹口哨，这些男人是不会为孩子们掏出一个子儿的，他们要的只是劳拉。

我问妈妈：“劳拉靠什么生活呀？”

妈妈抬手抽我一个嘴巴，说：“小孩子家，少打听这种事，知道吗？”

我想到了最坏的一条路。

可我希望那不是真的。

于是，我跑去问海特，海特说：“她有不少朋友在市场上卖东西，他们常常送她一些东西，不要钱。她的那几个丈夫偶尔也给她一点儿，不过都不多。”

最叫人难以理解的是劳拉本人，她长得一点都不漂亮，就像博伊那天说的那样，“她那张脸活像汽车上的电瓶盖。”此外，她的身材也过于丰满。

说这些话时，她还只有六个孩子。

一天，海特说：“劳拉又勾搭上一个男人。”

大伙哄堂大笑起来：“不值钱的新闻，要是依着劳拉自己，她会和每个男人都来上一次。”

海特说：“这次可是动真格的了。他搬来和她一起住了。今早我赶牛出来时看见他了。”

我们都在观察，等待着那个男人。

后来才知道，他也在观察、等待着我们。

那个男人，纳撒尼尔，很快便成了我们米格尔街上这伙人中的一员。可是很显然，他与我们全然不同。他来自西班牙港的东区，在我们眼里那儿比这儿还要肮脏贫穷，此外，他的言辞也实在太粗野。

他宣称自己是东区皮考迪力街上的一个街痞，还讲了许多帮派殴斗的事。他还到处宣称他曾破了两三个人的相。

海特说：“我看他撒起谎来眼都不眨一眨，知道吧。”

其实连我也不相信他的话。他是个身材矮小的人，我一向以为像他这么点几个头的人更可能是黑心眼的小痞子。

最令我们厌恶的是他对待女人的态度，倒不是我们喜欢向女人献殷勤，可纳撒尼尔对女人们不屑一顾的神态确实令人不快。他老是非常下流地评论着每个路过的女人。

纳撒尼尔常说：“女人就像母牛，她们和母牛没啥两样。”

里考德太太胖得出奇，每当她走过时，纳撒尼尔就会说：“嘿，瞧这头母牛！”

真叫人倒胃口。在我们看来，对像里考德太太这么胖的女人应该同情才是，笑话她实在有些太过分了。

起初，纳撒尼尔竭力要我们相信，他如何懂得降伏劳拉。他还对人们暗示，说他经常揍她。他总是说：“知道吧，女人这种货色就是喜欢挨揍，你们听过那首克利普索小调吧：

不时地把她们打趴下，
不时地把她们摔倒打翻在地，
眼眶挨青，膝盖踢紫，
此后，她们便会永远爱你，

这番关于女人的话比福音书还实在。”

海特说：“说真的，女人是挺古怪的。不过我真想不出，劳拉这样的女人看上纳撒尼尔什么了。”

埃多斯说：“我对女人可算是摸得贼透。我看纳撒尼尔在吹牛

皮，我看他跟劳拉在一块儿的时候，准是夹着尾巴大气也不敢出。”

我们常常听到那栋屋里传出一阵阵打架声和孩子们的哭叫声。而后，再见到纳撒尼尔时，他总是说：“教训一下那个女人，让她撞点事。”

海特说：“真是怪事，劳拉看上去可一点也不伤心。”

纳撒尼尔说：“她真正需要的是拳头，拳头会使她兴奋起来。”

当然，纳撒尼尔是在撒谎，挥拳头的不是他，而是劳拉。一天，纳撒尼尔拼命往下扯着帽檐，想遮住青肿的眼眶，这事算是彻底露馅了。

埃多斯：“那首克利普索小调好像唱的是男人挨揍，而不是女人。”

纳撒尼尔恼了，要和身材矮小的埃多斯较量一下拳脚。可是海特说：“还是去找劳拉比试比试吧，我知道劳拉。她不会把你打坏的，只不过是要你老老实实在她过日子。不过等她开始讨厌你时，你最好还是跑快点儿，伙计。”

我们暗自祷告，希望能发生点儿什么事把纳撒尼尔赶出米格尔街。

海特说：“用不着等多久啦，劳拉已经怀孕八个月了，再等一个月，纳撒尼尔就得滚蛋。”

埃多斯说：“这可真是创纪录了。和七个男人生下七个孩子。”
婴儿出世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头一天晚上我还看见劳拉倚着篱笆站在院里。

孩子是在早晨八点多钟出世的。真神啦，还不到两个小时，劳

拉就隔着墙喊起我妈来了。

我躲起来，偷偷地张望着。

劳拉趴在窗台上，嘴里啃着一个芒果，脸上沾满橘黄色的果汁。

她告诉我妈：“今儿——早就生啦。”

我妈只问了一句：“男孩，还是女孩？”

劳拉说：“瞧你说的，我哪有那福气，真晦气，又是个丫头。我喊你就是打算告诉你这事。好啦，我得走了，还有些针线活要做。”

就在当天晚上，海特的预言差一点儿就实现了。那天傍晚，劳拉走出门，来到人行道上，对纳撒尼尔喊道：“喂，纳撒尼尔，过来！”

海特说：“见鬼，这是怎么回事？她不是今儿早上才生的孩子吗。”

纳撒尼尔还想在我们面前充大个儿，对劳拉说：“我忙着哪，不去。”

劳拉向前跨了一步，我看得出来，她那架势是要动手啦。她说：“不来？你不来？这是我听到的话吗？”

纳撒尼尔慌了神，他竭力装出一副与我们谈话的样子，不过讲起话来已是六神无主了。

劳拉说：“你以为你是个男人。听着，你少在我面前充男子汉。没错，纳撒尼尔，我说的就是你，夹着两片瘦屁股蛋，活像是塞在裤裆里的两块陈面包。”

这话算得上劳拉的又一杰作。我们憋不住大笑了起来，劳拉看见我们笑，她也憋不住，笑了起来。

海特说：“这娘们儿真冲！”

孩子生啦，可纳撒尼尔仍旧赖在米格尔街不走，我们可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

海特说：“要知道，她要是不留神，就得和这个男人一起再养一个小崽了。”

其实，纳撒尼尔不走，并不是劳拉的错，她经常揍他，而且现在已经是公开地揍了。有时她把他关在门外，随后就听到人行道上传来纳撒尼尔的讨饶、乞求声：“劳拉，亲爱的，劳拉，心肝儿，就让我住一夜吧！劳拉，宝贝儿，让我进去吧！”

现在，他再也不吹嘘他如何收拾劳拉了。他也再不往我们这帮人里掺和了，这倒使我们挺开心。

海特常说：“他干吗不回他老家干河去，那儿的人一点儿教养都没有，他会更快活些。”

我也搞不懂为啥他非赖在这儿不走。

海特说：“有些男人就这样，专爱受女人们的捉弄。”

劳拉对纳撒尼尔越来越不耐烦。

一天，我们听见她对他说：“别以为我给你养一个孩子，就成了你的人啦。告诉你，那孩子不是你的。”

她威胁说要去叫警察。

纳撒尼尔说：“那谁来照顾你的孩子？”

劳拉说，“那是我自己的事，我不想让你呆在这儿，你在这儿只会多添一张嘴。你要是不立马给我滚蛋，我就去把查尔斯警官叫来。”

纳撒尼尔到底让警官吓跑了。

他是流着眼泪走的。

可是，劳拉的肚子又大了起来。

海特说：“啊，上帝！和同一个男人生两个孩子！”

米格尔街上的奇迹之一，就是街上没有一个人挨饿。假如你坐在桌前，拿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纸认真地计算的话，你不可能找出一个人挨饿。我是在米格尔街长大成人的，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一个人挨饿。也许他们挨过饿，但我从没听人说过。

劳拉的孩子一天天大起来。

最大的一个是女儿，劳娜，在圣克莱尔大街的一户人家当用人，还跟一个住在塞克维尔街上的人学习打字。

劳拉常说：“受教育是世界上最尊贵的事。我可不想让孩子们像我这样过一辈子。”

劳拉的第八个孩子如期出世了，像往常一样毫不费力。

这是她最后一个孩子。

倒不是因为太疲惫的缘故，也不是因为她已厌恶人生，更不是因为失去了生儿育女的热情。事实上，我看她一点儿都没变老，也没有变得沮丧，我认为，只要给她这种机会，她会一直生下去的。

一天晚上，大女儿劳娜上完打字课，很晚才回来，她说：“妈，我要生孩子了。”

我听到劳拉尖叫了一声。

然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劳拉的哭声，完全不同于一般人的哭泣。她好像是在把从出世以来聚攒下来的哭泣全部释放出来似的，好像是在把她一直用笑声掩盖起来的哭泣全部倾泻出来。我听到过人们出殡发表时的哭声，其中有不少是装模作样的哭泣。那天夜里，劳拉的哭泣令人毛骨悚然，是我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可怕的声音。它使我感到整个世界是一个空寂无聊且悲惨绝望的地方，我几乎要和劳拉一起哭起来。

街上的所有人都听到了劳拉的哭声。

第二天，博伊说：“我真不明白，她干吗为这事发火，她自己不也是这么下的吗？”

海特火冒三丈，抽出皮带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我也说不清自己为谁更难过——为劳拉还是为她的女儿。

劳拉很长时间没有在街上露面，我想也许她是觉得丢人吧。

等我再见到她时，简直不敢相信她就是那个经常笑眯眯地给我糖吃的女人，她变成了一个老太婆。

再也听不到她骂孩子的声音，也再看不见她打孩子了。不知道她现在对自己的骨肉是开始关怀备至了，还是对他们完全失去了兴趣。

但是，我们从来没听见她责备过劳娜。

这更使人忐忑不安。

劳娜把孩子抱回家来，街上没有一个人拿这事开心逗乐。

劳拉的家成了一栋死气沉沉的房子。

海特说：“这该死的生活真是活见鬼。明明知道要出麻烦事，可你他妈的什么事也干不了，没法阻止它。只能坐在那里看着、等着。”

像许多周末版上的悲剧一样，劳娜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

劳娜在凯端治投海了。

海特说：“这些人都是这样，她们朝海里游啊游啊，直到精疲力竭游不动为止。”

当警察来通知劳拉这件事时，她只说出几个字。

劳拉说，“这好，这好，这样更好。”

蓝色卡车

有许多原因促使我希望自己长大能像埃多斯那样。他属于街上的上流人物之一，他只在清晨开垃圾车工作一会儿。

此外，大伙都说埃多斯简直是个传奇般的人物，并非是说他能写出如何壮丽动人的诗篇，而是说他是个人人喜欢的人物，一个悠闲而且穿着整齐，颇得女人青睐的人。

海特常说：“作为一个开垃圾车的，埃多斯太爱干净了。”

埃多斯很讲卫生，简直有洁癖。

他刷起牙来常常需要个把钟头。

事实上，向生人介绍埃多斯时，你只需说：“知道吗，就是那个整天把牙刷塞在嘴里捣鼓的小个子。”

这也是埃多斯让我羡慕的一件事。有一天中午，我把牙刷放在嘴里在院里来回走着。

我妈说：“你搞什么名堂？你干吗不去撒泡尿和泥巴玩？”

这事使我伤心了好几天。

但这也挡不住我把牙刷带到学校去刷牙，但还是引起一阵风波。我很快意识到，只有像埃多斯那样人才能叼着牙刷，刷来刷去的。

埃多斯总是穿着整洁，卡其布裤老是笔挺的，鞋擦得锃亮。他穿衬衣只系着三个纽扣，露出多毛的胸口，袖口卷到手腕上，恰到

好处地露出那块明晃晃的金表。

甚至，埃多斯穿上外衣时，那块表还是露在外面，好像是不留神让表带挂住了外衣袖口。

等我长大以后，才发现埃多斯竟是那么矮小。

我问海特：“你认为埃多斯告诉咱们说女人多么喜欢追求他，是真的吗？”

海特说：“嘿，小子，如今女人都像鬼一样精明，只要那人有钱，哪怕是个侏儒，她们也愿意去追。”

我说：“我才不信你说的呢。”

那时我年龄很小。

然而，我却经常在想：假如世界上有一个女人都喜欢的男人，那一定是埃多斯。

他风度翩翩地坐在那辆蓝色的卡车上，嘴里叼着牙刷的样子真帅！

但是，当他坐在卡车上时，你根本没法和他搭话，那时的他，和平时的埃多斯简直判若两人，他一丝笑意都没有，紧板着面孔。如果我们打算像平常爬冰车那样爬上他车后面的拖斗，埃多斯便用他的鞭子毫不留情地抽打我们，厉声喝道：“你们把这当成什么车啦？你爸爸能买得起这车吗？听见了没有？”

每年埃多斯都因驾驶最清洁的垃圾车，而获得市政会的嘉奖。

每逢埃多斯谈论起他的工作，便使人自惭形秽，感到自卑。

他自称在西班牙港总督之下的所有大人物他全都认识。

他说：“昨天我去医疗中心的主任家，去拉了两三桶垃圾。知道吗？我和他很熟，我到他家去装垃圾已经好几年了。真见鬼，那时他才是个毫无名气的医生。所以，昨天他见到我就喊道：‘埃多

斯(知道吗?他一直是这么叫我),埃多斯,他说:来喝一杯吧。’嗯,工作时我不愿意喝酒,喝那玩艺儿好误事。可他死乞白赖地把我从车上拉下来,最后只好和他一起喝酒,他把他的烦恼统统告诉了我。”

他还讲了一些有钱人家的女人是如何站在垃圾桶后等候着他,央求他运走那里的垃圾。

当清洁工罢工时,埃多斯的样子才有意思呢。正如我所说的那样,那些清洁工是很傲慢的人,常无缘无故地罢工。

他们深知自己的力量,如果他们连续二十四小时罢工不干活的话,整个西班牙港就会被垃圾吞没。

在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里,埃多斯便在米格尔街上慢吞吞地来回走着,他神情冷酷暴躁,一句话也不说。

那些天里,他系着红领带,嘴里含着一把红色的牙刷。

有时,我们到伍德福德广场上去,看那些激动的人们举行罢工集会。

我惊愕地看到埃多斯在唱歌,歌声激昂,可他显得十分悲伤。

海特告诉我:“这里有暗探,知道吧,他们把埃多斯这些人所说的每个字都记下来了。”

识别这些暗探并不难,他们穿着一一种平纹布制服,灰帽子,白衬衣,棕色的裤子。他们手里拿红铅笔,捧着一个大笔记本不停地记录着。

而埃多斯却毫无惧色。

我们都知道埃多斯不是个草包。

埃多斯当时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天,埃多斯带回家一双鞋,漫不经心地拿给我们看,似乎对我们是否注意到那双鞋毫不在意。

他刷着牙，眼睛看着别处，说：“今天从拉巴塞，就是那个堆垃圾的地方拾回来的。”

我们发出一阵惊叹，那简直就是一双新鞋。

“人们就是这么爱扔东西。”埃多斯说。

他补充道：“这话一点没错，知道吧，只要你留神去找，准能捡到东西。我认识一个人那天捡回一张床。还有那天我去克莱尔大街收垃圾，有个蠢女人跑过来把我拉进她家，告诉我说要给我一台收音机。”

博伊说：“难道说那些阔佬们把这样的东西都扔掉啦？”

埃多斯把头一抬，笑了起来，笑我们无知。

埃多斯捡回鞋来的事很快传遍了整条街。我妈为此感慨万千，她说：“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情，我在这儿整天干活，把手指都快磨掉了，却没人给我这样的鞋。瞧：你这个尖嘴猴腮的模样，什么也干不了，再瞧瞧人家带回什么样的东西。”

后来，埃多斯不断地把更多的东西带回家来，他弄回家一副床架，十来个只有细小裂纹的茶杯和茶碟，长短不一的木棒，各种各样的钉子和螺丝，有时甚至还有些钞票。

埃多斯说：“今天我碰见一个老爷们儿，他告诉我说：‘千万别把捡来的鞋子丢掉，好好查看一下鞋里面就能找到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们吃不准埃多斯是对他的工作，还是对收集破烂更加自豪。

他每天花一个半小时从车上卸下那些破玩意儿。

谁要想找几个钉子或一小块铁皮之类的东西，头一个要找的人就是埃多斯。

每逢有人求他时，他总要大发一通牢骚，不过看样子他还是

非常得意有人去求他。

他会说：“我整天价干活儿，搞回这些材料和东西，人们却认为他们有权跑来说‘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有那么一段时间，街上的人都管埃多斯捡来的破烂货叫作“材料”。

泰特斯·霍伊特的学校办起来之后的一天，他对我们说，他要花好多钱买书本。

他说：“我至少得花六十块钱。”

埃多斯问：“这些钱能买几本？”

泰特斯·霍伊特说：“嗯，七八本吧。”

埃多斯轻蔑地笑起来。

埃多斯说：“拿一毛二分钱来，我给你一大摞，你干吗为了八本书花这么多钱？”

埃多斯售出不少书本。

海特也买来两毛钱的书本。

泰特斯·霍伊特就是这样使大伙受教育的。

还有一桩雕刻画的买卖。

一天埃多斯说：“我今天捡回来两幅画，两幅漂亮的风景画，还有框架什么的。”

我回到家说：“妈，埃多斯要卖给我们一些画，只要一毛二分钱。”

我妈意外地一怔。

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来到门外。

埃多斯取出画儿，说：“就是玻璃脏点儿，不过你经常擦擦就行了，这可是些很漂亮的风景画。”

那上面雕刻着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一条船在奋力搏击着。

我看到妈妈惊喜地几乎叫出声来，她连声说：“我一直想得到些风景画。”随后指着我对埃多斯说：“知道吧，这孩子的父亲也经常画画。”

看上去这话给埃多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问道：“也像这些画那么美吗？”

我妈没有回答。

他们谈了一会儿，我妈付给埃多斯一毛钱。

假如埃多斯搞来的东西没人愿买时，他便去找我那个什么都愿买的比哈库叔叔。

他常说：“没准什么时候你就刚好需要这些东西。”

海特说：“我看这些材料全装在埃多斯脑袋里，世上总会有这样的人。”

我从没为这类事操过心，直到一天埃多斯来找我：“你不想收集废公共汽车票？”

我以前压根就没想过这事。

埃多斯说：“这正是你这么大男孩该干的事，你每收集一千张公共汽车的废票，我给你一个便士。”

我说：“你要旧汽车票干吗？”他大笑起来，好像我是傻子似的。

我倒没去捡什么汽车票，可看到不少别的孩子干这事。他们每捡到一百张车票，埃多斯就让他们不花钱坐一次他的车。

海特说：“要是他打算收集图钉可就要惹麻烦喽。”

然而发生了一件事，使埃多斯变得像法官一样严肃认真。

一天他说：“我碰上麻烦了。”

海特说：“怕是要告诉我们，你那些材料和东西都是偷来的

吧？”

埃多斯摇摇头。

他说：“一个姑娘怀上了我的孩子。”

海特说：“你能肯定是你的吗？”

埃多斯说：“她说是的。”

真不明白埃多斯干吗为这事这么着急。

海特说：“别犯傻了，伙计，这种事人人都会碰上的。”

这些安慰丝毫没减轻埃多斯的忧虑。他无精打采地收集着垃圾，后来竟干脆不干了。

海特说：“看样子埃多斯打算留下这个孩子了。”

海特再次问：“你敢肯定那孩子是你的，而不是其他人的？你知道有些女人就是靠这个过日子。”

埃多斯说：“她就是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我也逃不了。”

海特说：“她是不是像劳拉一样？”

埃多斯说：“嗯，劳拉和一个男人只生一个孩子，这个姑娘却要生两三个。”

海特说：“我说，你不要担心，你还吃不准是不是你的孩子，等等看吧，等等看。”

埃多斯愁眉苦脸地说：“她说要是我不要这孩子，她就去砸我的饭碗。”

我们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

埃多斯说：“她认识的人很多，她说要去找他们把我从卡莱尔大街调到干河去，那边的人都是些穷光蛋，什么东西也不舍得丢。”

我说：“那样你就什么材料也捡不回来了吧？”

埃多斯点点头，我们大伙全明白啦。

海特说：“那首克利索普小调唱得不错，听着：

男人的心肠歹毒，

女人的心肠更加狠毒。”

“我知道这种女人，她会生下一大堆孩子，让那些当父亲的人把孩子养大，还要给她付钱。等到三十或三十五岁时，她已经从许多男人那里捞到一笔钱，还不用抚养任何一个孩子，我明白这种事。”博伊说：“别担心，埃多斯。等等看，到底是不是你的孩子，等等看吧。”

海特说：“博伊，说这种事你小子还太嫩。”

又过了几个月。

一天埃多斯宣称：“她昨天生啦。”

海特问：“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我们大伙都为埃多斯感到遗憾。

海特问：“你认为是你的吗？”

“是的。”

“你打算把她抱回家吗？”

“大约一年以后吧。”

“那你就没什么值得发愁的啦。要是你的孩子，就把她抱回来，伙计。你还会呆在卡莱尔大街上捡你的材料。”

埃多斯虽说也同意，但看上去并不怎么高兴。

早在那孩子来米格尔街之前很久，海特就替她取了个绰号叫

乐乐，直到她长成了大姑娘之前，人们一直这么叫她。

一天晚上，孩子的妈妈把乐乐抱来，她只呆了一小会儿。埃多斯的艳福不浅，我们看到她是那样的美丽，她是个放荡的西班牙女人。

但当我们看到乐乐时，只须一看便可知道她决不会是埃多斯的孩子。

博伊随口哼起克利索普小调：

中国的娃娃叫我爸爸！
我黑得像块炭，
我老婆也像沥青一样，
尽管如此……
中国娃娃仍叫我爸爸！
哦，上帝啊，有人把牛奶搅进我的咖啡里。

海特使劲拧了博伊一下，对埃多斯说：“她是个漂亮的娃娃，埃多斯，像你。”

埃多斯说：“你是这么以为的吗，海特？”

海特说：“是的，伙计，我想她会成长成一个惹人喜爱的姑娘，就像她父亲一样讨人喜欢。”

我说：“你有了个漂亮的女儿，埃多斯。”

那孩子还在睡着，粉红色的脸蛋是那样美。

埃罗尔说：“在她成人之前，我愿意等上十六年。”

此刻埃多斯脸上露出了微笑，最后冷不丁地大笑起来。

海特说：“闭嘴，埃多斯，你会把她吵醒。”

埃多斯又问：“你真的认为她长得像我吗，海特？”

海特说：“是的，伙计。我认为你做得对，知道吗，埃多斯，要是我不留神在外边搞出孩子来，我一定会把她们全抱回来，伙计，这可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埃多斯说：“海特，我很早以前就捡回一个鸟笼子，明天我拿来给你。”

海特说：“我早就想要一个漂亮的鸟笼子。”

我们所认识的埃多斯一直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如今的埃多斯又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乐乐。她成了全街女人们的孩子，墨尔根太太，比哈库太太，劳拉还有我妈都争相来帮忙照看孩子。

如果说街上以前曾有人想耻笑她，那乐乐在健美婴儿评选中得的头奖会让他闭上嘴，乐乐的照片在报纸上登了出来。

爱,爱,爱,孤独

一天早晨九点钟左右,一辆载着灵柩的汽车停在希尔顿小姐门前。从车上下来两个穿着黑衣的中年男女。那个男人喃喃地对着灵柩里的男人说着什么,而那个女人有节制地哭泣着。

这是我所见到的米格尔街上进行最快且最神秘的葬礼。这与我参加的另一个老寡妇的葬礼截然不同。那次是为住在这条街上人缘极好的利卡普小姐,一个社会工作者举行的葬礼,一共来了七十九辆漂亮的汽车和自行车。

这一男一女中午又回来了,在院子里焚烧垫子、毯子一类的东西。接着这所灰木房子的所在窗户都被打开了,我看到了一件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周末院子里芒果树上钉上了一个牌子:待售。

这条街上没有人认识希尔顿小姐。在她生前,她家大门永远是关着的,没人看到她离开过,也从没有人进去过。因此,对她的死,没有人感到伤心难过。

当我想起希尔顿小姐的房子时,头脑里只会出现灰和绿两种颜色。绿色的是芒果树,灰色的是房子以及用来防止人们偷芒果的、高高的镀锌铁栏。

如果你把球踢到希尔顿小姐的院子里的话,就永远别想找回来了。

希尔顿小姐并不是在芒果成熟的季节去世的,但我们还是找

回来十几个球。

在没见到房子的新主人前我们就开始不喜欢他了，这倒不是我们毛病太多，而是那人已经开始向警察投诉我们，抱怨我们在人行道上踢球，如果我们不踢球他也会抱怨我们太吵闹。查尔斯警官就会来说：“孩子们，所里又派我来了，那个爱发牢骚的男人又打电话了，你们就让人家安静点儿吧！”

一天下午当我从学校里回来时，海特对我说：“搬来了一男一女。那个女的特漂亮，男的却是个丑家伙，他们看起来像波哥大人。我只瞅了一眼，没看清楚，前门开着，但窗户却又都重新关上了。”

我听见一条狗愤怒地吠叫着。

无论他们是何许人也，但至少有一件事令人满意，那就是，再也没有人打电话向警察抱怨我们发出噪声影响他们的午觉了。

有一天晚上，那所房子非常吵闹，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且一直到午夜特立尼达电台停止播音，此外还有狗叫及男人们叫喊，但我没听到女人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异常安静，我一直等到看见那女人后才去上学。

博伊说：“你知道，海特，我想，我在哪儿看到过那个女人，可能是在马卡鲁普大街送奶时见过她。”

这位女士与米格尔街上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她穿着太华丽了，而且过于漂亮、优雅。当她和其他女人为了争夺短缺的玉米面而挤在一起时你会感到非常可笑。

我想博伊是对的，这女人更适合于站在漂亮的马卡鲁普的豪宅花园里，一个穿制服的仆人在她身后忙碌着。几天后那男人出

现次数多了些，他很高很瘦。他的脸非常丑陋，且长满粉色的斑点。

海特说：“上帝啊，你看他是最能喝酒的人。”

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个高个儿男人每天都喝酒，他身上散发着臭气。我非常怕他，每当遇见他时，我总是马上走到马路对面去。

如果说他妻子（或是他的什么人）比这条街上任何人穿得都好的话，他可以说是我们中穿得最差的，甚至比乔治还要脏，从没见过他干过任何活儿。

我问海特：“一个那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和一个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海特却说：“孩子，你不会懂的，如果我告诉你，你也不会信的。”

还有他那条狗，如同山羊一样大，又像公牛般粗野，它有一张和它主人一样的瘦脸，我经常看到他们在一起。

海特说：“如果这条狗跑出来肯定会惹大麻烦。”

几天后，海特说：“真叫人纳闷，我没看见他们带来任何家具，他们似乎只有收音机。”

埃多斯说：“我可以卖给他们许多东西。”

我经常想起那所房子里的男人、狗和女人，并且为女人担心害怕。我喜欢那女人，因为她总是努力表明她一切都很好，并且总是努力做到和大街上的其他女人一样的，并不想与众不同。

苦难终于开始了，那女人经常哭喊着跑出来。我们会听到吓人的狗叫及男人的喊叫、诅咒。他那粗野的语言使我们感到震惊。

海特对人说：“两个人呆在一起容易吗？看那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爱德华和埃多斯笑了起来。我问道：“海特，出了什么事儿？”

海特说：“孩子，你太小了，不懂这些，等长大了再说吧！”这更使我感到情况不妙。

那女人好像突然忘记了羞耻。她边跑边对街上任何人哭喊道：“救命啊！救命啊！如果他追上会杀了我的。”

一天她闯进了我家，且没有一点儿为此而道歉的意思。她吓得连哭都忘了。我从没看过我母亲那么急切地帮助过任何人，她给那女人拿来茶和饼干。那女人说：“我不明白托尼这几天怎么了，但是你知道他只有晚上才这样，早晨他还非常好，只是中午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接着他就发疯了。”

开始我母亲对那女人还非常耐心，尽可能地安慰她，用尺子打着拍子，就像鼓励着她战斗一样，并且还许愿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通常我母亲称男人为男性，但和那女人说话时她开始谈论起“男上们”，把我死去的父亲当作典型的例子。

我母亲说：“这孩子父亲的情况刚好相反，每当我走进他的卧室时，他总是跳下床并且喊叫着跑掉。”

但是当那女人来我们家三四次后，我母亲变得和平常一样了。对待她同对劳拉和比哈库太太等女人一样。

我母亲会说：“海瑞拉夫人，请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开那个一无是处的男人呢？”

而海瑞拉夫人则答道：“你也许会觉得我太蠢了，但我喜欢托尼，我爱他。”

我母亲说：“该死的爱情。”

接着海瑞拉夫人开始谈论起托尼来，就像谈论一个她所喜爱的孩子一样。

她说：“你知道，托尼有许多优点，他的心眼非常好，真的。”

母亲说：“我不懂什么心眼的事，但我知道该在他背上拍一巴

掌,让他清醒清醒。你怎么会让那男人这样丢你的脸呢?”

海瑞拉夫人说:“不,我了解托尼。他得病时是我照顾他的,这都是战争造成的,他是个水手,曾被鱼雷击中过两次。”

我母亲说:“他们应该再来一次。”

“你不能这样说。”海瑞拉夫人说道。

我母亲说:“看,我只是说我的看法,你不是来听我的建议的吗?”

“我不是来求教的。”

“你来请求帮助,而我则是在努力帮助你,就是这么回事。”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或建议。”海瑞拉夫人说。

我母亲仍保持着冷静,她说到“那好吧!回到你那伟大的男人身边去吧。都是我的错,我干吗要掺和你们白人的事呢。你知道这句话:正是爱,爱,爱,孤独导致爱德华国王退位。好,让我告诉你,你即使不知道也该听说过爱德华国王吧!回到你那伟大的爱中去吧!”

话说到这份儿上,海瑞拉夫人只能离开了,临走前,她会说:“我希望永远不会再回来!”

但第二天晚上她还会再来。

一天我母亲说:“海瑞拉夫人,人们都怕你们那条狗,它对我们来说也许太粗野了。”

海瑞拉夫人说:“那不是我的狗,是托尼的,甚至我都不能碰它!”

我们都瞧不起托尼。

海特说:“对一个男人来说时常打老婆是件好事,可这家伙打起来却像是在进行健身锻炼。”

与此同时,人们也反感他酗酒。

人们时常会发现他喝得像死人一样醉倒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他也会曾尝试过与我们交朋友,但这反而使我们感到更不舒服。

他通常说:“孩子们好!”

他好像再也不会说别的话。而当海特及其他大孩子为了表示友好而与他谈话,我感到托尼并未认真听。

当你说到一半时,他会一句话也不说而突然离去。

海特说:“这也是件好事,我感到如果我看他时间长的话会呕吐的,你看,有时白皮肤也会是件讨厌的事。”

事实上,他的皮肤让人恶心,在黄色的皮肤上布满着白色、褐色及黑色的小点儿,在他的左眼上面有一块裸露着肌肉的烫伤的疤痕。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奇怪,那就是当你只看托尼那瘦巴巴且长满褶子的胳膊时,你只会感到可怜而不是厌恶。但我只有和海特他们在一起时才敢看他的胳膊。

我希望海瑞拉夫人只看他的胳膊。

海特说:“我真不知道这事儿能持续多久。”

海瑞拉夫人自然希望能持续很长时间。

她和我母亲终于成了好朋友。经常听她谈起自己的计划,说打算买些家具,我想她确实已经买了一些。

但大多数时间她是在谈论托尼;从她的谈话中任何人都能听出托尼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男人。

她说:“托尼正考虑离开特立尼达。我们可以在巴巴多斯找间旅店。”

或者说：“一旦托尼恢复过来，我们就要去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要么说：“你知道，托尼是个很严格的人，他能力很强，真的！当他重新获得力量，我们就会好起来。”

托尼的行为仍和原来一样，好像并不知道为他做的计划。他拒绝安静下来，并且变得越来越粗野，越来越不招人喜欢。

海特说：“他简直是个没有完成进化的野蛮人，好像他忘了厕所是干什么用的。”

除此之外，他变得更不合群了。

海特说：“我们是该帮帮托尼了。”

他们揍他的那天晚上我也在场。

过后很久，海特还在想这件事。

真是邪门。海特和其他人毫无火气，托尼自己也不生气。他无动于衷，也不还手，拳头打在他身上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他看起来并不害怕，他不哭不笑只是站在那儿默默地承受着。

倒不是因为他勇敢。

海特说：“他只是喝得太多了。”

最后连海特自己也火了，说：“这他妈一点儿用都没有，我们什么都不该做，这人一点感觉都没有。”

从海瑞拉夫人的谈话中，你可以清楚地知道她对此一无所知。

海特说：“不管怎样，这总要好点儿！”

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有一件事儿却一直困扰着我们。一个像海瑞拉夫人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和托尼结合？

海特说他懂。但他也和我们一样想知道海瑞拉夫人到底是什

么人，甚至我母亲也对此很感兴趣。

博伊有个主意。

他说：“海特，你知道，有些人在他们的妻子或丈夫离开他们时会登广告的。”

海特说：“博伊，你他妈的也想得太多了，像你这样的小孩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

博伊感到委屈。

海特说：“你怎么知道海瑞拉夫人离开了她丈夫？你又怎么知道她没和托尼结婚呢？”

博伊说：“我告诉你，海特，我在马卡鲁普街送牛奶时见到过她，我告诉过你吧！”

海特说：“白人不做那种广告，他们不把这种事登在报纸上。”

埃多斯说：“你们根本不明白你们在谈论些什么，你们总共才认识几个白人。”

最后海特答应得更仔细地看报。

后来，出了个大麻烦。

一天，海瑞拉夫人哭喊着跑了出来：“他发疯了！他发疯了！他真的要杀我！”

她告诉我母亲：“他拿着一把刀追我，嘴里还不停地喊‘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你怎么招惹他了，”我母亲问。

海瑞拉夫人摇摇头说：“这是他第一次威胁要杀我，我认为他是认真的。”

直到这时她才像一个小姑娘那样痛哭起来。

她说：“托尼忘了我为他做的一切，他忘了在病中我是如何照

顾他，你说对吗？我为他做了一切，我放弃了一切，金钱、家庭。这都是为了他呀！他这么对待我对吗？噢，上帝呀！我做错了什么，使你这样对待我呀！”

她就这样边哭边诉说着。

我们走开让她自己待了一会儿。

我母亲回来后说道：“托尼是那种举手便可要人性命却不知自己是在杀人的家伙。你今晚想睡在这儿吗？你可以睡孩子的床，让他睡地板上。”

海瑞拉夫人并没有认真听。

我母亲摇了她一下，又重复了一遍。

海瑞拉夫人说：“我现在好了，真的。我回去和托尼谈谈。我想是我无意中冒犯了他。我必须回去，以便知道到底是怎么冒犯他的。”

“唉，我真没办法！”我母亲说道，“我想你爱得太深了。”

然后海瑞拉夫人就回家去了。我和母亲等待着哭喊声，然而很长时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早晨，海瑞拉夫人又像往日一样从容、优雅。

她的活力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衰退。她的美丽也逐渐逝去，脸上出现了皱纹。她的眼睛总是红肿着，眼睛下面的黑斑看上去格外显眼。

海特跳起来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很早就知道！”

他把分类广告上关于个人的栏目指给我们看。七个人决定离开他们的配偶，我们跟着他的手指谈道：

我,亨利·休伯特·克里斯坦尼宣布,我妻子马格拉·芒·克里斯坦尼将不再受到我的关心和保护,并且对和她有关的任何债务概不负责。

博伊说:“可能就是这个人。”

埃多斯说,“没错,是克里斯坦尼,一个医生。我太知道他了,原来我一直为他清除垃圾。”

海特说:“现在我问你,为什么,一个女人为了像托尼一样的男人而离开一个体面的人。”

埃多斯说:“是的,是克里斯坦尼,他有非常好的房子,漂亮的汽车,还很有钱,我认识他已经很长时间了,是在马卡鲁普大街上工作时认识他的。”

没出半个小时,这消息便传遍了整条米格尔街。

我母亲对海瑞拉夫人说:“你最好通知警察。”

海瑞拉夫人说:“不,不用,用不着。”

我母亲说:“你好像怕警察比怕托尼还要厉害。”

海瑞拉夫人说:“这谣言……”

“让它见鬼去吧,”我母亲说,“你生活中碰到了麻烦,而你却在想着谣言,你好像还没受够那男人的罪似的。”

我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回到你丈夫那儿去呢?”

她还以为这样说会使海瑞拉夫人吃惊地跳起来。

可是海瑞拉夫人却很平静。

她说,“我并不讨厌他,只是无法忍受他身上那种医生的气味,简直要憋死我了。”

我感到难以理解,努力看着我母亲的眼睛,试图从中看出些

什么。

托尼变得更加粗野了。

他经常拿着半瓶朗姆酒与他的狗坐在门前的台阶上。

他好像完全脱离社会，失去了感觉。很难想像海瑞拉夫人为什么会爱上他，没人能想得出他会爱任何人。

我想他就像一个畜生，像他那条狗。

一天早晨，海瑞拉夫人来到我家，非常平静地说：“我决心离开托尼。”

她过于平静了，以至于我母亲担心起来。

我母亲说：“发生什么事了？”

海瑞拉夫人说：“没什么，昨天晚上他让狗往我身上扑，而我自己连看都不看，好像不知道它在干什么。他无动于衷，完全是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我想他是真疯了，如果我不走，他真会杀了我。”

我母亲说：“你回哪儿去？”

“我丈夫那儿。”

“在他登报后还要回去。”

海瑞拉夫人说：“你知道，亨利就像个孩子，他认为可以把我找回去。如果我今天回去，他会高兴的。”

她说这些话时，看起来与往日截然不同，表情十分坚定。

我母亲说：“不要太肯定了。他认识托尼吗？”

海瑞拉夫人突然急切地说道：“托尼是亨利的朋友，不是我的。一天亨利把他带回家，当时托尼病得不像样子了。亨利是那种人，你知道，我从没碰到过像亨利那么乐善好施的人，他为了做善事和医疗事业，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我母亲说：“你知道，海瑞拉夫人，我真希望你能像我，如果-

个人在你十五岁时娶了你，我们就不应再听那些无聊的事，更不会有什心啊、爱啦乌七八糟的事儿了。”

海瑞拉夫人哭了起来。

我母亲说：“看，我并不想让你哭，对不起！”

海瑞拉夫人抽泣着说：“不，不是你。”

我母亲非常伤心。

我们看着海瑞拉夫人哭泣。

海瑞拉夫人说：“我给托尼留下了一个星期的食物。”

我母亲说：“托尼是个大男人，你用不着为他担心。”

当发现她真的离开了的时候，他发出了吓人的声音，他像狗一样地哀鸣着，孩子般地大哭起来。

接着他拼命喝酒，不像往常那样喝，而是喝得直到不省人事为止。

他把狗全忘了，一直让它饿了好几天。

他喝得醉醺醺地，哭喊着，挨门挨户地找海瑞拉夫人。

当他回家后就对狗发脾气，我们经常听到狗的嚎叫。

再后来，狗也急了。

狗为了生存扑向托尼。

托尼惊呆了。

狗跑出房门，托尼在后面紧追。托尼吹着口哨蹲下来，狗停了下来，竖起耳朵听着并且回头看了看。看着一个醉鬼为了让他的狗回来而频频向狗吹口哨，非常有趣。

狗还停在那儿，盯着托尼。

狗尾巴摇了两下，又垂了下来。

托尼站起来向狗走去，狗却转身跑了。

我们看到了他蜷曲在房间的床垫上，房间里除了床垫、一些空朗姆酒瓶和烟头外，一无所有。

他除了睡觉就是喝酒，脸色平静得出奇。

干瘦多皱的双手看上去是那么脆弱而无生气。

又一块待售的牌子被钉在芒果树上。一个带着五个孩子的男人买下了它。

托尼时常来骚扰新房客。

他来要钱，要朗姆酒，还老要那台收音机，他会说：“你那儿有一台天使牌收音机，我要收租金，一个月两美元，因此现在就给我两美元。”

新来的是个小个子男人，他非常害怕托尼，从不敢回答他的问题。

托尼也会看着我们喊道：“噢，孩子们，你们知道天使牌收音机吗？你们知道那收音机吗？现在那人在干什么？”

海特说：“真没想到世界上怎么会有托尼这种人呢？”

过了两三个月后，他不再到米格尔街来了。

许多年后我又见到了托尼。

那是我去阿里马旅行，在拉温梯由采石场附近看见托尼开着一辆货车。

他正在抽烟。

他的瘦胳膊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去卡瑞纳治的途中，我路过那栋很长

时间以来一直绕着走的房子。

我看见海瑞拉夫人正坐在花园中的安乐椅上读报,通过房间打开的门,可以看见一个身着制服的仆人正在准备午餐。

在车库里有一辆黑色轿车,一辆崭新且庞大的轿车。

机械天才

我叔叔比哈库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天生的机械师。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有台汽车之类的东西。我从没认为他有改进汽车性能的本事，可他总爱把发动机鼓捣出来，拆成碎片。泰特斯·霍伊特说爱斯基摩人也好这么干，这事还是他从地理书上看到的。

每当我极力回想比哈库时，总也记不清他的脸是什么模样，只能回想起他钻到车底时脚上的那双鞋底。每次比哈库钻在车底下时，我总是很担心，车闸一旦失灵，汽车就会压到他身上。

一天真的出事了。

他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只有比哈库太太一人听到了。

“噢，天哪！”她大哭起来，顿时泪流满面，“我早知道会出乱子，他非出事不可！”

每逢比哈库太太谈起她丈夫时，总要发出这样的断言。

听到比哈库的叫声，她急忙跑到院子里。

“老头子，”她低声问，“你不要紧吧？”

他的呻吟声越来越响。

他说：“还他妈的没事！你眼睛啦，没看见车把我的屁股都给压扁了？！”

比哈库太太真是个好妻子，又大哭起来。

她敲打着马口铁皮围墙。

“海特!”比哈库太太喊叫着,“海特,快来呀!汽车把他压在下面喽!”

海特正在打扫牛栏,听到比哈库太太的喊声便笑起来。“瞧瞧,我以前是怎么说的啦!”海特说,“整天捣鼓那熊玩艺儿?不撞见鬼才怪呢,明明是辆新车,干吗非要瞎折腾它?”

“他说那曲轴有点毛病。”

“他现在找到曲轴在哪儿了没有?”

“海特,”比哈库在车底下吼道,“等你把我从车下弄出来,我非抽你的筋不可!”

“老头子,”比哈库太太劝她丈夫说,“你咋这么不识好歹,人家好心好意地跑来救你,你倒要揍人家。”

海特作出一副受到伤害和误解的样子。

海特说:“瞧这事可有多新鲜,全是我自找的,就像我爱管别人的闲事似的,我想还是把你丈夫留在这儿,我回牛栏干我的活儿得啦。”

“别,海特,你别听他瞎叨叨,想想要是您让汽车压在下面,也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话来。”

海特说:“好吧,好吧,我这就去找几个哥们儿来。”

我们听到街上响起了海特喊叫声,“博伊!埃罗尔!”

没人答话。

“博伊……埃罗尔……”

“来啦……海特。”

“你的这帮小子钻到哪儿去啦?你们倒像个人儿似的,把手插在裤兜里东游西逛的。你们刚才抽烟了吧?”

“抽烟?”

“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一下子全聋啦？”

“是博伊抽烟啦，海特。”

“瞎说，海特，是埃罗尔，我只是在旁边站着看他抽。”

“你们觉得自个儿挺能，是吧？真他妈欠揍，埃罗尔，去折条树枝，抽博伊一下，博伊，你也去折条树枝，抽埃罗尔一下。”

我们听到他们的抱怨声。

车底下的比哈库喊道：“海特，你少管他们的事吧，知道吧，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你还是少管点事吧，他们已经长大了。”

海特吼道：“你少管闲事！听着，要不我就让你在车底下呆上一辈子。”

比哈库太太劝丈夫说：“你就少说一句吧，老头子。”

后来才知道本来并没有什么大事。车闸失灵了，可主轴却被一块小木块卡住了，比哈库被车轮挤在地上，但没有受伤。

比哈库从车下爬出来，看着身上的衣服，一条卡其布裤子和一件背心上涂满了油污。

比哈库对他老婆说：“现在可真够脏的啦，是吧？”

她自豪地瞧着丈夫说：“是啊，老头子儿，确实挺脏。”

比哈库脸上露出笑容。

海特说：“唉，我可真不愿意帮你抬汽车，听着，我看你最好还是去找一个技工来吧。”

比哈库根本听不进去。

他对他老婆说：“曲轴倒是好好的，可能是其他的毛病。”

比哈库太太说：“好啦，你还是先去吃饭吧。”

她看着海特说：“他一干起活儿来就忘了吃饭，非得我提醒他不可。”

海特说：“对我说这些干吗？想让我找笔纸记下来寄到报社去？”

我极想晚上来看比哈库叔叔修车，于是对他说：“比哈库叔叔，你衣服上的油污可真多，真想像不出你怎么能受得了。”

他转过身来，朝我笑笑说：“不这样行吗，孩子？像这样当技工的根本没时间洗衣服。”

“车出了什么毛病，比哈库叔叔？”我问。

他没答话。

“是不是气门响？”我试探道。

比哈库告诉我的有关汽车的一件事就是挺杆经常震颤。世上随便哪辆汽车一到比哈库的手里，他总会说：“我说这车气门响，知道吧，听，听呀？”

“是不是气门响？”我问道。

他朝我走过来，急切地问：“什么？你听见气门响啦？”

“嗯，确实有气门声。”我的话还没说完，比哈库太太就把他拖走，说：“走，去吃饭去，老头子，天哪，今天你的衣服可真够脏的。”

压在比哈库身上的那辆车并不完全是辆新车，尽管比哈库吹嘘说它几乎是新的。

“这车才跑了两百英里。”他常说。

海特说：“喂，我知道特立尼达地方不大，可没想到竟会这么小。”

我记得车子买回来的那天是个星期六。那天早上比哈库太太来找我妈，她们在一块谈论米面的价格和黑市上的行情。离开时，比哈库太太说：“今天他进城了，说要去买辆新车。”

于是，我们等待着新车的到来。

已是中午了，还没见到比哈库。

海特说：“我用二比一打赌，这会儿那家伙准是在拆发动机呢。”

四点钟左右，我们听到一阵唧唧的汽车声响，顺着米格尔街朝码头那边望去，看到一辆轿车，一辆1939型蓝色的切罗利特，看上去油光锃亮。我们挥着手臂欢呼起来，我看到比哈库挥动着左手。

我们跳到比哈库家门前的马路上，手舞足蹈地喊叫着。

车越来越近了，忽然海特叫道：“留神，哥们儿！快跑，这家伙是疯啦。”

车来到眼前，却丝毫没有减速，疾驶而过，我们停止了叫喊。

海特说：“车失控了，如果不马上想办法，我看来出事啦。”

比哈库太太笑着说：“瞧你想到哪儿去啦！”

我们大声喊叫着跟在比哈库后边跑。

他已顾不上挥动左手了，正在全力避开路上的行人。

真是奇迹，快到阿瑞厄皮塔大街时，车居然停了下来。

比哈库说：“一拐进米格尔街，我就踩下了刹车，却一点用也没有，真是件怪事，今天早上我刚刚彻底检修了车闸。”

海特说：“有两件事你得干，车把人撞死之前，彻底检修一下你的脑袋，或是检修一下你的屁股。”

比哈库说：“你们这帮小子来帮我吧车推回去。”

当我们推车经过那个焰火师墨尔根家门前时，墨尔根太太说：“喂，比哈库太太，我今天总算看到你家买的新车啦。”

比哈库太太没搭话。

墨尔根太太说：“喂，比哈库太太，你认为你丈夫能让我搭他的新车吗？”

比哈库太太说：“是呀，他会让你搭车的，不过要先等你丈夫买回毛驴让我坐一回才行。”

比哈库对比哈库太太说：“你干吗不闭上你那张嘴巴？”

比哈库太太说：“干吗让我闭上嘴巴，你是我丈夫，我就是耍出来替你说话。”

比哈库拉下脸来，说：“听着，等我叫你时，你再出来替我说话。”

我们离开比哈库房前的汽车，留下比哈库先生和比哈库太太在那里拌嘴。其实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争论。比哈库太太声称自己有权出来维护自己的丈夫，比哈库却对此不屑一顾，最后比哈库把他老婆狠狠揍了一顿，才结束了这场争论。

事实上这也并非是件易事，比哈库太太的身材使人很容易想起一只放在磅秤上的鸭梨，她肉多膘厚，当她双手卡腰时，那双浑圆的手臂活像是镶在圆球上的两个把手。

至于谈到她吵架时的那副嗓门……

海特常说：“听起来像是留声机里的唱片快速倒退的声音。”

我知道，以前比哈库一直用树枝教训他老婆，后来，我吃不准是不是海特建议他改用的板球棒，反正是在某个人的建议下，为比哈库太太从一个运动场的园工手里买来了一根旧板球棒。

海特说：“我想只有那玩艺儿能让她有点感觉。”

最令人费解的是比哈库太太总是把它擦拭得干干净净，油光闪闪的。有好几次，博伊去借那板球棒，比哈库太太却从未借给他过。

汽车压着比哈库的当天晚上，我去看他干活。

“你是怎么听到汽门响的呢？”他说。

“我没说什么，”我说，“我只是在问你。”

“哦。”

比哈库把发动机拆下来，一直干到半夜。第二天他又干了一整天，星期天，又干了个通宵。星期一来了一个机械师。

比哈库太太告诉我妈说：“是公司派那个机械师来的。麻烦就出在特立尼达的机械师都是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他们对汽车什么的一窍不通。”

我在比哈库家门前转悠，看见那个机械师把头伸在汽车机器罩下忙活着，比哈库坐在汽车踏板上，给机械师递过来的部件上油。看着他神情愉快地抹着机油的样子，我禁不住央求道：“让我来抹油吧，比哈库叔叔。”

“走开，小子，你太小啦。”

我坐下来看着他干。

他说：“气门是在响，不过我已经把它修好啦。”

我说：“好。”

那机械师嘴里不干不净地咒骂着。

我问比哈库：“转向器怎么样？”

他说：“我要检查一下。”

我站起来，绕过汽车，走到汽车踏板前，坐到比哈库旁边。

我望着他，说：“你知道吗？”

“什么？”

“星期六那天我一听到汽车发动机声就知道它有毛病。”

比哈库说：“你可真聪明，知道吧，你学得蛮快。”

我说：“那还不是你教得好。”

的确不假，我对汽车的所有知识都从他那学来的。什么汽门响，转向器，发动机晃动，还有……嘿，我忘了一件东西。

“你知道吧，比哈库叔叔。”我说。

“什么，孩子？”

“比哈库叔叔，我想是汽化器的毛病。”

“你真是这么想的，孩子？”

“我敢肯定，比哈库叔叔。”

“喂，我告诉你吧，孩子，我告诉机械师的头一件事就是这个，可他说不是。”

机械师从机器罩下，抬起那张肮脏而又愤怒的面孔，说：“白人们亲手制造出来的发动机让你们这帮傻瓜瞎捣鼓，不出毛病才见鬼呢！”

比哈库朝我挤挤眼。

他说：“我看是汽化器的毛病。”

在所有这些活儿中，我最喜欢摆弄汽化器。有时，比哈库启动发动机时，我就用手捂着汽化器孔一张一合地。比哈库从未告诉过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我也从未问过这事。有时，我们不得不用吸管从油箱里吸出一些汽油，比哈库启动发动机，我把汽油浇进汽化器。我常常央求他，让我起动一次发动机，可他一次也没同意过。

一天发动机突然起火，我一下从车上跳下来，火没烧多久。

比哈库从车里下来，恼火地瞅着发动机。我想它实在令他头痛，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把它砸得粉碎。

那次是我们最后一次摆弄汽化器。

终于机械师检修完发动机和车闸后，说：“喂，车修好啦，听着，这活比我重新装出新车都难，别再他妈的瞎捣鼓了。”

机械师走后，比哈库若有所思地围着车兜了两三圈，比哈库

揉着下巴，却没朝我走来。

忽然，他跳进车里，坐在司机座上按起喇叭，足足响了几分钟。

他说：“你听这喇叭声怎么样，孩子？”

我说：“再按一下我听听。”

他又按了一次。

海特从窗户里伸出脑袋，喊叫起来，“比哈库，叫你那该死的车安静点，你搞得这地方听起来像是在举行婚礼。”

我们没有理睬海特。

我说：“比哈库叔叔，我认为这喇叭声好像有点毛病。”

他说：“你真是这么认为？”

我做个鬼脸，吐了口唾沫。

于是，我们开始修理喇叭。

我们在方向盘上缠上一些花线，修理便告完成。

比哈库看着我说：“瞧，你只要拿这线头碰一下金属，喇叭就会响。”

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可实际上确实奏效。

我常对人说：“我喜欢比哈库叔叔，尽管大家都认为他是令人讨厌的家伙。我喜欢他，就像我喜欢那个木匠波普一样。如今想来，比哈库也算个手艺人。他热衷于捣鼓汽车，并从中获得乐趣，而且从不为此花费而心疼。”

但是，他的妻子却为此感到忧虑，她像我妈一样生来就善于理财，精通赚钱的门道儿。

一天，她和我妈谈论起这事。

我妈说：“这些日子出租车可以挣不少钱，可以拉着那帮美国

大兵和他们的女友到处跑。”

于是，比哈库太太让他买了一辆卡车。

这辆车给米格尔街增添不少光彩。它是一台大型的贝德福德牌车。比哈库第一天买回车来时，我们全都拥上街头欢迎。

就连海特也赞不绝口地说：“如果说英国人也能制造一件像样的东西来，那就是这种卡车。我说，这车比福特和道奇车强多啦。”

比哈库开始每天下午忙活着拾掇车，比哈库太太四处发话，“干吗不去看他是怎么修理那辆贝德福德车的？”

比哈库不时从车底下钻出来，擦拭机器车翼和车前盖，然后再钻回车底下。他脸色凝重。

第二天，借钱给比哈库买车的那些人凑到一起，来到比哈库的家，央求他手下留情。

比哈库呆在车底下不出来，也不答话。债主们气得直喘气，其中的一些女人哭了起来，比哈库依旧不理不睬，最后人们只好悻悻而去。

人们走后，比哈库便开始拿他老婆出气，他边揍边说：“都怪你让我买卡车，怪你出的馊主意！你整天就知道赚钱，和你妈一样。”

当然，这并不是惹他发脾气的真正原因，真正令他恼火是那台拆开却装不起来的发动机，现在还有两三个装不上的部件摆在那里，让他伤透了脑筋。

代理商派来了一个机械师。

他神情异常严肃地看着卡车，问比哈库：“你为什么要买贝德福德车？”

比哈库说：“我喜欢贝德福德车。”

机械师扯开嗓门吼道：“干吗不买罗斯罗尔斯？那种车的发动机是拆不下来的。”

点火器报废了，从此比哈库只好改用摇把发动车了。

海特说：“真他妈丢人！崭新的一辆卡车，底盘上的粉笔标记还没掉，就像旧福特汽艇一样，要人撅着屁股摇。”

可是，比哈库太太大言不惭地说：“用摇把一摇就能发动。”

一个星期六的清晨，正逢赶集的日子，比哈库太太哭喊着跑来找我妈，她说：“他住院啦！”

比哈库太太说：“他在市场外面摇发动机，车发动起来了，可摇把向回一倒，把他打到另一辆卡车上去了。”

比哈库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星期。

自从他买来卡车后，他一直记恨着他老婆，经常用那板球棒揍她，她也用舌头进行反击。以我看在这类吵架中，比哈库始终处于劣势。

把那卡车弄回家可是桩十分艰难的事，比哈库太太认真而兴奋地指挥着她丈夫。

那天，她说，“好，老头子，退……退，向右打一点儿，好喽，很好，噢，天哪，停，停，老头子！刹车！你要把围墙撞倒啦。”

比哈库顿时火冒三丈，他疯狂地向后倒车，撞倒水泥围墙，然后向前开一段，接着又倒车，不顾比哈库太太的尖叫，疾促地朝围墙残存部分撞去。

他发作之后，她老婆站在院子里哇哇大哭，他却回到自己的小屋里，脱下长裤往床上一躺，念起《罗摩衍那》。

那辆卡车除了没挣到一分钱之外，别的什么麻烦都给招来了。为此，他不得不雇上两个装卸工。他找来两个刚来西班牙港的身材高大的格林纳达岛黑人。他们叫比哈库“老板”，叫比哈库太

太“夫人”，这倒蛮有意思的，可当我看到他们衣衫褴褛，四仰八叉美滋滋地躺在卡车上的样子，不由得想，他们是否清楚自己身处险境，是否明白别人为他们有多担惊受怕。

如今比哈库太太张口闭口全是关于这两人。

她常常沮丧地对我妈说：“后天我们又要给装卸工付工钱啦。”两天过后，她的脸色就像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似的，说：“今天我们给装卸工付工钱啦。”没过几天，她又忧伤地跑来找我妈，说：“后天我们又要给装卸工付工钱啦。”

“给装卸工付工钱。”几个月来我听到的老是这么一句话。这话在街上传开了，结果成了大伙的一句口头禅。

每到星期六，博伊会叫埃罗尔，“走哇，咱们上电影院去看一点半的电影。”

埃罗尔便会翻出自己口袋，说：“我去不了啦，伙计，钱都付给装卸工啦。”

海特说：“比哈库好像就是为了给装卸工付工钱才买这辆车的。”

那辆卡车终于不见了，装卸工也随之不见了，不知道他们以后的命运如何。别人的卡车刚刚开始赚钱时，比哈库太太却把卡车卖掉了。他们又买来一辆出租汽车，如今竞争是那么激烈，出租车跑八英里才挣一毛二分钱，刚够买汽油的钱。

比哈库太太对我妈说：“开出租车不赚钱。”

可是，她又买来一辆出租车，包租给一个司机开。她说：“两个总比一个好。”

比哈库念《罗摩衍那》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连街上的人都感到厌烦。

海特说：“听听这两个家伙，她那破锣嗓子像老叫驴，他整天

哼哼唧唧唱那该死的印度哭丧调。”

通常人们会看到这般情景：粗短矮胖的比哈库太太站在院子里的水管旁，对她丈夫尖声叫喊着。比哈库却趴在床上，悲哀地吟诵着《罗摩衍那》经文。忽然，他猛地跳起身来，抄起放在墙角的板球棒，冲到院子里，用那棒揍起老婆来。

随后便会出现几分钟的安宁。

当比哈库再次拿起《罗摩衍那》，又会听到他那低沉的嗓门。

别以为比哈库太太会因此而不崇拜她丈夫。只要听听比哈库太太和墨尔根太太的争吵，就会知道，比哈库仍是他老婆的上帝和主人。

墨尔根太太说：“我听到昨晚你丈夫在说梦话，嗓门可真够大。”

“他不是说梦话，”比哈库太太说，“他是在吟诵。”

“吟诵？呸，呸！你知道吗，比哈库太太？”

“什么事，墨尔根太太？”

“你丈夫要是为你们的晚餐祷告吟诵的话，那你们非饿死不可。”

“告诉你，他比这街上的任何一个白痴知道得都多，他能读能写，你知道吗？英文和印度语，你们这帮蠢货，怎么能知道《罗摩衍那》是本圣书。要是你们能知道他吟诵是多么好的事情，也就不会这样胡言乱语了，知道吗！”

“你丈夫今早怎样？又在修什么新车了吧？”

“我才不想和你在这儿说话弄脏我的嘴。你听着！他知道该怎么修他的车，鬼知道你丈夫如今在哪儿捣鼓他所谓的焰火。”

每月比哈库太太总要出来吹嘘两三次比哈库是如何吟诵《罗摩衍那》，“他能够背出书中的一些章节。”她说。

这也算是对挣不到钱的一种安慰吧。他们雇来开另一辆出租车的司机一直在耍滑头。她说：“他真会敲我竹杠。他说出租车根本挣不了多少钱，现在我倒欠他钱啦。”她解雇了司机，把车卖掉了。

她的经济头脑时常显露出来。她先是养鸡，却没有成功，还让人偷去不少鸡，剩下的叫街上的狗给咬死了，比哈库十分厌恶那股气味。她还卖过香蕉和橘子，可这活除了给他们带点乐意干的运输之类的营生外，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我妈说：“比哈库干吗不出去找点活干？”

比哈库太太说：“你希望他咋样？”

我妈说：“我倒不希望咋样，我这是替你着想。”

比哈库太太说：“你能眼看着他 and 西班牙港这帮粗俗野蛮人在一起干活？”

我妈说：“那他总得做点事啊，人们可不会因为他钻在车底下哼哼《罗摩衍那》就给他钱的。”

比哈库忧郁地点点头。

我妈说：“唉，瞧瞧我这是说了些什么哟！你能肯定比哈库懂《罗摩衍那》？”

“我肯定，肯定。”

我妈说：“嘿，那就好办喽。他是个婆罗门，又懂《罗摩衍那》，而且还有辆车，他可以当个传教士，名副其实的传教士。”

比哈库太太猛击一下手掌，“太棒啦！如今印度传教士可不少挣钱。”

于是，比哈库成了传教士。

他照旧常摆弄自己的汽车，他不能用板球棒揍他老婆，却快活多了。

我时常想像着传教士比哈库身上缠着一块印度围腰布，钻在车下，捣鼓着曲轴，一群贫穷的印度人站在一旁，等待着他去拯救他们的灵魂。

慎 重

——一九四七年之前，博勒还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了。——直到那时，他还常说：“那是宣传，是专门欺骗黑人的谎话。”

——一九四七年，美国兵开始拆除乔治五世公园里的兵营，不少人感到伤心。

一个星期天，我跑去找博勒。他一面给我剪着头发，一面对我说：“听说战争结束啦。”

我说：“我也听说了，可就是还有不少事没搞明白。”

博勒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些人搞宣传是很在行的。不过这次我是这样看的，要是他们还要打仗就不会拆掉那些兵营啦。”

“可是他们把兵营拆啦。”我说。

博勒说：“是的，二加二等于几？告诉我等于几？”

我说：“四。”

他心事重重地给我剪着头发，半天没说话。

他说：“嗯，我很高兴战争结束了。”

我把理发费交给他时，问道：“那你认为我们现在该干什么，博勒先生？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该庆贺一下？”

他说：“别着急，伙计，不要催我，这可是件大事，得好好想想。”

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我现在还记得当战争结束的消息传到西班牙港的那天晚上，人们欣喜若狂，街上挤满了狂欢的游行队伍。一首新编出的克利普索小调不脛而走，人们都随着它的节奏狂舞着：

白日夜夜散步在河边，
玛丽安娜小姐和她的男朋友。

博勒盯着狂欢的人群，说：“愚蠢啊，愚蠢！黑人怎么这么愚蠢？！”

我说：“难道你没听说吗，博勒先生？战争结束啦。”

他吐了口唾沫说：“你怎么知道？你参加打仗了吗？”

“收音机里广播了，我在报纸上也看到了。”

博勒先生冷笑了起来。他说：“到底还是孩子。这么说，你都长成大人了，可是还相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

我经常听到这类话。博勒活了六十岁，他似乎只发现了一条真理，即：“决不能相信报纸上讲的事。”

这就是他的全部人生哲学，但这并没有使他快活起来。他是米格尔街上最悲观的人。

我看他生来就是个悲观主义者。十一年来，我每周至少看见他一次，可是除了冷笑外，我从没见过他的笑模样。他个头高高的，也不算太瘦，脸上一副苦相，嘴角朝下弯着，八字眉下挂着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

当他不再给人们理发后，居然还能维持生活，真让我惊讶。我想他大概是个汗过册的搬运工。他那辆手推车是我见过的最小的手推车。

那不过是两个轮子上放着一只小木箱，他独自一人推着它，

摇晃着高大的身躯，一副满不在乎、无所谓的样子，叫人觉着他还不如下跪不推车的好。他只在车上装两三袋面粉或糖。

每逢星期天，博勒便给人们理发，如果说他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那就是他会理发。

博勒经常问我：“你知道塞缪尔吧？”

塞缪尔是我们这一带最出色的理发师。他很有钱，每年都能出去度假一个星期。而且他也很乐意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我说：“知道哇，我认识塞缪尔。可我一点也不喜欢让他碰我的头发，他根本不会理发，只会在头上抓来抓去地瞎搞一气。”

博勒说：“你知道是谁教会他理发的吗？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

“是我，是我教会塞缪尔理发的。刚开始学理发时，他连自己的胡子还刮不干净呢。他跑来哭哭啼啼地央求我，‘博勒先生，教我理发的手艺吧，我求求您啦。’就这么着，我开始教他啦，瞧瞧现在怎么着了。塞缪尔发起来了，钱越来越多。可我仍住在那间又破又烂的小房子里。塞缪尔有了间体面的理发厅，可我却还得在露天，在这棵芒果树下理发。”

我说：“在外边挺好，比坐在又闷又热的房子里强多啦，可是，博勒先生，你为什么不天天给人理发呢？”

“噢，孩子，这可是个大问题，事实上，我现在对自己也没把握了。”

“没有的事儿，你理发的手艺好极了，比塞缪尔强得多。”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孩子，假如有一个人坐在你面前的椅子上，你偏偏不喜欢那家伙，而你手里又捏着一把剃刀，这种情况下什么古怪的事都可能发生。现在我只在喜欢他们的时候才给他们理发。我可不会随便给谁都理发的。”

尽管到了一九四五年，博勒还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了，但在
一九三九年，他可是个典型的好大惊小怪的人。当时他订了西班牙
港仅有的三份报纸：《特立尼达卫报》、《西班牙港新闻报》和《晚
报》。战争爆发后，《晚报》开始出号外，博勒也买了不少。

那时候，博勒常说：“现在不少人自以为可以愚弄别人。他们
以为咱们穷，因此就无知。可我就偏不信这个邪，你听好了，我每
天都按时坐下来读报纸，天天谈。”

尤其是对读《特立尼达卫报》，博勒格外感兴趣。有段时间，他
每天都要买回二十多份《特立尼达卫报》。

当时《卫报》在搞一种获奖游戏。他们在报纸上印出一张足球
赛示意图，标出比赛中的球场情形，可是不标出球的位置。你要想
赢一大笔钱，只需找出球的准确位置，然后在那儿画上一个“×”。

标出那个被抹掉的球的位置成了博勒的一大嗜好。

起初，每个星期博勒都要兴致勃勃地给《卫报》寄出一张划有
“×”的报纸。

这是我们一周中的一件大事。

海特常说：“博勒，我敢打赌，等你赢到钱就会把我们大伙全
忘了。你会离开米格尔街，伙计，到圣克莱尔大街上买栋大房子，
是吧？”

博勒说：“不，我不打算再呆在特立尼达了，我想去、去美国。”

博勒开始标两份“×”了。以后又增加到三份、四份、六份。他
没有赢到一分钱。他变得越来越暴躁，经常发脾气。

他总是说：“你听着，这不过是场恶作剧。那帮办报纸的家伙
蓄谋已久了，他们想自己拿到这笔奖金。他们只想把黑人们的钱
全部骗到手。”

海特说：“你可不能泄气。你只要再认真试一次准行。”

博勒买回一叠报纸，在报上那张抹去了球的图片上，所有连接线的相交叉处，都画上一个“×”。为了完成这件事，他不得不每周买回大约一百份甚至一百五十份《卫报》。

有时，博勒把博伊、埃罗尔和我找去，说：“孩子们，你们说那只抹去的球在哪儿？来，我想让你们闭上眼睛，用这支钢笔标出它的位置。”

过了一些时候，他又来找我们，问：“你们这星期梦到过什么没有？”

如果对他说什么也没有梦到，他会非常失望。我总是编出一些梦告诉他。博勒会花好长时间来圆梦，竭力想像出它与那只被抹掉的足球的关系。

人们开始叫博勒“被抹掉的球”。

海特常说：“瞧那丢了球的家伙。”

一天，博勒走进《卫报》编辑部，在警察赶到之前，把一个助理编辑痛揍了一顿。

博勒在法庭上说：“你们听着，那球压根就没丢，因为它从来就不在那儿。”

博勒被罚了二十五块钱。

《西班牙港新闻报》登出一则新闻：

被抹掉的足球案件

行凶者受罚

为了找到那球的位置，博勒一共花了大约三百块钱，结果连个安慰奖也没拿到。

我记不起博勒为什么不读《晚报》了，可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读《新闻报》

战争期间，西班牙港住房严重紧缺。一九四二年，来了一位声称要救济无房户的慈善家，他说他在筹划一个建房互助规划。愿参加这项规划的人，须先支付二百元左右的钱作为基金。第二年他们就会几乎不花一分钱，得到一栋崭新的住宅。一些显赫的大人物表示支持这个计划，还多次举办宴会，声援这个项目。

项目的广告宣传十分轰动，据传已经盖好了五六栋住宅楼，并已分配给一些参加过宴会的人了。报纸上刊登出许多人们拿着钥匙打开门、迁入新居的照片。

博勒是在《西班牙港新闻报》上看到那些照片和广告的，他也交出了二百块钱。

一九四三年，建房互助委员会的经理失踪了，自然，那两三千栋梦想中的住宅也随之变成了泡影。

博勒再也不读《西班牙港新闻报》了。

那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天，博勒对我们这帮坐在芒果树下等着让他理发的人们，发表了他的声明。

他说：“我现在声明一件事，请上帝为我作证，如果我违背了诺言，让我两眼都瞎掉。听着，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读报了。哪怕我学会了中文，也决不去看中国人的报纸，听见了吧！决不能相信报纸说的话。”

当时博勒正在给海特理发，海特忽地站起身来，慌里慌张地走了。

后来，海特说：“你们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我想咱们再也不能找博勒理发了。那家伙可真把我吓着了，知道吧。”

其实，我们无须认真考虑海特的这个决定，因为几天后，博勒

来找我们，说：“一个一个地拜访你们大伙，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他显得那么难过，我想，也许他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海特问：“你打算干什么去？”

博勒说：“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岛，这儿到处都是该遭诅咒的骗子。”

埃多斯问：“博勒，你打算把那辆小手推车也带走吗？”

博勒说：“不，怎么，你喜欢它吗？”

埃多斯说：“我只是想到而已。那东西看上去是挺不错的。”

“车就归你啦，埃多斯。”博勒说。

海特问：“你想去哪儿？”

博勒说：“以后就知道啦。”

当天晚上，他离开了我们。

“你们说，博勒是不是疯了？”埃多斯问道。

海特说：“没疯。他要去委内瑞拉，所以才这么神秘，委内瑞拉的警察可不喜欢从特立尼达跑过去的人。”

埃多斯说：“博勒可是个好人，他走了真叫人难受，知道吧。不少人惦记着他留下的那辆小手推车呢。”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博勒的小房子里，把他留下的所有东西统统拿走了。其实也没啥值钱的，一小块油布，三把旧梳子，一把砍刀和一条长凳。我们都很难过。

海特说：“这个国家的人对待博勒的确不怎么样，我一点也不责怪他离开这儿。”

埃多斯很实际地审视着这间房子，他说：“但是，他把所有的东西全带走了，伙计。”

第二天下午，埃多斯宣布：“你们知道那辆小手推车卖了多少

钱？两块钱！”

海特说：“我说你这事做得也太急了点儿，埃多斯。”

随后，我们看到博勒本人走在米格尔街上。

海特说：“埃多斯，活该你倒霉。”

埃多斯说：“可那是他自个儿给我的，又不是我偷来的。”

博勒看上去更加疲惫不堪，更加凄惨。

海特说：“出了什么事，博勒？你创了纪录了，伙计，该不是去委内瑞拉逛了一圈，又跑回来的吧。”

博勒说：“该死的特立尼达人！该死的特立尼达人！我真不明白希特勒为什么不到这里来扔炸弹，把这岛上的龟儿子全炸死。他炸错了人，你们知道吗？”

海特说：“坐下，博勒，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博勒说：“现在不是时候。我有事得先办一下。埃多斯，我的手推车呢？”

海特笑了起来。

博勒说：“笑什么，我看没什么好笑的。手推车在哪儿？埃多斯？你以为你能做出那么好的玩艺儿吗？”

埃多斯说：“你的手推车，博勒？可你已经送给我啦。”

博勒说：“现在请你再还给我。”

埃多斯说：“我把它卖了，博勒。瞧，就卖了这两块钱。”

博勒说：“你小子也太麻利了。”

埃多斯站起身来。

博勒说：“埃多斯，有一件事，我求你以后千万不要做。听着，我请求你，再也别找我理发了，我信不过自己的手。去把手推车给我买回来。”

埃多斯咕嘟着走了，“这个世界也真怪，竟然有人把一辆小手

推车看得那么重要，能和我那辆蓝色大卡车比吗？”

博勒说：“那个拿了我的钱，答应送我去委内瑞拉的坏小子，等我抓到他非给他点颜色看。你们知道那家伙干了些什么？他开摩托艇拉着我们转了一夜，最后把我们撂在一片沼泽地上，说是到了委内瑞拉。我碰见一伙人，就用西班牙语对他们讲话，结果他们个个摇头，捧着肚子大笑起来。你们说是怎么回事？他根本没把我送出特立尼达，离拉布瑞只有三四英里。”

海特说：“博勒，你还不知道你有多运气呢。这种人会把你杀了，然后扔下车去，伙计。他们犯不着去招惹委内瑞拉的警察，要知道，逃往委内瑞拉是违法的。”

打那以后，我们很少见到博勒。埃多斯设法把那辆手推车弄了回来，叫我给博勒送回去。

埃多斯说：“怪不得黑人们老也过不上好日子，那天你也在场，是他亲手把车送给我的，可是现在他又要回去。给他推回去，告诉他埃多斯说的，‘让他见鬼去吧！’”

我对博勒说：“埃多斯说他很抱歉，让我把车给你送回来了。”

博勒说：“你瞧，黑人们都是这样，拿别人的东西挺麻利，往外拿倒成了铁公鸡，怪不得黑人过不上好日子呢。”

我说：“博勒先生，我也拿了些东西，不过已经送回来了。就是那块油布。我拿回去给我妈，她又叫我送回来了。”

博勒说：“没什么。唉，孩子，这些天是谁给你理的发呀？瞧，这头发乱得像鸡窝。”

“是塞缪尔给我理的，博勒先生。我早就跟你说过，他根本就不会理发。瞧，他给我理成什么样啦。”

博勒说：“星期天来吧，我给你理。”

我犹豫了一下。

博勒说：“怎么，害怕了？傻孩子，我喜欢你。”

星期天我去了。

博勒说：“你的功课好吗？”

我不喜欢自吹自擂，如实回答了。

博勒说：“我有件事想叫你办，可又拿不准该不该找你。”

我说：“让我办吧，博勒先生，什么事我都愿替你干。”

他说：“别，别急，等下次你来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一个月后，我又去了。博勒问我，“你能读报纸吗？”

我再次向他保证说没问题。

他说：“我做的这事可是件秘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你能保守秘密吗？”

我说：“能，我能保守秘密。”

“像我这么一个老头子活着已经没有什么盼头啦，”博勒说，“一个老头子孤零零地活在世上总该有个盼头才好，所以我才干这事。”

“什么事呀，博勒先生？”

他停止了给我理发，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印有铅字的纸条。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说：“是张抽彩的彩票。”

“不错，你真聪明，伙计。的确是张彩票。”

我问：“那你让我做些啥，博勒先生？”

“你得先起誓永远不告诉任何人。”

我起了誓。

他说：“我想让你看看我的号码是不是中了彩。”

六个星期后，开奖了。我去替博勒看号码，我告诉博勒说：

“你的号码没中彩，博勒先生。”

他问道：“连二等奖也没中吗？”

我摇摇头。

可是博勒看上去并不失望。“果不出我所料。”他说。

差不多有三年多的光景，这事一直是我们的秘密。那几年中，博勒一直在买彩票，却一次也没赢过。别人谁都不知道。甚至连海特他们对他说：“博勒，我知道有件事你该去碰碰运气，干吗不去买几张彩票试试？”博勒也只是说：“我早就不干这种事了，伙计。”

一九四八年圣诞节前后，博勒的号码中奖了。钱倒不多，只有三百来块钱。

我跑到博勒的屋里，喊道：“博勒先生，你的号码中奖啦。”

博勒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说：“喂，小子，你敢跟我叫板。你可别把我惹火了，当心我揍扁你。”

“真的中奖啦，博勒先生。”

“你他妈的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从报纸上看到的。”

这下可真把博勒惹火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咆哮着，“还要我怎么对你讲？你这个小笨蛋，狗杂种，决不能相信报纸上的一切！”

我只好与特立尼达赛马俱乐部核对了一次。

我对博勒说：“是真的。”他还是不相信。

他说：“这帮特立尼达人就会骗人，撒谎。他们就知道骗人，他们骗得了你，可骗不过我。”

我跑去告诉街上的人，“博勒真的疯啦，他赢了几百块钱可就是不相信。”

一天，博伊对博勒说：“嘿，博勒你到底还是中奖了。”

博勒追上博伊冲他吼道：“你少来这套，竟敢取笑一个可以做你爷爷的老人。”

然后，博勒转身盯着我，说：“你就是这么保守秘密的？这么个保守法？你们这帮特立尼达人就是这种人吗？”

他把他的手推车推到埃多斯门前，喊道：“埃多斯，你不是想要这辆车吗？来吧，把车拿去！”

随后，他抄起砍刀把车劈成碎片。

他又对我喊道：“他们以为骗得了我。”然后他掏出彩票，撕得粉碎，冲到我跟前，把碎纸片塞进我的衬衣口袋里。

后来，他独自一人住在那间小屋子里，难得出来上街，和谁都不说话。他每月只出来一次，去领取他的养老金。

直到大兵来临

爱德华，海特的兄弟，是个叫人捉摸不透的家伙。我始终认为他有意与我们疏远是件可悲的事。他过去一直帮着海特喂奶牛。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和海特一样安于现状，乐呵呵的。他说他再也不去搞女人啦，打算把精力集中在板球、足球、拳击、赛马和斗鸡上。那样，他就再也不会会有烦恼，也不会有什么令他苦恼的奢望了。

像海特一样，爱德华极其崇拜美丽的东西，可他并不像海特那样热衷收集各种漂亮的羽毛，爱德华喜欢绘画。

他最喜欢的图案是一只棕褐色的手握着一只黑色的手。他画的那只棕色的手就像一只活生生的棕色大手。他还画湛蓝的大海，翠绿的山峦，光线和阴影处也处理得很好。

爱德华亲手把自己的画用红纸板镶嵌起来。爱德华的作品委托给像萨尔沃特里、福卡梯、约翰逊之类的大商店里代销。

可在街上，爱德华并不是个招人喜欢的人物。

他一见到墨尔根太太穿上一件新裙子，便说：“喂，墨尔根太太，你穿的这裙子真漂亮，不过我觉得还应该再画上点图案才好。”

或者当他看到埃多斯穿上一件新衬衣，便说：“喂，埃多斯，你小子穿上新衬衣喽，知道吧，你最好还是上面写上你的名字，要

不没准哪天就让别人给偷了去，告诉你吧，我会给你写上。”

他就这样糟蹋了不少衣服。

他还有爱把自己的领带送人的习惯，常听他说：“我送你点儿东西，拿去戴上吧，我是因为喜欢你才送你的。”

要是谁没扎上那领带，爱德华就会火冒三丈吼叫起来，“瞧瞧这帮黑人多么不知好歹。大家评评这理儿，我看这人没扎领带，就坐公共汽车到城里去，跑到约翰逊商店，找到男子用品部，从那姑娘那里买回一条领带才坐车回来。我回到家，拿出画笔，调好颜料，用笔蘸上颜料，往领带上画。我足足干了两三个钟点才画成，结果怎么着，这家伙却不扎我的领带！”

其实爱德华除了画画以外还干了不少事。

那天，我刚搬来街上没几个月，爱德华说：“昨晚乘公共汽车从考科瑞特回来时，一路上我光听到汽车压碎螃蟹的声音。你们听说过有椰子树和沼泽地的那个地方吗？那儿的螃蟹遍地爬，听说爬得椰子树上都是。”

海特说：“满月的时候就有不少螃蟹出来，今晚咱们去跑一趟，抓些螃蟹。”

爱德华说：“我也正要说这事，咱们把那帮小家伙儿也带去，那儿简直多极啦，他们也能捡不少。”

于是，我们这帮小哥们儿接到了邀请。

爱德华说：“海特，我在想，咱们要是带上把铁锹抓起螃蟹来就省劲多啦，那玩艺儿多极了，用铁锹铲就行了。”

海特说：“好吧，咱就把牛栏里的铲子带上。”

爱德华说：“那就妥啦，喂，你们都有结实一点儿的鞋吧？你最好找结实的鞋穿上，那些螃蟹可不是闹着玩，稍不留神，它们就把你们的大脚趾头夹掉了，你们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

海特说：“我带上打扫牛栏用的护腿套。”

爱德华说：“还有，你们最好带上手套，我认识一个家伙，那天去抓螃蟹，突然发现他的右手没了。再一细瞧，原来是让螃蟹夹掉了四个手指头，那家伙跳起来哇哇大哭。咱们可得留神点儿，你们这些小家伙没手套用布条把手缠起来就行啦，保证没事儿。”

于是当天夜里，我们搭上去考科瑞特的公共汽车，海特腿上绑着护腿套，爱德华也带上了护腿套。我们其他人带着弯刀和麻袋。

海特那把清扫牛栏用的铁锹散发出阵阵恶臭，熏得车上的人直捏鼻子。

海特说：“让他们也闻闻这味儿，他们爱喝的牛奶，就是这些牛身上挤出来的。”

人们看到护腿套、弯刀、铁锹和麻袋都很快地把目光移开，闭上嘴不说话了。售票员也不过来收钱。车上鸦雀无声，直到爱德华开口打破了沉静。

爱德华说：“咱们尽量别用弯刀，弄死的可没劲，争取抓活的装进口袋里。”

许多人都站在下一站下车了，车开到马库拉普路时车上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售票员也跑到前面和司机聊天去了。

车快到考科瑞特终点站时，爱德华说：“哎，天哪，我忘了件事，咱们可不能把这么多螃蟹搬上公共汽车呀，我得去打个电话叫辆卡车来。”

他在终点站的前面一站下了车。

我们在明亮的月光下走了不一会儿，便离开大路进入泥泞的沼泽地。海风阵阵袭来，到处都散发着海水的腥臭，椰子树下是一片阴影。我们又走了不远，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风也停了。

海特喊道：“小子们怎样啊？留神你们的脚丫子，我可不想让你们中的任何一人回家的时候只剩下三个脚趾头。”

博伊说：“可我连一只螃蟹也没见着。”

十分钟后，爱德华回到我们中间。

他问：“你们装了几麻袋啦？”

海特说：“好像有不少人都在打这主意，早把螃蟹统统抓光啦。”

爱德华说：“扯淡！你没看月亮给遮住了吗。咱们只好等月亮出来后再逮喽。坐下，小子们，咱们一块等吧。”

月亮在云彩后面呆了至少有半个多钟头。

博伊说：“太冷啦，我想回家，我看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螃蟹。”

埃罗尔说：“别去理博伊，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不过是害怕天黑，还怕螃蟹咬他。”

此刻，我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的马达声。

海特说：“像是卡车来了。”

爱德华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卡车，我向山姆公司要了一辆大卡车。”

我们默不作声地坐在地上等着月亮出来。突然，十几支电筒一下照在我们身上。一个人吼道：“别给我们找麻烦，谁要是敢耍滑头，就砸断谁的骨头。”

我们看到差不多有一个班的警察把我们团团围住。

博伊咧开嘴哭起来。

爱德华说：“到处都有人殴打他们的婆娘，到处都有人打劫，你们这些警察干吗不去做点有用的事？偏偏到这儿浪费时间，走开吧。”

一个警察说：“你哆嗦什么？你嘴巴痒痒了还是怎么着？”

另一个警察问：“麻袋里装的是什？”

爱德华说：“只有螃蟹，可要留神，都是些大螃蟹，当心会把你们手夹掉。”

没人过来打开麻袋看，一个臂章上画着若干道道的人说：“如今所有的人都学坏啦，都他妈的像美国佬一样油腔滑调。”

一个警察说：“他们有麻袋、弯刀，还带着铁锹和手套。”

海特说：“我们刚才在逮螃蟹。”

警察说：“扎着护腿套？老天爷什么时候发明出需要扎上护腿套逮螃蟹？”

我们花费了不少口舌才使警察相信了我们所说的话。

那个领头的警察说：“我非揍那个打电话报警的混蛋不可！他说你们正在策划谋杀。”

警察终于走了。

天已经太晚，我们没能赶上最后一班汽车。

海特说：“咱们还是等爱德华叫的大卡车吧。”

爱德华说：“我想那辆大卡车不会来了。”

海特一字一顿，似笑非笑地说：“爱德华，你是我的兄弟，可是，你知道吗，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爱德华一屁股坐在地上，仰天大笑起来。

后来战争爆发了，希特勒占领了法国，美国兵开进了特立尼达。至高无上的人侵者带来了那首风靡一时的克利普索小调：

我和我贤惠温柔的妻子生活在一起，
直到大兵来临抢走我的老婆。

特里尼达第一次人人都有工作，而且美国佬给的薪水蛮高。外来者们唱道：

遍地金钱！

杨基美元，哎！

父亲、母亲和女儿

一起为杨基美元工作！

爱德华不再去牛棚干活，到查格拉马斯的美国人那里找了个活儿。

海特说：“爱德华，我说这么干，你可真是个傻帽儿。美国佬不会永远呆在这儿。现在挣大钱，三四年后没饭吃，实在不划算。”

爱德华说：“这仗看样子还要正经打几年。美国人可不像英国人，他们是让你玩命干活，可也真舍得给钱。”

爱德华把属于自己的那些牛卖给了海特，这是他开始离开我们的前兆。

爱德华彻头彻尾地投靠了美国人。他的衣着越来越美国化，还学会嚼口香糖，就连说话也拼命撇美国腔。除了星期天，我们很少见到他，这使我们感到自卑。他开始注意衣着和服饰，他戴上项链，还学那些网球手，在手腕上缠些布条。这种时尚在当时西班牙港的时髦青年中风行一时。

爱德华并没有停止绘画，但不再送画给我们，我想多数人都不会为此感到欣慰。他参加了一些绘画展，结果连个安慰奖都没得到，他对特立尼达的怨恨更加强烈。

一个星期天，他说：“我真他妈的蠢，竟把自己双手画出来的

作品送给特立尼达人去品头论足。他们懂什么？哼，我要是个美国人就不一样喽。美国人才算是人，他们明事理。”

听爱德华那么说，人们会感觉到美国的确是个由伟人构成的超级大国，他们住在大房子里，开着天下最庞大的汽车。

爱德华常说：“瞧瞧，这米格尔街，你想，美国能有这么狭窄的街道吗？在美国，这至多算条便道。”

一天晚上，我和爱德华步行去码头，经过美国兵营，透过铁丝网可以看到露天电影院的巨大屏幕。

爱德华说：“你瞅瞅，在特立尼达这么个破烂的小地方，他们都盖这样的剧场。在美国还不知会盖成什么样。”

我们继续往前走了不远，遇到一个站在岗亭里的哨兵。

爱德华用他那地道的美国腔打招呼，“有事吗，乔？”

真令人惊奇，那个哨兵在钢盔下的目光凶狠地扫了他一眼，便与爱德华热烈地交谈起来。他俩一个比一个起劲地说着脏话。

我们回到米格尔街时，爱德华十分得意，对我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和美国人谈得多么投机。”

后来当他见到海特时，说：“那天晚上我和一个美国人，是个铁哥们儿，聊天，他告诉我只要美国一参战，战争就结束啦。”

埃罗尔说：“我们才不会打赢呢，只要让安东尼·艾典当总理，战争就很快结束啦。”

爱德华说：“闭嘴，毛孩子！”

爱德华最大的变化是开始谈论起女人。在此之前，他一直说他再也不会和女人来往了。他说，很久以前被女人伤透了心。他发誓再也不和女人往来。那是个谁也说不清的悲剧。

如今星期天，爱德华常说：“你们真该看看他们在基地里有什么样的妞儿，可不像特立尼达那帮傻妞儿，根本没法儿比。那些妞

儿有味道,上档次。”

我记得好像是埃多斯说了一句,“我看你不必为此担心,她们不会来纠缠你,那些妞儿要的是肥肥大大的美国佬,你很安全。”

爱德华骂埃多斯是虾米皮,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

爱德华开始练举重和跑步,他又开始追赶时髦。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时在特立尼达的年轻人全都迷上了健身运动,几乎每个月都有健身比赛。海特常常为了宽慰自己,说:“甭操心,这事儿长不了,你等着瞧。他们现在嚷嚷着练块儿,练肌肉,等他们停下来再看会怎么着?他们叫作肌肉的玩艺儿统统都要变成肥膘,知道吧。”

埃多斯说:“在菲利普街的牛奶站,你能看到最有趣的事是,柜台前排着长长的一队黑小子等着买牛奶喝。他们全都穿着无袖紧身运动衫,裸露着粗壮的手臂。”

大约过了三个月,爱德华也穿上了无袖紧身运动衫,在我们面前亮相了,他的确变成一个强壮的家伙。

现在,他开始谈论在基地那些追求他的女人。

他说:“不知道她们会怎么看我。”

人们打算组织当地一些艺术家天才进行演出,爱德华说:“别让我笑掉大牙了,也不想想特立尼达能有什么样的天才?”

首次演出通过电台转播了,我们全在埃多斯的房子里收听。爱德华一直在笑。

海特说:“那你为什么不试试去唱歌呢?”

爱德华说:“为谁唱?特立尼达人?”

海特说:“为他们做件好事嘛。”

出人意外的是爱德华真的开始唱歌了,直到一天海特终于忍

受不住，来到街上说：“我实在不能和爱德华住在一起啦，我想他还是搬出去好。”

爱德华搬家了，不过没搬远，仍住在我们米格尔街上。

他说：“是件好事，我厌恶牛的气味。”

爱德华参加了当地艺术家的一场演出。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得个什么奖。那场演出是由一家饼干公司主办的，我猜想获奖者会拿到些钱。

“他们给那些没有获奖的人每人发一包价值三毛一分钱的饼干。”海特说。

爱德华得到一包饼干。

他没拿回家，把它扔掉了。

他说：“扔啦，我凭什么不能扔掉？你听我说，特立尼达人根本不识好歹，他们天生愚蠢。在基地里，美国人请求我唱歌，他们知道什么是艺术。那天在基地干活唱歌时，上校过来告诉我，说我有副好嗓子，他请求我到美国去。”

海特说：“那你干吗不去呀？”

爱德华恼怒地说：“等着瞧吧，看我会不会去。”

埃多斯说：“那些追你的女人们怎么样？她们是否追上你了，还是把你越过去啦？”

爱德华说：“听着，小子，我可不想和你翻脸，做件好事，闭上你的嘴。”

每当爱德华带美国朋友到他家时，他总是装做不认识我们的样子。他和他们在一起时，像美国人似地抱着胳膊，松松垮垮的样子，实在叫人觉得好笑。

海特说：“他挣的钱全用来买朗姆酒和姜汁酒，全是为了讨好那些美国人。”

我想，也许是我们都在妒忌他。

海特开始说：“到美国人那儿找个活儿并不难，我只是不愿意多个老板而已。我喜欢自己当老板。”

如今，爱德华已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

一天，他哭丧着脸来找我们说，“海特，看来我必须结婚啦。”

他讲这话时带着特立尼达口音。

海特感到不安，他问：“为啥？为啥？干吗非要结婚不可？”

“她怀孕啦。”

“你可真他妈逗，把女人肚子搞大了就得结婚？真是活见鬼。你是怎么搞的，非要和其他所有的特立尼达人不一样？真成了美国人？”

爱德华提了提他那美式紧腿裤，做了个美国电影演员常用的表情，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吗？这姑娘不一样。的确不假，我以前也曾恋爱过一两回，可这姐儿真的就是不一样。”

海特问：“她同意吗？”

爱德华说：“是的。”

海特说：“爱德华，你是成年人。毫无疑问，你已经下决心与这姑娘结婚了，干吗还跑来找我，让我强迫你和她结婚？你是个成年人，你完全没有必要从我这里得到做这事或那事的许可。”

爱德华走后，海特说：“每次爱德华到我这里撒谎时就像个孩子。他骗不了我。尽管我没见过那姑娘，但我感到，如果他们结婚，他会后悔的。”

爱德华的老婆是个高个子，白皮肤的女人。她面色苍白，病歪歪的，似乎每走一步都十分吃力。爱德华对她的关心可称为无微

不至，却从没把她介绍给我们。

没过多久，街上的女人便开始对她评头论足。

墨尔根太太说：“那女人，是个扫帚星。我真替爱德华难过，他算是跳进火坑喽。”

比哈库太太说：“她可是个现代派，她们这种人需要丈夫在外工作一天，回到家还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她们就知道往脸上搽胭脂抹粉，走到大街上扭屁股。”

海特说：“她怎么能生孩子呢？我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爱德华完全脱离了我们这个圈子。

海特说：“她会带他下地狱的。”

一天，海特隔着马路喊爱德华，“乔，过来。”

爱德华冷冷地看着，用特立尼达语问道：“你想干什么？”

海特微笑着说：“那孩子怎么着啦？什么时候生呀？”

爱德华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海特说：“我就要当大伯了吗，难道还不能打听一下我侄子的事吗？”

爱德华说：“她不要孩子。”

埃多斯说：“那么说，她那时撒了谎。”

海特说：“爱德华，你撒谎了。全是你编造的故事。你知道她不要孩子，她并没告诉你她怀孕，你全知道。你想和这女人结婚，干吗要编这些故事？”

爱德华非常忧郁地说：“如果你们非要知道真相，那就实话对你说，我想她不能生孩子。”

这个消息在街上的女人中传开，她们的结论都和我妈说的一样。

她说：“你见过脸色潮红又苍白的人生孩子吗？”

爱德华的房子里依旧吵吵嚷嚷地挤满了美国人，尽管我们拿不出证据，但仍然感觉到爱德华和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不太妙。

一个星期五，天刚刚擦黑，爱德华跑来找我，说：“扔掉你看的破玩艺儿，快去喊警察来。”

我说：“警察？可我这样怎么能去找警察。”

爱德华问：“你会骑车吗？”

我说：“会。”

爱德华又问：“你有车灯吗？”

我说：“没有。”

爱德华说：“就骑这辆车子去，不要车灯啦，你赶快去找警察。”

我问：“我见到警察跟他说什么呀？”

爱德华说：“她又要自杀了。”

我还没骑到阿瑞厄皮塔大街便遇到警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官。他说：“你打算跑多远，啊？”

我说：“我就是来找您的。”

另外一个警察大笑起来。

警官对他说，“这小子够鬼的，是吧？我想地方法官会喜欢这个借口，这个借口我头回听说，也挺喜欢。”

我说：“快去呀，爱德华的老婆又要自杀啦。”

警官说：“哎，爱德华的老婆经常自杀吗？”说罢大笑起来，“那么，那个爱德华的老婆又要在哪里自杀呢？”

我说：“就在米格尔街街口。”

那个警察说：“这小子是他妈够鬼的。”

警官说：“没错儿，想让咱们放掉他，去找那个自杀的女人。别

让这胡说八道的小子溜掉。你的自行车执照呢？”

我说：“我说的全是真的。我和你们一块回去，找那间房子。”

爱德华正在等着我们，他说：“去这么半天就找来两个警察。”

警察跟爱德华进了房子，门外的人行道上聚了一些人。

比哈库太太说：“我早就猜到会出这事儿，我一开始就知道会这么结束。”

墨尔根太太说：“这可真有意思，我希望能像她一样不能生孩子。她可倒好，竟会为不能生孩子而自杀。”

埃多斯说：“你怎么知道她是为这事自杀的？”

墨尔根太太说：“那还能为什么？”

从那时起，我开始为爱德华难过，街上的男人和女人们从没给他机会。尽管爱德华在他家里举办了許多大型酒会，每当埃多斯喊道：“你为什么不带你老婆去美国，小子？那些美国医生灵得像魔鬼，知道吗，他们什么都能干成。”或是比哈库太太劝他带她去阿瑞厄皮塔大街上的加勒比医学委员会化验血液时，我能看出爱德华是动心了。

爱德华家里的酒会越来越疯狂，越来越奢侈。海特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倒霉的是爱德华一个人。”

酒会自然不会给爱德华的老婆带来欢乐。看上去，她还是那么虚弱和暴躁。现在，我们有时听到爱德华提高嗓门和她吵架，不是我们街上常见的那种男人与女人间的争吵。爱德华的声音听起来很恼怒，但实际又竭力取悦对方。

埃多斯说：“和我结婚的女人要是这样，伙计，我就狠狠地揍她一顿，非把她收拾得规规矩矩，像竹子一样直。”

海特说：“爱德华自讨苦吃，我看最蠢的事是他真的爱上那个女人啦。”

每当海特、埃多斯，或是其他大人和爱德华说话时，他都答话。可每当我们这帮孩子想和他说话时，他总是很不耐烦。他会威胁要揍我们，叫我们滚开。

可是，每逢爱德华经过时，博伊表现得比往常更勇敢，更愚蠢，故意撇着美国腔喊道：“干吗去，乔？”

爱德华便会停下来，怒视着博伊，然后喊叫着朝博伊冲过来，他骂道：“看看你们这帮特立尼达的坏小子干了些什么？你要找死啊。”

一天，爱德华抓住了博伊，便开始抽打他。

每抽打一下，博伊就喊叫道：“别打了，爱德华。”

爱德华越打越疯狂。

海特跑过来，喊道：“爱德华，马上把孩子给我放下，要不街上就会出大麻烦了。快把他放下，告诉你，我可不怕你那粗胳膊。”

街上的人把他们拉开了。

博伊挣脱后，冲爱德华喊道：“你干吗不生个孩子，揍你自己的孩子去。”

海特吼道：“博伊，你再说我就抽你的筋。埃罗尔，去给我找条结实的鞭子来。”

还是爱德华自己透露出那个消息。

他说：“她离开了我。”他用一种极为漫不经心口气说出来。

埃多斯说：“我很难过，爱德华。”

海特说：“爱德华，伙计，不该是你的留也留不住。”

爱德华似乎毫不在意。

埃多斯接着说：“一开始，我就不喜欢她。我觉得一个男人哪能和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结婚？”

爱德华说：“埃多斯，闭上你那张鸟嘴，还有你，海特，少来这套假惺惺的怜悯。我明白你们是怎么难过的，你们为什么笑。”

海特说：“谁在笑？哼，爱德华，你听着，去找别人发威风去吧，我可不吃你这套。其实，一个男人的老婆跑了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像克利普索小调唱的那样：

我曾和我那贤惠温柔的妻子生活在一起，
直到大兵来临抢走我的老婆。

这不是你的过错，是美国人的错。”

埃多斯说：“你知道她跟谁跑了？”

爱德华说：“你听我说过她跟谁跑了？”

埃多斯说：“没，你没说过，只是我的感觉。”

爱德华悲伤地说：“是的，她是跟一个美国兵跑了。我给那家伙喝过不少朗姆酒。”

几天后，爱德华跑来跑去地对人说这件事，他说：“他妈的一件好事，我可不要个不能生孩子老婆。”

现在再也没有人取笑爱德华的美国腔调啦，我想我们已经准备好欢迎他重新加入我们的行列。但他却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们很少见到他，如果不工作时，他就出去旅行。

海特说：“都是因为爱，他真的爱上她了，他是出去找她。”

有一个老婆叫美国佬拐跑、唱克利普索小调的家伙找到自己的女人，央告她回家时，她说：“伙计，我已经改变了主意，我将和我的杨基大兵生活在一起。”

爱德华的命运正是如此。

他气急败坏地回来，非常沮丧，他说：“我要离开特立尼达。”

埃多斯问：“你去哪儿，美国吗？”

爱德华差点儿揍埃多斯。

海特说：“你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毁掉你整个生活？你这么干就像你是头一个碰上这事的人似的。”

爱德华没听进去。

月底，爱德华卖掉房子，离开了特立尼达。我想他是去了阿鲁巴岛或是库拉索岛，在荷兰一家大石油公司打工。

几个月后，海特说：“你们猜我听到了什么？爱德华的老婆给那个美国大兵生了个孩子。”

海 特

海特乐意为任何一件小事营造神秘气氛。就拿他与博伊和埃罗尔的关系来说，他告诉生人说他俩是他的私生子。有时又说他也吃不准这两个孩子是不是他的，于是便杜撰出他和爱德华与某个女人同居的怪诞故事。有时，他又会声称他俩是他与已故妻子的儿子。每当他绘声绘色地描述孩子的母亲临终前，把他们招至床前殷殷嘱托，并让他们作出保证的情景时，总能达到一种催人泪下的效果。

正经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博伊和埃罗尔是海特的亲外甥。他们的母亲曾住在格兰德桑格瑞附近的乡下，在其丈夫死后不久也死了，孩子们便过来跟海特一起生活。

孩子们对海特一点儿都不尊重，从不喊他舅舅，而是直呼其名——海特。他们毫不在乎海特说他们是私生子。事实上，对于海特杜撰的任何有关他们身世的故事，他们都愿意承认。

起初，我以为海特只带我一人去体育场看棒球，后来才知道除我之外，海特还带去附近四五条街上的十一个孩子。

我们在售票处排成一行，海特大声数完人头，喊道，“一张整票，十二张半票。”

许多人停下来，观看着。

售票员问：“十二张半票？”

海特低头看着自己的鞋，答道：“十二张半票。”

我们在海特的率领下，兴高采烈地拥进体育场，找坐的地方。

有人喊道：“他们都是你的吗？”

海特微微一笑，令人感到更像是那么回事儿。

我们都坐下之后，他又指点着，大声地数了遍人头。他说：“我可不想回家时少一个，让你妈要死要活的。”

那天是特立尼达队与牙买加队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比赛。杰瑞·戈迈兹和伦·哈宾给特立尼达出力不小。当戈迈兹的积分达150分时，海特兴奋得手舞足蹈地跳上跳下，喊叫起来，“知道吗，白人是上帝！”

一个卖软饮料的女人从我们前面经过。

海特问：“你是怎么卖的，用杯子盛吗？”

那女人答道：“六分钱一杯。”

海特说：“我要十三杯，给个价儿吧。”

那女人问：“这些孩子都是你的？”

海特说：“那有什么不合适吗？”

那女人五分一杯卖给了我们。

伦·哈宾的积分达89分时，因犯规被罚下场，特立尼达队宣布不再继续击球。

海特激怒了，“犯规？什么犯规？他怎么犯规？岂有此理！特立尼达的裁判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天哪，现在连裁判也接受贿赂了！”

那天下午我从海特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从他如何称呼那些板球手的语音语调中，我领略到他们的姓名是那么悦耳动听。他观看板球赛的兴奋感染了我们。

我请教他如何看记分板。

他说，“左侧是已完成击球的击球员名单。”

我之所以仍能记住这事，是因为觉得这种表示某击球员已完成击球的方式挺不错。

整个休息期间，海特依旧很亢奋。他极力拉人参与各种愚蠢的赌博。他挥舞着一张一美元的钞票，跑来跑去地喊叫着：“一美元对一先令！”

当裁判出场时，一个男孩儿哭起来。

海特问：“你为什么哭？”

那男孩儿边哭边咕哝了一句。

海特：“说，干吗要哭？”

一个男孩儿说：“他想要个瓶子。”

海特转身对那人说：“两美元赌牙买加下午输。”

那人说：“我倒没问题，这么急就怕你要破财喽。”

另外一个人下了赌注。

那男孩儿还在哭。

海特说：“你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快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男孩儿只是哭，另外一个男孩儿悄悄对海特嘀咕一通。

海特说：“唉，天哪！赶快出去。”

他让我们全站起来，带我们走出体育场，在白铁围栏前站成一排。

他说：“好啦，撒尿！快点儿，统统给我撒！”

下午的比赛仍很激烈。海特不停地收着赌注。我发现了海特一大弱点，就是压抑不住参与一些显然难以取胜的赌博的冲动。尤其是赛马，他输了很多钱，有时也能赢，那他就会尽其所有请客

款待我们米格尔街上的这帮人。

我从未见过像海特那么热爱生活的人。其实，他所做的事既不新奇又不壮观，事实上，他每天在做同样的事，但他始终很投入地做事。他不时地给一些极其平常的事添加上神奇的色彩。

他有点像他的狗，那是我所见过的最驯服的一条大狼狗。我发现米格尔街上有件怪事是狗像主人。乔治自然有条粗陋的杂种狗；托尼养了条凶猛的恶犬；据我所知，海特的大狼狗还有点幽默感。

首先作为一只狼狗，它的确有些古怪。如果你扔出一件东西让它叼回来，会使它感到万分幸福。一天，在萨凡纳，我把一个番石榴扔进丛林深处，它没能找到番石榴，抱怨地哀鸣着，突然掉头狂吠着向回跑去。我转身看是怎么回事，只见它一头扎进丛林，我未发现异常。当我再次回头张望时，看到它在树丛后面叼着另一个番石榴。

我喊它，它跑过来，吠叫着。

我说：“去！小子，把番石榴拿来。”

它跑回丛林，装模作样地拨动嗅闻一会儿，然后猛扑进树丛，把它预先搁置在那儿的番石榴叼了回来。

我倒是希望海特饲养的那些美丽的鸟也能像那狼狗一样听话。那些鹈和鸚鵡看上去很像一群恼怒且好斗的老娘们儿，任何人都是它们攻击的目标。它们的存在使海特的房子变成了一个危险地域。有时你正在静静地与人交谈，突然感到小腿被啄或抓了一下。海特试图让人相信那些鸟从不攻击他，但我知道它们也没放过他。

真是怪事，只要一涉及追求美的东西，海特和爱德华都会变成危险人物。爱德华的武器是画笔；海特的武器则是他那拥有尖

利嘴巴的大鸚鵡。

海特常与警察发生些小摩擦,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在这里斗鸡,在那里赌博,或在某地喝醉了等等。

查尔斯警官常说:“我只能这样生活,你知道吗,海特。没人告诉我,但我很清楚,我再也不会晋升了,就这样啦。”

海特会说:“那没啥,警官。我们没一人在乎这事儿。近来你的孩子们怎样?伊里杰好吗?”

伊里杰是个聪明孩子。

“伊里杰,嘿,我想今年他能拿到奖学金。我们也只能得到这些了,是吧,海特?我们只是尽力而已,我们也只能如此。”

他们每次都能很友好地分手。

不过有一次,海特因往牛奶里掺水,遇到了大麻烦。

他说:“警察和那帮人来问我是怎么把水掺进牛奶的,好像我知道似的,我哪知道水是怎么进去。你知道为防止牛奶变质,我把牛奶盆放到水里冷却,我想也许是那个盆上有个洞,就这么回事儿。有个很小的洞。”

爱德华说:“最好是向地方法官说实话。”

海特说:“爱德华,你讲起话来好像不是在特立尼达而是在英格兰。你听说过,在特立尼达讲实话的人被放过吗?在特立尼达,你越清白,他们越要送你进监狱。只要肯花钱行贿,有事也能过去。你要贿赂地方法官,该送家禽、老母鸡,还要给钱,还得贿赂检察官。如果你都贿赂到位了,就可以免除牢狱之苦,或是判很轻的罪。”

爱德华说:“这倒没错,可你想不认罪的话,还得再编些新的理由才行。”

海特被罚了二百美元,地方法官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通。

他从法庭怒气冲冲地回来，撕扯下领带，甩掉外衣，说：“真他妈见鬼，洗澡，换上干净衬衣，扎上领带，穿上西服，擦亮皮鞋，为什么？就是为了站到那个愚蠢的地方法官面前，听他吼叫。”

他难过了若干天。

海特说：“希特勒是对的，伙计，烧掉所有的法律书，统统烧掉。把那些该死的东西堆到一起全部烧毁。希特勒干得没错，伙计，我不明白咱们干吗要和他打仗。”埃多斯说：“你讲的废话太多啦，知道吗，海特？”

海特说：“我不想谈这事，不谈这事。希特勒就是对的，把法律书烧掉，统统烧光！我不打算谈这事。”

有三个月的光景，海特没跟查尔斯警官说话。查尔斯警官感到难过，不断地托人带话，问候海特。

一天他把我找去说：“今晚你到海特那里去？”

我说：“是。”

“你昨天见到他了？”

“是。”

“他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他说：“唉，我是说，他看上去怎样？他好吗？快活吗？”

我说：“他看上去情绪糟透啦。”

查尔斯说：“噢。”

我说：“就这样吧。”

“我说，在你离开之前……”

“干什么？”

“没什么、没事，等你快离开时，代我问候他，记住。”

我转告海特，“查尔斯警官今天把我叫到他家，哭着央告我告

诉你，他没害你，没报告往牛奶里掺水的事。”

海特说：“什么牛奶掺水？”

我不知道如何答对。

海特说：“你瞧瞧，如今特立尼达变成什么样了！有人说我的牛奶里有水。没人见我往牛奶里掺水，可是现在却人人谈起来竟像是亲眼见过一样。”

我看此时的海特依旧是津津有味地谈论着。

我一直把海特视为安于现状的人，除了以往他所干的事情之外，很难想像他还会去追求其他的事。我猜想他带我去看板球时有三十五岁，他进监狱时四十三岁，但在我来看他一直是老样子。

从外表看，正如我说的那样，他长得很像瑞克斯·哈里森，他深褐色皮肤，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走起来略有些罗圈腿，另外他还是平脚板。

我一直认为他的后半生也会这么过，喜欢板球、足球、赛马，上午下午一直读报纸，坐在人行道上侃大山，圣诞之夜和除夕夜里多喝点儿酒。

他似乎什么都不需要，非常自足，我想他连女人也不需要。当然，我知道他时常到城里的某些地方去转转，但我想他干那事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恶性的刺激而不仅仅是要女人。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摧垮了米格尔街俱乐部，海特本人也变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与爱德华有关系。我想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爱德华的妻子跟美国大兵跑了后，海特喜形于色，而当爱德华去阿鲁巴岛后，他又非常失望。

他说：“所有人长大后，都要离开。”

另一次，他说：“我真他妈够蠢的！没去跟美国人一起干活，像

爱德华他们那样。”

埃多斯说：“海特那些天夜里可没少往城里跑。”

博伊说：“是呀，他是个人人，为什么不能干他自己想干的事呢？”

埃多斯说：“有些人就是这样，事实上，所有的人都会如此，他们越老就越怕老，总想保持年轻。”

我对埃多斯的话很恼火，不希望海特是那样的人。我感到难过的是，我也察觉到埃多斯说的没错。

我说：“埃多斯，亏你想得出这种鬼念头，干吗不离那些垃圾货远点儿。”

后来一天，海特领回家一个女人。

之后和海特在一起，我总觉得有些别扭。他成了一个担负起责任和义务的男人，不能再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花到我们身上了。更糟的是，所有的人都装作那个女人根本不存在似的，就连海特自己也从未提起过她，让我们以为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那个女人肤色呈浅褐色，约三十岁，略胖，喜欢穿蓝衣服。她自称多丽，我们常看到她在海特家窗口，目光茫然地向外看。她从不跟我们讲话，事实上，除了叫海特回去外，我从未见她讲过话。

然而，博伊和埃罗尔喜欢她带来的变化。

博伊说：“我想，这房子里还是第一次住女人，变化是挺大。很难说清楚这是为什么，但我感觉挺好。”

我妈说：“你看男人有多傻。海特明明知道爱德华的下场，如今他又和女人搅到一起去了。”

墨尔根太太和比哈库太太很少见到多丽，所以并不太讨厌她，但也认为她又懒又笨。

墨尔根太太说：“这个多丽，我看有点像个老鸨婆，知道吧。”

海特像以前一样，我们却难以忘掉多丽的存在。我们仍去参加运动，仍旧坐在人行道上侃大山。

每逢多丽喊：“海特，你过来吗？”海特从不答应。

过后约半小时，多丽会说：“海特，你倒是过不过来？”

这时海特就会说：“我来啦。”

我很想知道多丽是怎么生活的，她几乎一直呆在家里，海特却经常在外边。她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从窗口向外张望。

他俩是街上最古怪的一对。他们从不一块外出，从没听到他们笑，也从未见他们吵架。

埃多斯说：“他俩就像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

埃罗尔说：“你们听着，别把这当真。别看海特坐在这里不言不语的，他回去就大不一样喽。他跟多丽讲话时就不会这个样子了。知道吧，他给她买了许多珠宝首饰。”

埃多斯说：“我觉得她有点像马蒂达，知道吗，克利普索小调是这么唱的：

马蒂达，马蒂达，
马蒂达偷走我的钱，
直奔委内瑞拉。

买珠宝首饰！海特这是怎么啦？他怎么像个老头儿。从海特这里，女人要的不是珠宝，而是其他什么东西。”

从外表看来，海特家里有两个变化，一是把所有的鸟都关进了笼子；二是大狼狗被锁在铁链上后变得忧郁寡欢。

没人在海特面前谈到多丽，我觉得这事实是太令人吃惊

了。

随后发生的事更加令人吃惊，我们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详情的。起初，我发现海特不见了，随后听到一些传闻。

这个故事是后来在法庭上听到的。多丽从海特那里逃走了，当然带走了他给她的所有礼物。海特追踪她并发现她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大闹一场后，那男人逃走了，海特便把火气全撒到多丽的身上。随后，根据警方的陈述，他泪流满面地来到警察局自首，他说：“我杀了一个女人。”

但是多丽并没有死。

我们当时听说她已经死了，开始一两天，我们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尔后，米格尔街陷入了深深的沉寂之中，没有男孩或男人们聚在海特家门外的路灯下聊天了。也没有人玩板球，影响人们睡午觉，俱乐部也垮了。

我们毫不留情地把多丽忘到脑后，一心只想着海特。我们从心里挑不出他有什么毛病，我们为他感到痛苦。

我们在法庭见到了一个面目全非的人，他显得苍老。他朝我们微笑时，只是微微掀动了一下嘴角，他是在向我们示意，当我们也回报一笑时，差一点儿哭出来。

检察官问道：“那天夜里天黑吗？”

海特说：“所有的晚上天都黑。”

海特的律师是个矮胖子，叫齐塔兰加，穿着一套脏兮兮的褐色西装。

齐塔兰加滔滔不绝地背诵着请求宽恕的词句，如果不是法官打断他的辩护，他会一直背诵下去。法官说：“你讲的这一切都很有意思，而且有些的确是事实，但是，齐塔兰加先生，你在浪费法

庭的时间。”

齐塔兰加就“爱的原始冲动”做了长篇论述。他说，安东尼为了爱情而抛弃王冠；海特则为了爱情而抛弃了个人的自尊。他说海特犯罪纯属一种冲动。他说他去过巴黎，所以很清楚地知道，在法国，海特将会成为英雄，女人们将会向他献上花环。

埃多斯说：“知道吗，就是这样的律师会把人送上绞架。”

海特被判了四年刑。

我们到弗雷德里克大街监狱探望他。那监狱真令人失望，淡淡的乳白色墙不算太高。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大多数去那里探监的人看上去都十分欢快，只有几个女人在哭泣。总体看来，人们说说笑笑的，更像聚会。

埃多斯穿上了他最好的西服，手里抓着帽子，四处观看，他对海特说：“这里看上去不赖啊，”

海特说：“他们下周送我去卡瑞拉。”

卡瑞拉是一个距西班牙港几海里的一个小小的海岛监狱。

海特说：“别为我担心，你们了解我，不出两三个星期，我就会让他们给我找件轻松的活儿。”

每当我去卡瑞拉治或库马那角洗澡时，总要隔海相望，水中的卡瑞拉岛上那一排排整齐的粉红色建筑高高地耸立在大海中，我努力想像那些建筑中的情形，但怎么也想像不出来。我常想，“海特在那里，我在这里，他能知道我在这里想他吗？”

过了几个月，我越来越关心我自己了，竟几个星期没想到海特，明知道这样不太仗义，可也只能如此。后来我就不再想海特了，有时闲下来也会想想他还多久能出来，但并不十分关心这事。

海特进监狱时我十五岁，十八岁时他出来，三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我离开学校，进入海关，我不再是孩子，而成为一个能挣钱的大人。

海特的回家显得颇为平淡。不仅仅因为我们这帮孩子已经长大了，海特的变化也很大，他身上失去一些原有的光彩，与他交谈也感到有些乏味。

海特登门拜访了所有他认识的人家，怀着极大的热情讲述他的经历。

我妈用茶款待了他。

海特说：“正像我期望的那样，我先和一些看守们搞好了关系，你知道后来怎么着？我私下里搞了两手，嘿，成啦！他们让我当上了图书管理员。知道吗，他们那里有个很大的图书馆，各种名著全有。就是泰特斯·霍伊特喜爱的那种地方。那么多书却没人去读。”

我递给海特一支烟，他机械地接下来。随后，他叫起来：“嘿，这是怎么回事？你现在长成大人啦！我离开的时候你还不抽烟。也难怪，已经过去很久啦。”

我说：“是，是很久了。”

很久了，也不过只有三年。在这三年中，我长大了，学会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我不再希望成为埃多斯那样的人了。他太瘦弱了，而且还那么矮小。泰特斯·霍伊特是那么愚蠢和乏味，没劲透了。一切都变了。

海特进监狱时，我的一部分也随之死掉了。

告别米格尔街

我妈说：“你在这里变得太野了，我想你已经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啦。”

“去哪儿？委内瑞拉？”我问道。

“不是委内瑞拉，去别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委内瑞拉，也知道你，只要你一踏上委内瑞拉的土地，他们就会把你丢进监狱。不能去那儿。”

我说：“那好吧，这事由您拿主意吧。”

我妈说：“我要去找加耐士·潘迪特谈谈这事。他是你爸爸的朋友。无论如何你必须离开这里，你变得太野了。”

我想我妈说得没错。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变野了。我喝起酒来像条鱼，还干好多其他的事。我是在海关时开始喝酒的，那儿有不少以各种理由没收来的酒。头一回喝时，酒精味令我头痛。我对自己说：“你必须挺住，就像喝药一样，屏气闭眼灌进去。”很快，我便成了海量，且为此感到骄傲。

后来，博伊和埃罗尔给我介绍了不少玩的地方。我开始工作后不久的一个夜晚，他们带我去去了马里恩广场附近的一个地方。我们爬上二楼，来到一间拥挤的小房间。房里挂着不少绿色的灯泡，像一串串珠宝，屋里有许多正在等候和观望的女人，墙上有条横幅，“严禁使用猥亵语言”。

我们在吧台上喝了杯香甜的饮料。

埃罗尔问我：“你喜欢哪个女人？”

我一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感到一阵厌恶，我冲出房间回到家，觉得有点头晕和害怕。我对自己说：“要坚持住。”

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个俱乐部，而后又去了多次。

我们搞了些疯狂的聚会，带着朗姆酒和女人到马拉卡斯海湾彻夜狂欢。

“你变得太野啦。”我妈说。

对她的话我一点儿没在意，直到一天晚上我酩酊大醉，一直醉了两天。当我清醒后，我发誓再也不抽烟喝酒了。

我对我妈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特立尼达的错。在这里人们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大约两个月后，我妈说：“下周，你必须跟我去，我们去见加耐士·潘迪特。”

加耐士·潘迪特不当传教士很久了，并已经参政，而且干得挺红火。他好像是个什么部长，或是政府的什么官员，听人说他正在竞选议员。

我们来到坐落在卡莱尔大街上的他那栋大房子，我们见到了这位大人物，他未缠腰布也没扎头巾，而是身穿一套价格昂贵的西服。

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妈。

他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我妈开始哭起来。

加耐士对我说：“你到国外准备学什么？”

我说：“我什么都不想学，只想离开这儿，就这么回事。”

加耐士微笑着说：“政府还没有发过这种奖学金。你说的那事

只有部长们可以办到。你必须学些什么才行。”

“我还真没想过这事儿，让我想想。”

加耐士说：“那好吧，你就想想。”

我妈哭着向加耐士表示感谢。

我说：“我知道我要学什么啦，工程。”我刚刚想起了比哈库叔叔。

加耐士笑起来，说：“你知道什么是工程？”

我说：“眼下还不知道，不过我能学会的。”

我妈说：“你为什么不学法律？”

我想起了齐塔兰加和他那套褐色西装，说道：“不，不学法律。”

加耐士说：“现在还有一份奖学金，是学药剂学的。”

我说：“可我不想学药剂学，我不愿意穿着白大褂，向女人兜售口红。”

加耐士微笑着。

我妈说：“甭理这孩子，潘迪特。他就学药剂啦。”又转身对我说，“只要你肯用脑子，什么都能学。”

加耐士说：“想想吧，那样就能去伦敦，就可以见到托马斯，看到国会大厦。”

我说：“那好吧，我就学药剂学。”

我妈说：“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报答您，潘迪特。”

说着哭起来，她掏出二百美元，递给加耐士，说：“我知道这不多，潘迪特，但我只有这些，是很长时间才攒起来的。”

加耐士神情凝重地接过钱，说：“你不必难过，你已经拿出了你的全部。”

我妈继续哭起来，后来加耐士忍不住也哭了。

见此情景，我妈擦下眼泪，说：“您知道吗，潘迪特，我是多么难哪，现在到处都要花钱，可我上哪儿去弄钱呀，真不知以后我可怎么活。”

加耐士不哭了，我妈又重新哭起来。

哭了一会儿，加耐士拿出一百美元，还给我妈，呜咽颤抖地说：“把这钱拿去，给孩子买件好衣服。”

我说：“潘迪特，您真是个好人。”

这话深深地打动了，他说：“当你带着文凭和其他各种证书从伦敦回来，成为大药剂师时，那时，我会找到你，索取我应得的回报。”

我告诉海特我要走了。

海特说：“为什么，去当苦力？”

我说：“我拿到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去学药剂学。”

海特问：“是你捣鼓来的？”

我说：“不是我，是我妈。”

埃多斯说：“是件好事。我认识一个药剂师，我给他家倒了好几年的垃圾。那家伙可够富的，伙计，钱哗哗地往里进呀。”

消息传到伊莱亚斯那里，可把他气坏了。一天晚上，他来到我家门外，喊道：“贿赂，贿赂，你们就会干这名堂，贿赂！”

我妈反唇相讥：“只有那些穷得连贿赂的钱都拿不出的穷光蛋才抱怨贿赂。”

过了约莫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离开的手续全部办妥了。特立尼达政府就我的情况给在纽约的英国领事馆写了一封信，英国领事馆知道了我的情况。英国人让我发誓绝不用军队推翻他们的政府之后，给我签发了签证。

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妈搞了个小小的酒会，有点像遗体

告别。人们进门便会满脸悲伤地告诉我会多么想念我，而后便把我忘到脑后，专心致志地吃喝起来。

劳拉亲了我的脸颊，还送给我一枚克利斯托佛大街的徽章。她让我把它挂在脖子上，我答应她把徽章装在口袋里带走。其实后来我也不知把它塞到哪里去了。比哈库太太给我一枚六便士硬币，她说那是枚神圣的硬币，我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就随手花掉了。泰特斯·霍伊特原谅了我所有的过错，还送我一本书。埃多斯送我一个钱夹子，他发誓说它绝对是新的。博伊和埃罗尔没送我任何东西。海特送我一条香烟，他说：“我知道你说过不再抽烟了，拿去吧，如果你改主意了就抽。”于是我又开始抽烟了。

比哈库叔叔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捣鼓那辆准备第二天一早送我去机场的面包车，我不时跑去央告他别太折腾了。他说，他认为汽化器出毛病了。

第二天一大早，比哈库就起来，又去鼓捣车。我们原打算八点动身，结果到十点时，比哈库还没搞完。我妈有些惊慌失措，比哈库太太也有点儿沉不住气啦。

比哈库在车底下吹着口哨，吹奏着《罗摩衍那》曲调。后来他从车下爬出来，笑着说：“怎么，害怕了？”

终于一切就绪。比哈库对车造成的损伤不是太大，发动机还能工作。我把行李装上车，正要上路。

我妈说：“等一下，”

她把一个牛奶罐放在门口。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大门那么宽，足足可以通过一辆汽车，而放在门口中央的牛奶罐只有四寸多宽，我想从旁边过去，离牛奶罐还老远，结果还是踢翻了牛奶罐。

我妈的脸一下沉下来。

我问：“是个坏兆头吗？”

她没回答。

比哈库按响车喇叭。

我们上车后，比哈库开车离开米格尔街，沿着大路直奔南码头。我没有向车窗外看。

我妈一直在哭，她说：“我知道，我再也不会米格尔街上见到你了。”

我说：“为什么？就因为我踢翻了牛奶？”

她没答话，仍旧为洒掉的牛奶哭泣。

当我们离开了西班牙港的市郊后，我才向窗外看去。天气晴朗而炎热。男人和女人们在稻田里劳作，一些孩子在路旁的水管下冲凉。

我们正点赶到皮亚考机场。直到此刻，我才后悔得到了那笔奖学金。机场候机厅令我感到恐惧。肥胖的美国人在酒吧喝着怪里怪气的饮料。戴着墨镜的美国女人趾高气扬地高声喊叫着。看上去，他们是太有钱，活得太滋润了。

后来广播中传来用西班牙语和英语播送的消息：206 航班将晚点六个小时。

我对我妈说，“咱们回西班牙港。”

很快我还要和候机厅里的人在一起，我想离开一会儿。

回到米格尔街，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海特。他腋下夹着一份报纸，拖着那双平脚板，从咖啡馆溜达回来。我挥舞着手臂喊他。

他只答道：“我以为这会儿你已经上天了呢。”

我感到失望，并不仅仅因为海特的冷淡，而是因为在我命中注定要永远离开这里之后，一切仍像以前一样，我的离开没有留

下任何痕迹。

我看看翻倒在门口的铜制牛奶罐，对我妈说，“这就是我永远不能再回来的兆头吗？”

她欣慰地笑了。

我和我妈，还有比哈库叔叔以及他夫人一起在家吃过最后一顿午饭之后，又沿着炎热的公路返回皮亚考。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我认识海关的一位官员，他没有检查我的行李。

播音员冷淡平静地宣布开始登机。

我拥抱了我妈。

我对比哈库叔叔说：“比哈库叔叔，刚才我还不想告诉你，不过，我想你的车气门在响。”

他的眼睛豁然一亮。

我离开他们，步履轻快地朝飞机走去，没有回头看，只盯着眼前我自己的影子，它就像一个小精灵在机场跑道上跳跃着。

后 记

英国移民作家 V. S. 奈保尔在英语世界声名远扬,他和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米格尔街》(1959,获毛姆奖)、《比斯瓦斯先生的房间》(1961,20 世纪 100 部最佳英文小说之一)、《在自由的国度》(1971,获布克奖)、《抵达之谜》等。2001 年奈保尔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1932 年 8 月 7 日,祖籍印度的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中部查瓜那城。1938 年举家迁往西班牙港。1949 年中学毕业后,他获得了特立尼达政府提供的一份奖学金,1950 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54 年,他获得牛津大学学位。同年,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米格尔街》。

他的早期小说分三类:一是关于特立尼达的家乡小说,二是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后所面临的问题,三是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的带有自传成分的小说。他写英国题材的小说也有,主要是写一种没落,充满讽刺。

奈保尔游历甚广,经常到非洲、美洲和亚洲旅行,拥有丰富的地理和人文知识。作为一位世界性作家,他深刻地描写了深受殖民主义影响的印度、非洲、加勒比地区等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不安、暴力和绝望,体现了殖民国家本土文化受到冲击,以及后殖民地时代殖民地人民精神家园的丧失。因此,奈保尔的作品在世界各

地深受欢迎。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他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融入历史描写之中，是继康拉德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编年史作家。

奈保尔的文字简洁节制、清爽利落、幽默超然。他的简洁里包含所有的复杂性。奈保尔硬朗直接的文字对西方读者来说是一种陌生的风格，所以尤其令他们着迷。奈保尔有这种高超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不足为奇，除了他的文学天赋，还得益于他的母语就是英语。

奈保尔的第一部作品《米格尔街》是一部回忆录式的小说系列。该小说包括十七个短篇，虽然没有连贯始终的情节，却都彼此有联系。每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与西班牙港毗邻的一条大街上。故事以作者回忆的口吻叙述的。他的回忆充满了辛酸，又充满了深情，他讽刺了米格尔街的种种愚昧和混沌，又同情于街上的人们朴实的无知和天真。他始终以一种讽刺性的幽默记录他童年的印象。《米格尔街》是成长的奈保尔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评价。